

北京文博



目 录

2012年第4辑 (总 70 期)

● 文物工作

- 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推进北京文博工作的创新发展·····孔繁峙 (1)
北京市文物局修志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宋惕冰 (6)

● 博物馆学

- 大英博物馆展览解析系统简论·····李 梅 (10)
海淀区博物馆资源现状调查·····李 志 王承浩 姜英鎏 (15)

● 考古简报

- 北京市延庆县西屯墓地西区 (I区) 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物管理所 (19)
香山静宜园部分遗址考古发掘简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31)

● 文物研究

- 北京古代的窖藏遗存·····郭京宁 (37)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迁徙初探·····韩建识 (45)
清代王爷园寝龛扉形态考·····周 莎 (51)
民国总统徐世昌手札初探·····付 幸 (59)
徐悲鸿与《风雨归舟图》·····佟 刚 (63)
北京故宫文物调拨抚顺市博物馆30周年·····张 红 (67)

● 北京史地

- 北京城的本根——古蓟城……………陈 平 (73)
《万寿寺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课题构思综述……………孔祥利 (84)
北京坛庙建筑拾零……………李卫伟 (90)
清代京师城垣军事管理述略……………袁学军 (96)
清光绪朝永定河石卢段水患上谕档……………陈 康 (102)

● 资料信息

- 北京市文物局2012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尹 君 (108)
《北京文博文丛》2012年总目录…………… (113)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孔繁峙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志平 王 岗 王清林 王鸿年 王 鑫
巴爱民 卢迎红 田淑芳 白 岩 向德春 刘建业 刘超英 齐东发 许 伟 李 青
李建平 吴志友 吴梦麟 何小平 宋大川 张若妮 张树伟 张 展 郝东晨 郝志群
姚 安 耿春卫 高小龙 高凯军 郭小凌 郭 豹 姬脉利 崔国民 葛英会 韩 扬
解立红 谭烈飞 薛 俭

主 编：陈晓苏 执行主编：韩建识 编辑部主任：高智伟

本册责编：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4, 2012

Contents

● *CULTURAL RELICS WORK*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Push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Work of Beijing.....by Kong Fanzhi (1)

Retrospect and Thoughts on the Compiling Annals Work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by Song Tibing (6)

● *MUSEOLOGY*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xhibition Analytic System of the British Museum.....by Li Mei(10)

Investigation of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ource in Haidian District Museum
.....by Li Zhi,Wang Chenghao, Jiang Yingliu(15)

● *ARCHAEOLOGICAL REPORT*

Brief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Western District(I District) of Xitun Cemetery in Yanqing County, Beijing City.....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Yanqing County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19)

Brief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Part of Sites in Jingyiyuan in Fragrance Hill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31)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The Ancient Cellar Remains in Beijing.....by Guo Jingning(37)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Shift of the Stele to Li Xiu, General of the Cloud-Like Flags of the Tang Dynasty.....by Han Jianshi(45)

Study on the Form of Bixi in the Prince Mausoleum of Qing Dynasty.....by Zhou Sha(51)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Personal Letters of Xu Shichang,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Fu Xing(59)

Xu Beihong and the Painting of *Fengyu Guizhou Tu*.....by Tong Gang(63)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Allocating and Transferring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to the Museum of Fushun City.....by Zhang Hong(67)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The Root of the Beijing City—the Ancient City of Ji.....by Chen Ping(73)
A Summary of Project Conception of Research of the Architecture Cultural Heritage in Wanshou Temple.....by Kong Xiangli(84)
Sidelights on the Architecture of Altar Temple of Beijing.....by Li Weiwei(90)
A Brief Account of Military Management of City Wall of the Capital in Qing Dynasty
.....by Yuan Xuejun(96)
The Imperial Edict Documentary about the Flood in the Shi-Lu Sector of Yongding River in the Guangxu Reign of Qing Dynasty.....by Chen Kang(102)

● *DATA AND INFORM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3rd Quarter of 2012).....by Yin Jun(108)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in 2012.....(113)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Hou Renzhi, Li Xueqin, Lv Jimin*

Chairman:*Su Bai*

Vice-chairmen:*Kong Fanzhi,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Yu Ping, Wang Dan,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Zhiping, Wang Gang, Wang Qinglin, Wang Hongnian, Wang Xin, Ba Aimin, Lu Yinghong, Tian Shufang, Bai Yan, Xiang Dechun,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Qi Dongfa, Xu Wei, Li Qing, Li Jianping, Wu Zhiyou, Wu Menglin, He Xiaoping, Song Dachuan, Zhang Ruoni, Zhang Shuwei, Zhang Zhan, Hao Dongchen, Xi Zhiqun, Yao An, Geng Chunwei, Gao Xiaolong, Gao Kaijun, Guo Xiaoling, Guo Bao, Ji Maili, Cui Guomin, Ge Yinghui, Han Yang, Xie Lihong, Tan Liefei, Xue Jian*

Editor-in-chief:*Chen Xiaosu*

Executive editor:*Han Jianshi*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Office:*Gao Zhiwe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volume:*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URL:<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bjwb1995@yahoo.com.cn

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推进北京文博工作的创新发展

孔繁峙

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当前文博行业的首要任务。在北京文博系统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建设任务及发展目标，必须紧紧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十八大确立的、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奋精神、凝神聚力、攻坚克难，在新的起点上大力推进北京文博事业的创新发展。

一、文博事业是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文博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博事业能够也必将显示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文博事业是促进“经济建设”科学发展的软实力。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展现了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美丽画卷。文博事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促进力量。

文博工作可以通过历史遗迹和革命遗

址的社会宣传教育作用，提高广大民众文化政治素质，振奋民族精神，使广大民众焕发出高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是旅游业的基础并促进了国家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由于旅游行业作为直接促进社会终端消费的现代服务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高、产业链长、带动面广的特点，可提升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据统计，目前北京旅游业增加值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已接近8%，新增增加值对当前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10%，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支柱产业。以民间传世文物交流而形成的文物市场、文物拍卖及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地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新兴的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可以为现代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持，现代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等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内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

（二）文博工作将为“政治建设”提供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文博行业可以积极参与并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国家的“政治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在中国几千年民族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古代社会政治发展史所凝聚的深刻的治国安邦的优秀文化理念，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历代社会所形成的坚持维护国家统一、追求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注重农事、关注民生等传统治国理念，特别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乾隆盛世”等时期所产生的国家统一、政治开放、文化多元等历史经验，仍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及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同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应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内容，从而提升人们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发展。

（三）文博事业将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文博事业担负着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文博单位是社会文化活动的场所，发挥着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重任，在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深入发掘展示并借鉴我国几千年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和各民族文化融合及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建设经验，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和实生物等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良好氛围，以推动当今社会建设的发展。

（四）文博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

文化的突出特色，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现代文化的深厚基础，应正确看待和运用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我们要不断增强通过发展文博事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把发展文博事业与推动文化繁荣紧密结合起来，要充分利用北京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优势，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通过落实促进文博事业与首都文化融合发展的有力措施，提高首都文化凝聚力、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五）文博事业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环境。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强调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北京文博事业要按照十八大精神，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努力发掘并宣传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有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内容，提升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积极参与并推动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当前，要全力做好古都著名的“三山五园”历史景区的恢复工程，从整体区域内做好历史建筑和皇家苑林的保护，再现古都西部人文与自然相融合的历史景区的传统生态环境；通过一系列环境整治逐步恢复古都著名的“燕京八景”等传统生态景观；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好曾处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古村古镇、历史街区的传统景观，推动美丽首都的建设与发展。

二、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北京文博工作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为文博事业的科学发展指

明了方向，我们将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以推动文博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创新精神，肩负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文博工作发展的重任，在北京全面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中发挥文博事业的积极促进作用。

（一）全力推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与展示，提高国家文化中心历史文化影响力。

1. 深入挖掘和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内涵，进一步加强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艺术、科学以及利用、展示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著名人物居住过的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会馆、近现代历史建筑等名城要素，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度研究，突出名城历史建筑、民族传统文化整体展示，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新推出一批保护完好、环境整洁、设施完善，并且具有深厚历史人文内涵的历史文化名街、胡同、四合院、会馆以及历史建筑，以增强北京“国家文化中心示范区”的历史人文内涵。

2. 以中轴线“申遗”为契机，推进历史名城保护工作。以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加大旧城街巷、胡同、四合院疏散和房屋修缮工作力度，改善院落基础设施，提高居民居住环境。强化对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以推进文物修缮和遗址环境整治为动力，促进旧城整体保护、恢复皇城等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历史风貌和人文环境。提升胡同四合院保护与利用水平。

3. 积极推动北京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结合首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沟峪经济发展，加大与郊区县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开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调查与保护，继续支持古北口、爨底下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的文物修缮工作，促进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发展。推动卢沟

桥地区宛平城、卢沟桥、抗战馆的“一体化”，力争将宛平城打造成最具历史风貌和北方特色的古城。带动乡土建筑旅游、红色旅游的发展，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全力推进文物保护单位系列修缮保护与展示利用，提高首都国家文化中心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水平。

北京地区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5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68处，这些文物保护单位是北京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首都国家文化中心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1. 加大不合理占用文物保护单位腾退工作力度。深入调研本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不合理占用情况，研究提出破解问题的思路，制订相关文物腾退政策，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合理利用与展示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依据《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文物腾退工作应给予政策、资金及相关工作的支持。

2. 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合理利用与特色展示。深入调研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利用的现状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案，特别是针对文物保护单位利用问题，提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文物保护利用情况分析与建议，使北京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合理利用工作取得新突破。着重抓好大高玄殿、景山寿皇殿等一批等级高、影响大、特色鲜明的文物建筑腾退、修缮后，尽早向社会开放、展示。根据北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内涵和特点，推出“世界遗产游”、“皇家文化游”、“红色文化游”、“名人故居游”、“古都名城发展历史系列游”、“会馆游”、“老北京民俗游”等众多旅游项目，打造北京文物线路旅游的特色品牌，形成古代历史建筑和文化旅游系列，充分展示古都文化魅力，弘扬北京精神。

3. 推动五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工程取得新突破。北京地区的大型文化遗迹反映北京城市发展历程，是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保护在北京文物保

护工作中具有重要位置。以周口店、圆明园、琉璃河、金陵、团河行宫五大遗址为重心，加强和推进北京地下文物保护与展示工作。深化圆明园、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研究与发展工作，深入挖掘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作为国内唯一一处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文化内涵，迁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逐步落实保护规划。加强圆明园遗址环境整治，保护历史风貌。积极推进琉璃河、金陵、团河行宫等大遗址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不断完善保护管理机构、机制，争取早日达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的条件。做好丽泽商务区等城市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力争在汉代蓟城、唐代幽州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等城市考古、保护、展示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三）全力推进博物馆创新发展，提高首都国家文化中心的博物馆公共服务水平及影响力。

目前北京地区现有各类博物馆159座，数量及门类均居全国前列，博物馆馆藏数量332万件（套），丰富的馆藏文物为首都社会文化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展示、宣传资源。

1. 以“博物馆大联盟”整合北京地区博物馆资源。充分发挥北京地区博物馆在藏品、研究、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加强区域内行业协作，以“北京博物馆大联盟”的方式打造北京地区博物馆航母，使全市博物馆形成合力，整体提升北京地区博物馆的公共服务水平，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

2. 发挥博物馆“聚集效应”。全力支持央属大中型博物馆建设，建成并开放国家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中国出版博物馆、中国民航博物馆、中国海关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新馆、中国化工博物馆新馆；完成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二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新馆、徐悲鸿纪念馆、老舍纪念馆扩建工程建设；推进市

属博物馆建设和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发展，使我市博物馆门类更加丰富、分布更趋合理，形成全面系统的博物馆群落，从而进一步推进首都社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3. 加大博物馆展陈和宣传力度。每年举办固定展览和临时展览项目超过500项，实现年接待观众量4000万人次，逐步扩大外展规模与批次，积极引进或合作举办精品展览。进一步扩大博物馆免费开放范围，提高服务接待及展览水平，有效增强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使更多民众免费享用公共文化资源。

4. 促进民办博物馆繁荣发展。鼓励和扶持民办博物馆建设，推动民办博物馆数量和质量齐头并进、快速发展；积极探索民营博物馆的发展、管理、引导、资助等方面的新机制、新方法。

5. 统筹加强全市区县博物馆协调发展。指导和支各区县博物馆每年要推出一个具有本区特色的展览，以展览带动区县博物馆管理、业务水平的提升，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鼓励区县博物馆为民间收藏文物艺术品提供场地、讲座、鉴赏等方面的支持，以吸引全市公众热爱文物、艺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积极邀请文物专家，开展文物鉴赏系列讲座，服务民众、惠及民众。

6. 推进博物馆免费开放和特色旅游。利用北京地区博物馆在数量及门类均居全国前列的优势，整合博物馆资源，形成区域博物馆合力。深度开发博物馆旅游，推出博物馆专线游项目，打造博物馆旅游品牌。

7. 加强独具北京文化内涵的博物馆产品开发与营销。深入发掘博物馆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创意并设计开发一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京味儿文化特点的博物馆文化衍生品。

（四）全力推进文物艺术品市场繁荣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丰富首都社会文化内涵。

1. 推动文博行业的文化创意产业全面

发展,继续推进以文博单位、非遗行业、旧工艺品市场等为主体举办的各类文化博览会,搭建国际性的交流平台,扩大古玩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整体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配合相关部门,促进文物艺术品交易业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中占有一定份额。支持行业组织、企业和收藏界在京举办文物流通和艺术品展会及高端论坛,促进传统工艺美术品的研发及博物馆等相关行业对其衍生品的开发和产品化。

2. 打造北京成为全球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进一步挖掘北京文物艺术品市场潜力,引导市场向规范化、规模化、精品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带动行业整体经营理念转变,加快行业经营规范化步伐。提升北京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国际化水平。扶植培育文物拍卖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鼓励拍卖企业创新、提升发展模式,提高企业服务品质,推动文物艺术品拍卖产品附加值的提高。鼓励企业拓展经营模式,提高企业的服务意识和品质,通过搭建文物艺术品交流平台以及利用现代金融运作方式等扩大自身实力,跻身世界拍卖行业一流企业行列。

3. 建立文物艺术品交易市场数据监测系统。搭建北京地区文物艺术品交易实时监测平台,开发文物艺术品交易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全面掌握文物市场发展动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五) 全力推进北京地区文博管理工作创新,提高首都国家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创新驱动动力。

1. 积极探索文物保护与利用新机制。以推动大运河、北京中轴线、云居寺塔及石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探索北京地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相协调的新机制。推动首钢等工业遗产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利用,探索北京地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机制。推进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探索将文物保护和利用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

新机制。

2. 加快文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全市统一的标准和规划启动文博行业物联网建设,形成布局合理、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推进馆藏文物管理的数字化建设。

3. 创新和拓宽文博工作宣传思路。利用互联网,针对青少年及知识水平较高人群,开展网上文物知识讲座、直播文物古建修缮、考古发掘、文物艺术品拍卖会等内容,宣传、普及文博知识。充分利用电视媒体的通俗性、广泛性的特点,举办电视文博鉴赏大讲堂、拍摄文物背后故事的纪事片等,扩大对公众的文博知识普及。加强在报纸媒体上的文博小知识、文博信息的报道。与新闻交通广播台合作,加强针对上下班一族的文博知识问答、文博有奖竞猜、文博信息快速报道。

4. 促进文物保护与科技融合。鼓励、引导北京地区的文博单位与国家文物局在京的7家重点科研基地之间建立多元合作模式,广泛开展高新技术在文物保护中应用,以提升北京地区文物保护、文博管理中的现代高科技含量,引领文物科技保护新趋势。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市属文博单位的文物保护工作与高科技新技术应用的研究项目,积极支持和引导各博物馆提高文博科技保护自主创新能力。

文博工作是落实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目标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加强文物保护和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尤其是在新的形势下,文博工作不仅直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贡献,而且更要为首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北京市文物局

修志工作的 回顾与思考

宋 惕 冰

盛世修志，以志资政，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贯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初期，1980年国务院正式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1984年成立中国方志领导小组。1986年9月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设筹备小组，1988年10月正式成立。由市长任主任，各部委办负责人任委员。1992年4月1日至4日，北京市志办举办第二期志书主编研讨班，分派北京市文物局的任务是在1993年12月底交出《北京志·文物志》概述8000字、正文30万字。我局派人出席了这次研讨班。4月10日孔繁峙副局长在报告上批示“在近期内召开编委会议”。6月17日，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北京志·文物志》编委会人员名单及总编室人员名单。6月22日王金鲁局长主持召开了编委

会成立会议。我局修志工作正式启动，并由孔繁峙副局长领导此项工作。

从此，在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下，《北京文物志》等志书第一轮修志工作从1992年启动，至2009年圆满完成，历时17年。完成志书共计五部，即《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北京志·文物卷·博物馆志》、《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周口店遗址志》、《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故宫志》、《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长城志》（图一）。平均3年一部志书，文字达330余万字。市志办认为，由一个总编室连续编辑五部志书，在全市的修志单位中应属首例。此外，还承担了整理文物系统史志资料、档案资料，记录北京文博事业发展历程的任务，于1994年和2007年分别出版了《北京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2006）》上下册；为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提供资料；为《北京文物百科全书》提供了资料并审稿。

一、北京市文物局第一轮修志的基本经验

1. 根据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及政治文化中心的特点，确定专志的分册和框架。如上所述，修志的任务与成果，均已超出原定范围，并开创新意。其工作的艰巨性在于无先例可循，要根据北京文博工作的特点，厘定其篇章结构。修志工作启动之初，所见各省市文物志的结构是：分类列举和著录文物精品占志书内容的绝大部分，末尾简述该省市博物馆情况及文物博物馆工作概况；国家文物局所编著《中国博物馆志》则分类介绍全国各省市博物馆情况，至于博物馆事业只在概述中简单叙述。截至2000年，北京市有文保单位990余处（其中国家级98处、市级224处、区县级670余处），文物约200余万件，又分不可移动文物与传世文物。新中国在文物普查、规划保护、立法等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因此文物、博物馆事业，理所当然地应当入志。

在五部志书中，如何处理保护与管理工作在全书中的比重，我们为突出这部分内容，设置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又因《北京文物志》涵盖不了《北京博物馆志》，更涵盖不了“世界文化遗产”，因而《博物馆志》、《周口店遗址志》、《故宫志》与《长城志》各立专志成册。

2. 著录涵盖面的全面与侧重，每部志书应设哪些篇章节问题。由于首都的特点，文物、博物馆著录的范围不应只是北京市文物局所直接管辖的范围，而是面向北京地区的所有文物与博物馆，又由于它们的主管单位涉及中央、军委、宗教、园林、建筑等，管理比较分散，以《长城志》为例，是单单著录北京地区的长城段，还是兼顾全国长城的著录，如若兼顾，势必增加著录、采编的难度。我局的做法是尽可能在广泛而又深入的原则上开展工作，但又有所取舍，例如《长城志》重点在著录北京地区明代的长城，又对全国长城与历代长城有所著述。又例如《北京文物志》中对北京的胡同、会馆、名人故居，只能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地区，在综述的基础上加以著录，全面著录则是《北京胡同志》的任务。馆藏传世文物，也只能有选择的分类著录，列入《博物馆志》中。

3. 既要遵守修志的原则，又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变通，才能保证专志的特色。志书有志书的体例，与史书不同，与个人学术著作更不同，它要保持客观的表述与资料的可靠性，因此一般不作评论，特别是第一人称的主观评论。志书规定“生不入志”，以事系人，但在《周口店遗址志》中，不仅有专家入志，而且有外籍专家入志；在《故宫志》中，不仅有帝王将相入志，而且有后妃、太监入志。志书一般不列“大事记”，而《故宫志》、《长城志》都列有不少篇幅的明、清两代的大事记。再如修志的上下限，《文物志》上至旧石器时代，其它各志下限也各不相同，以上都曾请示

市志办，得到领导部门主审的同意，实践的效果是不错的。《故宫志》卷名“世界文化遗产卷”，参与主持修纂的故宫方面曾提出只著录故宫明清建筑。我局提出要有故宫博物院的篇章，也得到故宫的认同。

4. 文献与实地调查资料并重，专家与基层单位并重。文物历史悠久，流传有序。一般都有文献可查考。文献与实录的应用是不可缺乏的，但要有慎重的选择，甚至不可忽视小至标点符号。例如，供稿中有不加引号的国朝、十分琐碎的妃嫔名录应加删除。由于文献资料不尽可靠，现代和当代文物、博物馆部门经实地调查积累的资料无疑是录著的基本资料，尽管它不是十分精确（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也是现有的和某一历史阶段的调查资料。文物、博物馆部门的专家学者，是修志工作必须依靠的对象，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能保证志书的质量，甚至不能出版。《周口店遗址志》特约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森水撰稿，《长城志》请罗哲文先生撰写概述，《故宫志》请故宫博物院原图书馆馆长万依组织故宫各方面专家撰稿，都是明证。另外，局属单位、区县文管所，以至局机关的档案室、资料室，还有市文化、规划、档案、宗教、园林部门都为各部志书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长城博物馆供稿最多。

二、五部志书及《纪事》任务的基本保证

1. 北京市志办和北京市文物局的重视和坚强领导。修志任务下达后，即得到市文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作为编委会的主任、副主任，王金鲁、单霁翔、梅宁华、孔繁峙等局级领导都亲自主持召开过编委会，将修志任务落实到局机关各处室、各局属单位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这就为志书的征稿工作打开了局面，得到市文物局机关各处室、各下属

单位、各区县文委及北京地区文博系统其它单位的鼎力支持和热情供稿，局领导还对修志班子的建立，人力、物力的供应及办公地点做过多处批示与安排，落实“一纳入”、“五到位”，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发展计划和各级行政任务之中”，“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到1998年，局领导已四次召开有关修志的会议。王金鲁局长曾提出“修志工作要与职称评定挂钩”以保证质量、促进进度。1993年4月26日，孔局长曾专程带领修志班子赴北京市文物商店布置撰写文物商业志稿任务，1998年又亲自主持《长城志》编纂工作。

作为领导部门，《北京志》主编王立行、段柄仁，副主编王铁鹏、赵庚奇，市志办副主任王春柱和责任审稿刘孝存同志对我局修志的工作十分重视，帮助我局修志班子把好政治关与业务关。特别是在志书的体例与篇章结构上，多次作了指导与商定。《世界文化遗产卷》的创意就是王立行同志提出的，1998年4月3日他与赵庚奇来局会晤局长梅宁华、副局长孔繁峙，首次提出将《周口店遗址志》、《故宫志》、

《长城志》等从《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中分出，单独撰写专志，不要受文字与篇幅的限制。市志办还提出要求，五部志书要增加随文图，而在彩版中不必像区县志那样添加领导人视察工作的照片。这不仅使得志书图文并茂，而且使配图工作更加精炼。

2. 要有一个固定的、得力敬业的修志班子。市文物局的修志班子《北京志·文物志》总编室是1992年6月17日成立的，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二人，美编及办公室成员共七人，主编、副主编及美编均为离退休返聘，办公室人员则为在职人员，编制上不算局里行政机构，挂靠在市资料中心，由在在职的主任和一位副局长主管。总编同志虽然年龄偏高，但都是在文博岗位上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事实证明这个班子是团结的、敬业的，勇于克服困难，被市志办称为“自讨苦吃的修志班子”。他们不论严寒酷暑、风晴雨雪，甚至“非典”期间，有病有伤，都坚持到岗，审稿改稿，保持与专家及有关单位的联系，对修志专家傅振伦、史地专家侯仁之、古人类学专家贾兰坡等经常拜访请教。正是这种勤恳工作、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保证了志书的质量，超额完成了修志任务。

三、北京市文物局第一轮修志的成果

1. 五部志书是中国建立后首次出版问世的地方志专业志书，具有北京作为首都、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图文并茂，不少珍贵史料，如北京勘察设计研究院俞美尔同志绘制的明长城



图一 北京市文物局首轮修志编纂的五部志书

北京段走向图、周口店遗址的新发现等，属第一次发表，不仅填补了有关志书的空白，而且能启迪今后续修的方向。

《周口店遗址志》，2003年8月18日出版，文字45万，图版103幅，随文图230幅；《故宫志》，2005年10月10日出版，文字85万，图版48幅，随文图229幅；《文物志》，2006年6月14日出版，文字88万，图版56幅，随文图332幅；《博物馆志》，2006年6月5日出版，文字53万，图版60幅，随文图176幅；《长城志》，2009年4月出版，文字58万，图版136幅（彩图57幅，黑白图79幅），随文图145幅。以上共计文字330万，图版403幅，随文图1112幅。

2. 《北京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2006）》是总编室整理文物系统史志资料、档案资料而成，记录了北京文博事业近60年的发展历程，孔繁峙局长曾于2001年3月7日批示，认为应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此项工作肇始于1984年我局赵学勤与韩锐同志参加的《当代中国的北京》的编纂工作，曾有乔红等19位同志参加提供卡片与条目工作，1993年宋惕冰受国家文物局党史办之聘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常务编委，借鉴其体例（编年）、书名，增加考古发掘条目汇编而成，于1994年12月出版上册（1949—1978），后又于2007年11月出版下册（1979—2006），共计文字约45万。

3. 《北京文物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地域文物资源及保护状况的主题百科全书。首由《北京志》主编段柄仁倡议，经梅宁华局长批准，由北京市文物局主持进行编纂。段柄仁、张展同志分任主编、副主编，宋惕冰任特约编辑。全书790个条目，约120万字，图片900余幅，2007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

基于以上工作成果，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志·文物志》修志集体与个人多次获得全国、北京市方志系统及文博系统的各项荣誉。1997年6月15日，北京市志办召

开表彰先进单位与个人大会，我局《北京文物志》主编获先进个人表彰证书，2005年11月，文物志总编室获得北京市人事局和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共同颁发的“先进工作集体”称号，主编、副主编分别获得“全国方志先进工作者”与“北京市方志先进工作者”奖状。

2008年6月14日，在第三次文化遗产日的颁奖会上，市文物局“文物志总编室”获“北京市文物保护先进集体”奖牌。

四、修志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北京市文物局修志工作虽然取得了第一轮修志的阶段性成果，但尚存在以下问题。

1. 各部志书的内容还有待补充和完善，限于档案与调查资料的不足，不免出现畸轻畸重的缺点，文物精品的著录，难免挂一漏万。

2. “文革”后落实查抄清退文物工作历时10余年，其工作量与影响都不小，包括清退档案、林彪“四人帮”非法拿走文物图书的调查材料均未入志。再如，北京作为中国文物出口鉴定四大口岸之一，历年来所做文物出口鉴定工作成绩很大，亦未入志。

3. 古籍善本图书应列为国家珍藏典籍，因管理分散，收集资料困难，亦未入志，与此项工作有关以及文物鉴定专家的贡献亦未能入志，付诸阙如。

4. 中国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中外瞩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伟大工程，新一轮的调查研究工作刚刚开始，因此，今版《长城志》数据资料，如长城长度、关城、敌楼、城堡等的统计数字，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于续修中厘定，做到更加准确。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志》原总编室总编）

大英博物馆

展览解析系统简论

李梅

2012年5月底至6月初，在英国使馆文化处中英文化连线项目的帮助下，本人赴英国伦敦学习考察。此次伦敦之行的任务主要围绕博物馆展开，考察期间参观了伦敦博物馆（Museum of London）、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泰特美术馆（Britain Tate）、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等多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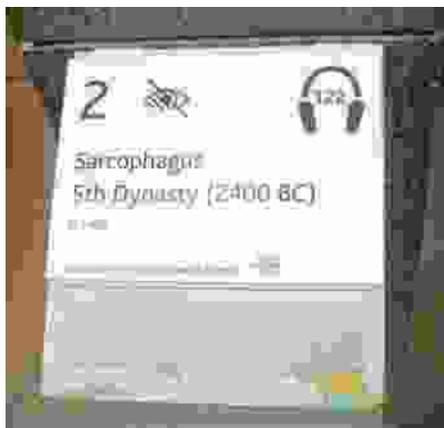
在当今博物馆界，英国博物馆以数量众多、藏品丰富而著称。在英国诸多博物馆中，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比肩为世界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作为世界上较早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收藏世界五大洲的文明珍宝多达600万件，每年接待观众达600万人次之多。大英博物馆展品之丰富令人目眩，观众人数之多为众博物馆所羡慕，展览设计、制作水平为博物馆同行的楷模。大英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界的先驱，在展品收藏与保护、展览设计与制作、博物馆运行与运营等各个方面为博物馆同行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诸多参观体验中，大英博物馆的展览解析系统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一、展览解析系统化

展览解析是指以展品说明文字为主要

形式，以照片、图片、表格以及影音资料等辅助形式构成的展品说明系统。博物馆的展品并不都要用长篇累牍式的解析去诠释，合理区分展品说明的层次是展览解析中重要而必要的步骤。博物馆的观众大体分为专家学者、业内同行、普通游客、学生观众等，因各自不同的知识储备与参观要求，对展览有不同的期望，对展览说明繁简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各具特色的展览主题与展览内容会吸引不同的关注人群，而在同一个展览中不同观众的参观重点不尽相同，基于这些差异，将展览解析系统区分层次与繁简程度。

大英博物馆的展品说明繁简有序、层次分明、深浅有度，以满足不同层次参观人群的要求。在大英博物馆中有一部分展品的说明文字只有名称、时代、年代、编号、捐赠信息等内容（图一）。简明扼要的要素说明，醒目的标志、标识、导览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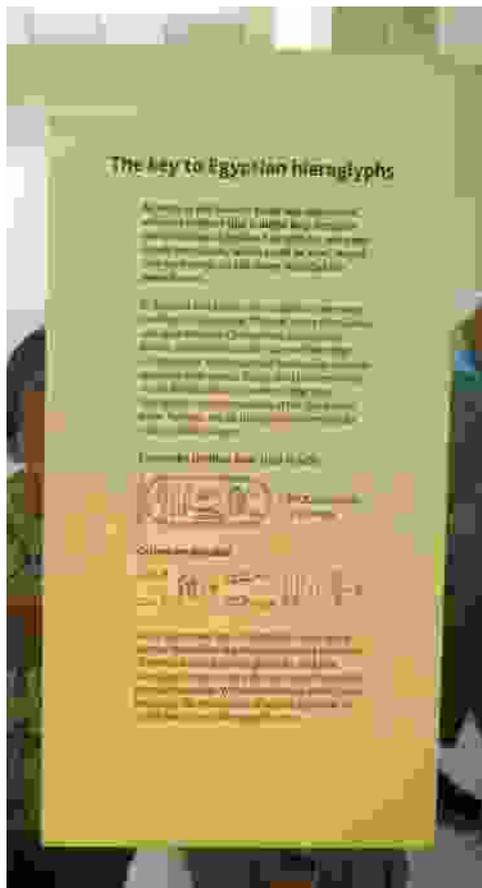


图一 最简洁的说明

为观众宏观、快速、准确了解展览节奏与重点内容提供必要条件，为团队参观提供了有效帮助。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有兴趣的观众可以通过展品的文字介绍、语音导览、背景图示、展柜标识、科研成果展示等多方面、多层次读懂一件展品，理解展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相关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成果等，重点展区及重点展品的展览解析内容为观众深度参观提供最好的帮助。例如在大英博物馆最富盛名的收藏品中有一件“罗塞塔石碑”，博物馆对罗塞塔石碑基本信息介绍非常详细，包括对名称、时代、年代、来源以及这件文物在大英博物馆藏品中“显赫”地位的说明，延伸介绍当时世界历史的主要特点，展示其发现地点的地理位置等内容。除了以上信息的介绍，在展放石碑的玻璃柜上粘贴了四大块展板，分别介绍“什么是罗塞塔石碑”、“埃及古文字”、“罗塞塔石碑的历史”、“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等（图二）。大英博物馆展览解析自成体系，由罗塞塔石碑的说明牌可见一斑。研究人员对这件器物的说明是按照人们的认知习惯，首先介绍到底什么是罗塞塔石碑，给出了明确的概念；之后讲述其来源，建立一个时间轴，以一条纵线介绍这件器物的来龙去脉；第三层介绍罗塞塔石碑的重要性，石碑对于历史、文字、社会等多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介绍与罗塞塔石碑相关联的埃及学等研究领域。对罗塞塔石碑的解析，展现出大英博物馆展览解析体系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完整系统。

二、展览解析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大英博物馆展览解析体系可分为六层，包括基本信息，说明文字、地图、线描图、语音导览、展览手册等。第一层，基本信息，说明展品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捐赠者及捐赠时间等。基本信息即通常所说的展品说明三要素，展品名称、时



图二 罗塞塔石碑说明牌

代、出土地点等。英国博物馆的藏品很多来自捐赠，出于对捐赠者的尊重与纪念，在展品的基本信息中标注捐赠者的姓名为通行的做法。第二层，详细的展品说明。从展品要素的介绍扩展至对展出意义的阐释，还原展品的历史环境，讲述展品所包含的社会信息等。例如，在著名的“Mummy of Katebet”（Katebet 木乃伊）展柜右边的玻璃上张贴了关于埋葬习俗研究成果的介绍文字。以“Magic of the dead: funerary texts”（死亡之魔力——墓葬中的文字）为题，介绍了在古代埃及墓葬中发现大量的保存完好的文献，以文字、图案、符号等形式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解古埃及人对于死亡的认识，对待生命的态度等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这一层的信息介绍，使观众得以深入了解古

埃及丧葬习俗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源于专业研究的成果。第三层,合理使用地图展示空间与范围。在内容设计上将时间解读与空间阐释并重,大量使用地图成为大英博物馆展览说明体系中的一大特色。就人们对事物的接收习惯而言,既需要时间说明,同时还应有空间阐释。在博物馆展览解析中将历史研究与地理研究相融合,将时间轴与空间坐标相结合,以完整再现历史事件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位置。比如,展览中常使用地图说明某个历史事件发生地的位置与环境,这也是国内博物馆的常规做法。而在大英博物馆地图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在展厅入口处的前言介绍中,会用这个时期这一地域在全球的地理位置示意图展现宏观的地理概念,并绘制比例适中的地理环境图示,展示文化生长的地理区域。通过一系列的地图,展示各区域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及相邻文化区域的位置关系,分析文化差异及其分布规律等,将整个展览的解析向纵深推进。第四层,线描图的使用。大英博物馆使用的线描图数量之多为我所见之最。在国内的博物馆中,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展中设计者使用较多的线描图或者手绘纹饰图,国家博物馆新馆“古代中国”展览使用了线描图,在国内各博物馆展览中线描图的使用并不常见。大英博物馆的线描图用于对器物细部特征的描画,古代建筑的复原图,器物使用方式的图解,考古遗址分布图等。线描图比照片更为清晰,有助于提升展览的研究水平,为参观者提供科学详实的研究资料与线索。第五层,“Audio Guider”也就是语音导览,采用语音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解析展览。第六层,展览图册种类多。展览是被固定在博物馆中,而展览的导览册、图书资料等可以被带出博物馆,也是通常所说的“把博物馆带回家”。展览的图录、手册、宣传册以及网络下载资源等扩大了博物馆资源应用的空间,同时也扩展了博物馆为大众服务的范围。在大英博物馆中,固定陈列的展览资料是多层次的,例如按

照不同的参观时间,为观众设计不同的参观路线以及不同的参观重点,包括“Tour 1”、“Tour 2”、“Tour 3”、“Tour 4”、“Tour 5”、“In 1 hour”、“In 2-3 hours”等多种导览方案。临时展览也有专门设计的导览册页,供观众免费取阅,此外还有展览图录出售,为有兴趣做深入研究的观众提供选择。国内的博物馆较常见的是免费取阅的展馆介绍,导览图册的设计上缺乏层次与深度。随着博物馆事业发展,博物馆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注重加强对博物馆自身的研究,对博物馆服务群体的研究,将提升博物馆为大众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三、语音导览体系完善

语音导览既是展览解析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又自成系统。作为一名外国观众,仅通过说明文字了解展品及展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中文版的语音导览为参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既节约时间,又介绍准确的知识信息,避免因语言差异而产生的理解歧义。例如在大英博物馆中庭左边18号展厅为著名的“Pathenon sculptures”,复原了帕台农神庙的部分建筑。此处的语音导览包含对重点文物的单体介绍,还有建筑构件及雕塑的收藏渊源,以及大英博物馆对这些藏品的保护与研究等情况,同时展示大英博物馆为保护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做出的世界性贡献,这也是英国传统的观点。

大英博物馆的语音导览有几个特点。第一,无时间限制。观众可以反复收听感兴趣的展厅或者展品信息。第二,语音导览系统不受展厅场地的限制。观众可以在博物馆的任意位置收听展品与展厅的信息介绍。大英博物馆的语音导览系统采用统一编号,手动输入展品编号可收听到编号对应的展品信息。在咖啡厅边喝咖啡边收听关于“奥古斯都”大帝其人其事也是有趣的体验。第三,信息层级丰富。大英博

物馆语音导览系统有单体文物的介绍，还有文物群组式介绍，以及介绍文明、文化特征的详细信息。整个语音导览系统很像一部有声的展览全书。第四，关联内容的介绍令人受益匪浅。在说明某一件展品时，同时会介绍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相关联展品的信息及其存在的关系。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大英博物馆的语音导览存在差强人意之处。第一点，中文版的语音是港台普通话，而不是我们熟悉的普通话，或者可以说是非标准普通话。第二点，中文显示存在繁简字混用的情况，这种做法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会给大陆游客尤其是学生观众误导。第三点，在导览开头处有一处别字。

以上所提及的大英博物馆语音导览体系中存在的不足，可能因其中文频道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观众，更多的是面向全球华语人士，于是普遍使用繁体中文及港版普通话。

四、科研成果为展览解析体系提供技术保障

在大英博物馆中常会见到大篇幅的展品说明文字，贴在展品说明带上，贴在玻璃柜上，贴在展柜内的背板上，研究者对于上展文字常常字斟句酌，力求以观众可接受的方式有效地传输知识与信息，这需要深厚的研究功底，是展览设计研究水平的一个体现。深入的研究成就优质的展览，行走在大英博物馆的展厅中会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普通市民或者游客可尽情的享受珍贵文物带来的直观震撼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在展厅中一边参观实物资料，一边了解当下研究成果与研究现状。例如大英博物馆中展出一件“SEIANTI HANUNIA TLESNASA”的复原头像，在头像下方展板左边展出了该复原头像的头骨照片以及这件头骨的发现情况，展板右边是三段文字，先介绍头骨与复原头像的关系，并指导观众从其嘴部可比较两者的相似之处，接着介绍了头骨的发现与复原过程，

最后介绍头骨主人死亡的年龄大约为 50 多岁，并详细介绍了对头骨主人年龄的推断依据及对其牙齿科学测定机构等情况。说明文字分别介绍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的情况，展出权威的研究结论。

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本身不一定为专门研究人骨的体质人类学专家，不一定是建筑学家、艺术家、文字学家、材料工程师等各行业专家，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在于从诸多专业的研究成果中选择适用于展出的论据与结论，并通过展览语言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普通观众及非专业人员可以读懂的说明文字，将专业知识与展品相结合，普及知识，激发艺术家与设计者创作灵感。展览设计阶段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对学术成果进行研究、比较、选择，根据展览主题展示相关研究成果。从展览主题到展览实施的整个过程依赖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水平。第一，展览的内容设计以研究作为基础，以保证一个展览必须具备的思想性与创新力。第二，策展人员对展览主题的认知与研究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展览内容的准确与科学。第三，在展览解析中，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层面为展览说明体系的完整性与内容充实度提供保障。

现阶段，国内博物馆许多展览的研究基础欠缺，博物馆研究人员对于展览主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与博物馆展览工作的现状紧密相关。我们的博物馆界普遍存在展览任务多、筹展时间紧、材料缺乏、相关学科研究成果不足等桎梏，以至于完成一个精雕细琢的展览几乎成为众多策展人的梦想。面对现状，需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需要解决博物馆作为文化窗口应当担负的宣传任务，采取短、平、快的处置方案，以尽量少的人力、物力高效完成任务；另一方面，集中精力筹备自主项目，推出高质量、高水准、研究性的展览，提升博物馆展览水平。

五、成功的展览解析体系实现

展览价值

成功的展览解析成就一个成功的展览。无论是固定陈列还是临时展览，内容设计追求展示内容的科学与严谨，形式艺术设计追求设计风格的精致与精彩，以此为基础向大众呈现出的展览涵盖研究与创造的结果，而最终能否在实际展出中表达设计者的创作思想，使展览为广大观众认可、接受、理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展览解析体系是否合理与完备。展览解析体系将展览实质、内涵以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解读、表述、诠释出来。如果说一个展览的主题与设计十分优秀，那么展览解析是将这种“优秀”显现的系统。

例如大英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古代埃及展”，展品为大英博物馆最早的收藏之一，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对展品以及埃及历史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展品信息与相关资料较为丰富，这为展览解析体系提供了保障。大英博物馆的展览解析系统完备，这一点在常设展览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临时展览也有力的展现了展览解析体系的价值。与固定陈列不同，临时展览的主要关注者为博物馆的常客，关注博物馆临时展览的观众同时也是观众群中的“高端用户”，对展览怀着更高的期望。我在大英博物馆中参观了“从阿拉伯到皇家马会的马”、“现代中国水墨画”、“毕加索版画”等临时展览。事实上我对这些展览的主题及内容并不熟悉，看不懂以至于不常看，参观过的画展为数不多，而在大英博物馆展览解析体系的帮助下，感受到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艺术形式的强大感染力。通过参观毕加索的版画展，慢慢阅读丰富的展品说明文字，感受毕加索版画作品所蕴含的高超的艺术价值，以及画家非凡的艺术创造力。“现代中国水墨画展”是一个备受当地观众与外地游客追捧的中国艺术展。展览展出了张大千、林风眠、陈半丁、罗青、黄君璧、傅抱石、吴昌硕、黄永玉、刘国松、齐白石、刘丹等在中国现代书画界极具影

响的人物的作品，并对绝大多数展品做了详细的解读，内容包括了艺术家的生平、艺术风格、艺术生涯、重要代表作品等信息，研究人员对展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向观众解读研究成果。大英博物馆的展览触发了我对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作品的兴趣，尝试去欣赏、品味中国传统艺术作品的精妙。

在博物馆实际工作中对于展览解析文字应当多还是少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展览中过多的使用文字说明、图、表等辅助手段，一定程度上会分散观众对实体文物的参观注意力，以至于重文字轻实物，进而减弱了展览的意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丰富展品说明，借助文字、图、表等形式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于理解文物的意义与价值。事实上，这两种认识都存在局限，文字过少让人看不懂，文字过多则可能会导致参观重心偏离实物展品。英国博物馆界对此存在的分歧未有定论。以大英博物馆为主要代表的多家博物馆目前仍采用第二种做法。英国博物馆展览体系不是一朝形成的，最初的做法是用简单的说明文字介绍展品的基本信息，这一点在英国“古老”的博物馆仍可见到。现阶段展览解析成为体系，注重展示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成果，注重博物馆展览在知识普及上的作用。我们可以展望未来，也许博物馆展览解析优劣的标准不是文字的多与寡，而应是真正实现“繁”、“简”均宜的展示效果。

在国内博物馆界几乎不存在英国博物馆界关于展览说明繁简的讨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到达面临选择繁或简的阶段。我们的展览解析体系尚待建立，展品说明基本停留在展品要素介绍的层面。当下国内博物馆界首先需将展览做深、做细、做精，进而向“深入浅出”的目标努力。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符合继续办馆的法律规定，于2008年2月22日被吊销执照，即北京朝代华夏官窑博物馆。目前开放的29家博物馆中，有22家在北京市文物局登记备案，未备案的7家博物馆包括龙徽葡萄酒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清华大学校史博物馆、龙在天皮影文化博物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博物馆管理办法》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规定，设立博物馆须经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因此，未经北京

市文物局批准备案的这些博物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博物馆，而只是以展室等形式出现，冠以博物馆之名。

现对全区22家在北京市文物局登记备案的博物馆的基本情况说明如下，并作概括分析和思考。

二、调查数据统计

(一) 海淀区境内博物馆数量、位置、电话、隶属关系、建筑面积、展厅面积、占地面积见表一：

表一 海淀区境内博物馆基本情况一览表

名称	地址	电话	隶属关系	建筑面积 (m ²)	展厅面积 (m ²)	占地面积 (m ²)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海淀区复兴路9号	66866114 66866135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60000	40000	80000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31号	62550843 62550819	北京市文物局	6059.4	3388.7	23000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地下一层	62512841	中国人民大学	2000	425	2000
北京艺术博物馆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万寿寺内	68456997 68413380 68472390	北京市文物局	14000	1000	30000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海淀区白石桥五塔寺村24号	62186081 62173543 62174709	北京市文物局	5800	4870	17500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北京大学校内	6275166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4000	2000	8000
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	海淀区香山东万安里1号	62591044	北京市民政局	1000	510	2200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68933341 68933425	中央民族大学	4800	1600	205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	82317512 823175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航空学会	5500	2500	8000
健锐营演武厅	海淀区香山南路红旗村1号	62591609 62594750	北京市文物局	6637	978.76	28668.77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海淀区西三环北路54号	68411369 68416559	中国国家画院	2800	1900	
圆明园展览馆	圆明园遗址公园内	62568872	圆明园管理处	634	500	1500
大觉寺	海淀区苏家坨镇大觉寺路9号	62456163 62461284	北京市文物局	6300	200	40000
中国蜜蜂博物馆	海淀区香山卧佛寺西侧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82590094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180	150	
曹雪芹纪念馆	海淀区北京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	62591561-2028 62595904	北京市植物园	2000	1800	30000

名称	地址	电话	隶属关系	建筑面积 (m ²)	展厅面积 (m ²)	占地面积 (m ²)
香山双清别墅纪念馆	海淀区香山公园内	82590297 62599886	香山公园管理处	497.7	497.7	7862
中国电信博物馆	海淀区学院路42号	58843008 58843047 58843111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12000	7000	3500
北京上庄纳兰性德史迹陈列馆	海淀区上庄乡上庄水库北岸往西300米		海淀区上庄乡政府	1750		15000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海淀区复兴路甲9号	59802288 59802222 59802255	中华世纪坛管理中心	42000	8000	45000
海淀区博物馆	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	51601326 51601325	海淀区文化委员会	1631	754	
中国化工博物馆	北京市北四环西路62号(中国化工集团大厦3层)	82677217 82677715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3940	2540	3940
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	办公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峻峰华亭C-217	传真58772970	北京爱拓电讯设备有限公司	待选址	待选址	待选址

1. 博物馆类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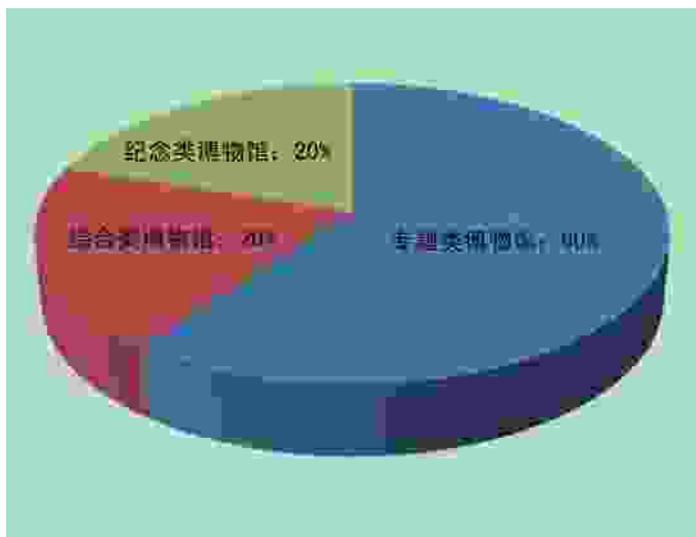
在已有统计的 22 家博物馆中，专题类博物馆 14 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健锐营演武厅、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国蜜蜂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圆明园展览馆、大觉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中国化工博物馆、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占总数的 60%；纪念类博物馆 4 家（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曹

雪芹纪念馆、香山双清别墅纪念馆、北京上庄纳兰性德史迹陈列馆），占总数的 20%；综合类博物馆 4 家（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海淀区博物馆），占总数的 20%，如图二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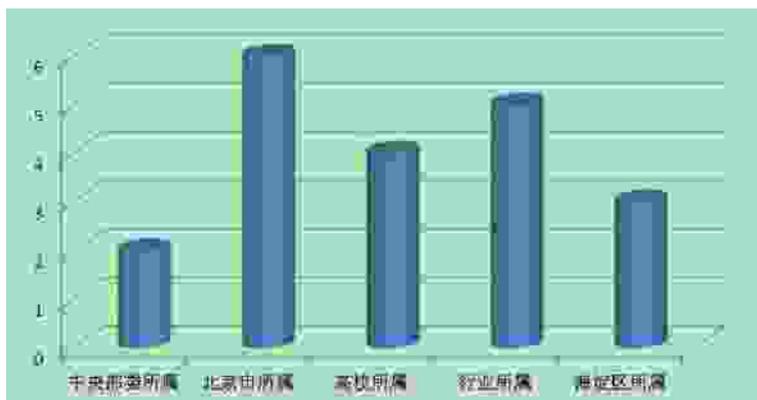
从博物馆类型看，海淀区内的博物馆以专题类居多，综合类博物馆较少，而海淀区博物馆是全区唯一一家地志性综合博物馆，是展示海淀区历史发展，展现海淀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果的窗口。

2. 博物馆隶属关系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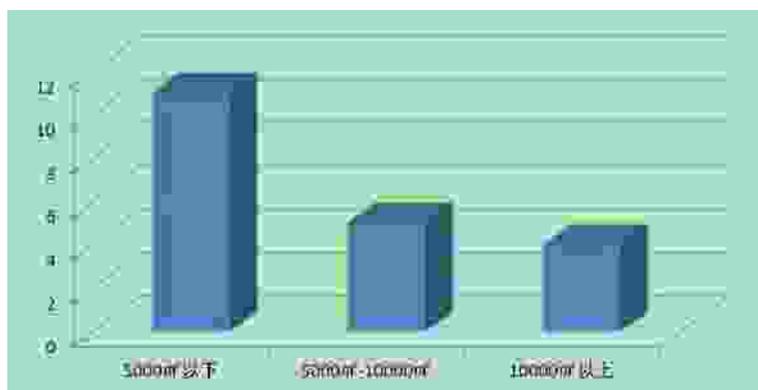
在已有统计的 22 家博物馆中，隶属关系比较复杂，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情况：(1)中央部委所属 2 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2)北京市所属 6 家（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健锐营演武厅、大觉寺）；(3)高校所属 4 家（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4)行业所属 7 家（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图二 博物馆类型比例图



图三 博物馆隶属关系柱状比较图



图四 博物馆建筑面积分析图

中国蜜蜂博物馆、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曹雪芹纪念馆、香山双清别墅纪念馆、中国化工博物馆、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5)海淀区所属3家(圆明园展览馆、北京上庄纳兰性德史迹陈列馆、海淀区博物馆)。海淀区博物馆隶属关系如图三所示。

3. 博物馆建筑面积分析

在已有统计的22家博物馆中，建筑面积5000m²以下的博物馆11家，占总数的55%；建筑面积5000m²以上、10000m²以下的博物馆5家，占总数的25%；建筑面积10000m²以上的博物馆4家，占总数的20%，如图四所示。

(二) 海淀区博物馆地理位置及其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1. 从博物馆地理位置看，海淀区大部分博物馆都位于四环以内，接近市中心；

而四环以外都是遗址类博物馆和高校所属博物馆，这些馆因自身条件限制，无法建在四环以内。博物馆建在接近市中心的区域，不仅交通便利，方便群众的参观，同时也有利于和其它文化、科技、教育单位交流、合作。

2. 从博物馆所在区域的人口密度看，博物馆分布与人口密度成正比。这种分布具有合理性，因为越接近市中心的区域，人口密度越大，对公益性文化设施的需求也越大，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和骨干力量，建在人口密度大的区域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分别为海淀区博物馆副馆长、助理馆员)

北京市延庆县西屯墓地西区 (I区)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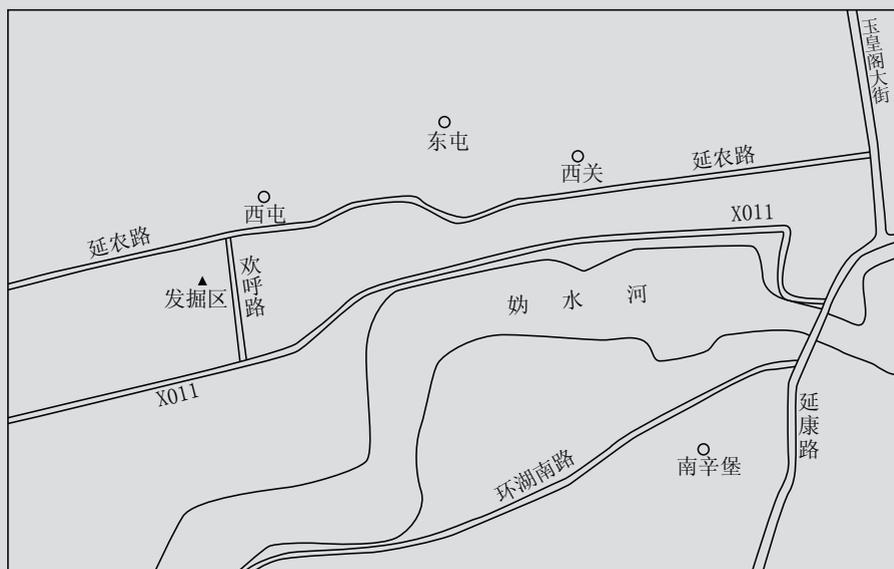
延庆县西屯墓地位于延庆县城西约2公里延庆镇西屯村西南约200米,该墓地北靠燕山余脉冠帽山,南临妫水河,以欢呼路为界,分为西区(I区)和东区(II区)(图一)。2008年10月16日至11月28日,为配合北京市延庆县延庆镇西屯村西南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项目占地范围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了大批古代墓葬。2009年9月4日至11月5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这批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墓葬490座。其中西发掘区(I区)共发现墓葬383座,年代历经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辽代直

至明清时期,其中以汉代墓葬数量最多,北朝十六国和明清时期墓葬次之。现将三个时期的典型墓葬报告如下:

一、汉代墓葬

西区的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共分三层。汉代墓葬开口于第③层堆积下,该层堆积厚0.1~0.2米,深约0.75~0.85米,呈黄褐色花土,土质疏松,夹杂较多褐色颗粒块,内包含少量绳纹瓦片、陶釜残片、砖块等。

墓葬分为瓮棺葬和竖穴土坑墓两种形制。其中土坑墓形制多样,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其次还有少量凸字形、刀把形土坑墓。墓葬的一般葬具为一棺一椁有头厢,随葬品放置头厢内;还有少数墓葬的葬具仅有一棺,随葬品放置于头龕或壁龕内。



图一 延庆西屯墓地发掘区西区位置示意图

葬式以单人葬居多，有一定数量的双人、多人合葬墓。以下分别举例介绍：

1. 瓮棺葬

M10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深1.1米，方向10°（图二）。土坑南北长2.16米，东西宽0.75米，墓壁整齐，口、底同大，墓底较平。葬具由三件陶器组成，两件陶釜相接，位于北部；一件陶瓮位于南部，与陶釜相扣接置。瓮棺内有一具保存较差的婴儿骨架，头向北，面向东，为仰身屈肢葬。墓底南部随葬陶罐2件。

陶瓮1件。M10:1，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唇下饰一周较宽凸弦纹，矮领，圆折肩，圆鼓腹，平底。肩部饰四周细线划纹，腹部饰满斜向绳纹，部分绳纹已磨掉。器身有十一对缀合用的铜孔，当为实用器。口径29.2、最大腹径44.4、底径24.8、高39.8厘米。

陶釜2件。M10:2，夹云母红褐陶。敛口，沿面内斜，尖圆唇，圆肩，弧腹，圜底。肩饰两周凸弦纹，腹部饰竖向绳纹。口径29.3、最大腹径36、高32.5厘米。

M10:3，夹云母红褐陶。敛口，沿面内斜，尖唇，圆肩，弧腹，圜底。腹部及底部饰竖向绳纹。口径26、最大腹径32、高27.5厘米。

陶罐2件。M10:4，泥质灰陶。口微侈，折沿，方唇，直颈，圆肩，鼓腹，平底微凹。上腹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交错绳纹。口径13.2、最大腹径22、底径9.6、高25厘米。M10:5，泥质灰陶。侈口，平沿，方唇，直颈，圆肩，弧腹，平底微凹。上腹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斜向绳纹。口径26、最大腹径21.4、底径7.1、高25.2厘米。

2.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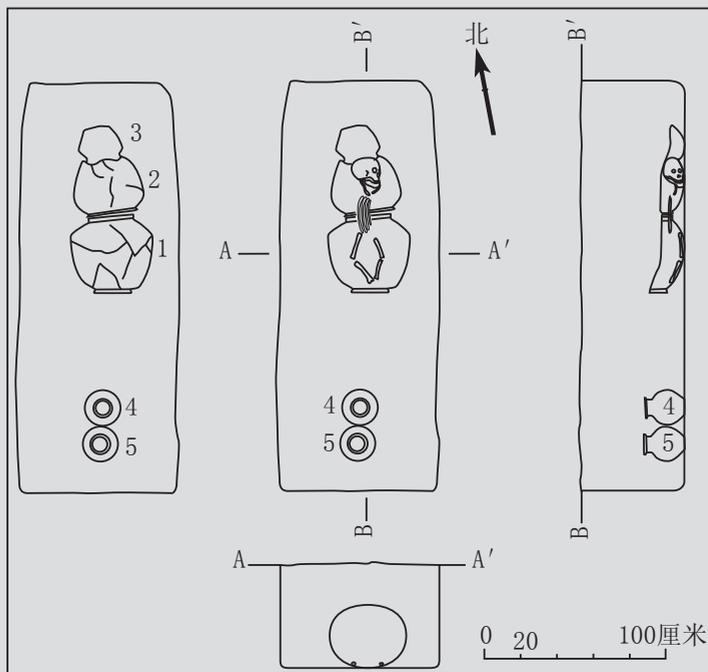
单人葬以M67、M271为例。

M67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

土坑墓，深1.6米，方向358°（图三）。墓葬南北长2.9米，东西宽0.88米，墓壁整齐，口、底同大，墓底较平。葬具为一木棺，已朽，棺痕长1.84米，宽0.48~0.54米，残高0.10米。棺内骨架保存一般，头向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头部两侧各出土铜镜一枚。头厢位于墓底北端，已朽，厢长0.66米，宽0.75米，残高0.10米，内置陶罐2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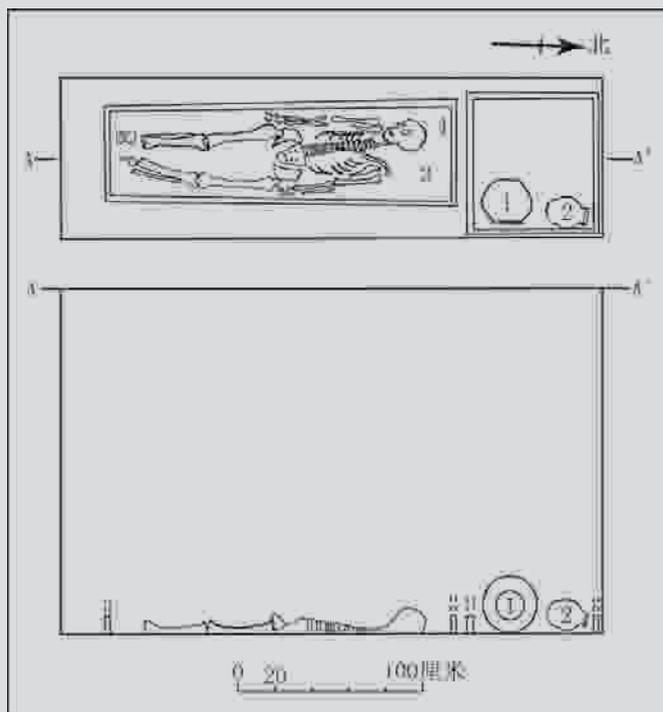
陶罐2件。M67:1，泥质灰陶，轮制。直口微敛，方唇，矮领，圆肩，弧腹，平底。上腹饰七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饰斜向绳纹。口径15.6、最大腹径28.6、底径12.4、高25.2厘米。M67:2，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平沿，方唇，唇下有一周凹槽，束颈，溜肩，弧腹，平底。上腹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斜向绳纹。口径13.6、最大腹径20、底径7.2、高24.6厘米。

铜镜2件。M67:3，四乳草叶纹日光镜，镜钮及镜缘残破。圆形，三弦钮（残），方形钮座。内区为两周凸弦纹方框，内有八字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外区



图二 M10平、剖面图

1. 陶瓮 2、3. 陶釜 4、5. 陶罐



图三 M67平、剖面图
1、2. 陶罐 3、4. 铜镜

为四乳钉草叶纹，间饰二叶花瓣纹。边缘饰十六内向连弧纹。直径10.2厘米，缘厚0.2厘米，钮部厚0.5厘米，重81.7克（图四）。M67:4，四乳草叶纹博局镜，圆形，连峰钮，连弧纹钮座。钮座外主纹饰为四乳钉草叶纹间以四个“V”符号。镜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直径12.3厘米，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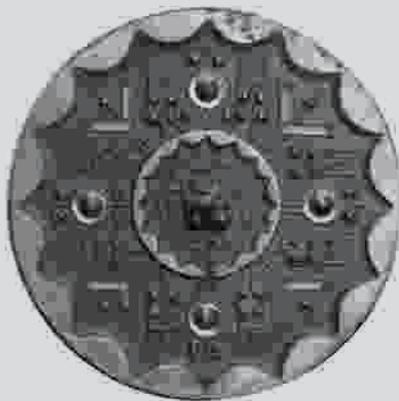


图四 铜镜（M6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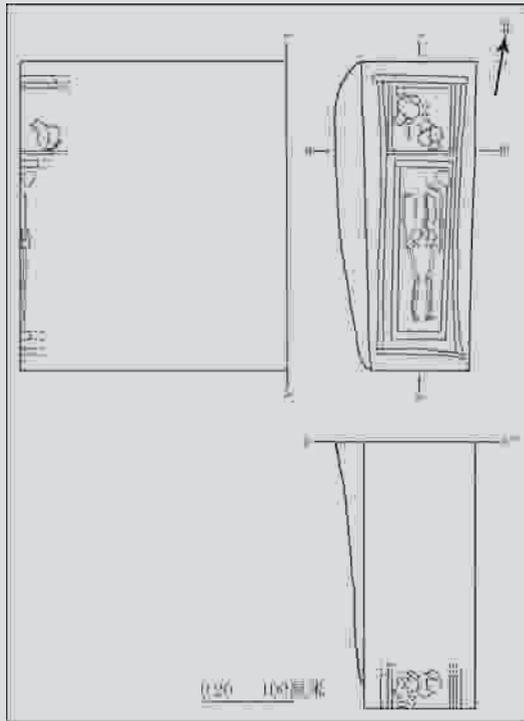
厚0.3厘米，钮部厚1.3厘米，重163克（图五）。

M271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深3.2米，方向342°（图六）。墓口南北长3.72米，东西宽1.2~1.4米，西壁有垮塌，其它墓壁整齐，口、底同大，墓底较平。葬具为一棺一槨，棺槨已朽，槨痕呈长方形，长3.18米，宽0.78米，残高0.10米，残厚0.04~0.08米；棺痕长1.96米，宽0.56~0.58米，残高0.10米，残厚0.06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北，面向东，仰身直肢葬。长方形头厢位于棺的北端、已朽，痕长0.74米，宽0.7米，残高0.1米，残厚0.04米。内置有彩绘陶壶2件、陶盒1件、陶鼎1件。

彩绘陶壶2件。M271:1，泥质灰陶，轮制。口微侈，平沿，方圆唇，直颈，圆肩，鼓腹，圜底，盘状座。颈部饰三组红色三角纹，白彩描边，内填S纹及圆圈纹，间以云气纹；肩部上、下各有二周凸弦纹，间饰两组白彩交错几何纹和红彩勾纹，另附对称兽面铺首；腹饰红彩勾纹。口径13.6、最大腹径30.8、足径14.8、高38.8厘米（图七，3）。M271:2，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平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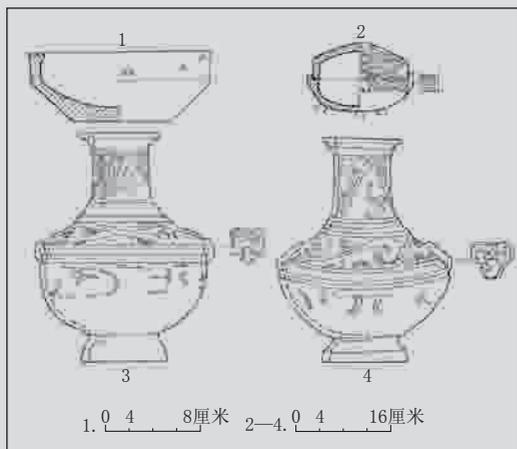
图五 铜镜（M67:4）



图六 M271 平、剖面图

1、2. 彩绘陶壶 3. 陶盒 4. 陶鼎

方唇，微束颈，圆肩，鼓腹，圜底，盘状座。颈部饰三组红色三角纹，内填红色卷云纹，间以卷云纹；肩部上、下各饰二周凸弦纹，间以红、白彩绘相间的云气纹，另附对称兽面铺首；腹部仅留部分红彩痕迹。口径



图七 M271 出土陶器

1. 陶盒 (M271:3) 2. 陶鼎 (M271:4)
3、4. 陶壶 (M271:1、M271:2)

13.8、最大腹径 30、足径 14.8、高 38 厘米 (图七, 4; 图八)。

陶盒 1 件。M271:3, 泥质灰陶, 轮制。子母口, 折腹, 下腹斜收, 平底。腹部仅存少许红彩, 大部分已脱落。口径 15.8、底径 8.3、高 5.8 厘米 (图七,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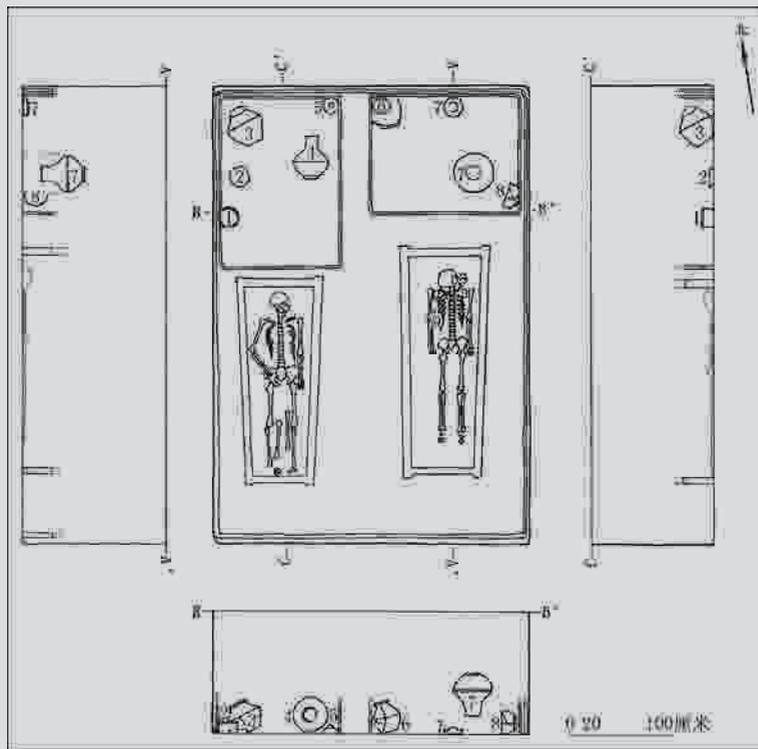
陶鼎 1 件。M271:4, 泥质灰陶, 轮制。覆盘状盖, 弧顶, 直腹微内收。子母口, 浅直腹, 腹饰对称双耳, 耳均残, 圜底, 三足残失。盖顶留部分红彩痕迹, 盖、身腹部均饰红彩几何纹, 间以勾纹。口径 16、残高 10.3 厘米 (图七, 2)。

双人合葬墓以 M381 为例。

M381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深 1.2 米, 方向 5° (图九)。墓口南北长 4.5 米, 东西宽 3.1 米, 墓壁整齐, 口、底同大, 墓底较平。葬具为一椁双棺, 棺椁已朽。椁痕呈长方形, 长 4.4 米, 宽 3.05 米, 残高 0.3 米。椁内置双棺, 东棺长 2.22 米, 宽 0.88 ~ 0.75 米, 残高 0.3 米, 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 头向北, 面向下, 仰身直肢葬; 西棺长 2 米, 宽 0.86 ~ 0.67 米, 棺内骨架保存较完整, 头向北, 面向东, 仰身直肢葬。在两棺的北部各有一长方形头厢, 东侧头厢长 1.5 米, 宽 1.2 米, 残



图八 彩陶壶 (M271:2)



图九 M381平、剖面图

1. 陶鼎 2、5. 陶器盖 3、6. 陶罐 4、7. 陶壶 8. 陶盒 9. 铜带钩

高0.3米，内置陶罐、陶壶、陶盒各1件；西侧头厢长1.7米，宽1.2米，残高0.3米，内置陶鼎、陶壶、陶罐各1件、陶器盖2件。另在东侧棺内人骨腰部出土铜带钩1件。

陶鼎1件。M381:1，夹砂灰陶。子母口，口沿外饰对称双耳，假耳孔，折腹，上腹微外斜，圜底，下立人面蹄状三足。腹饰菱形红彩，底部饰绳纹，足部绘人面红彩。口径20、高19厘米（图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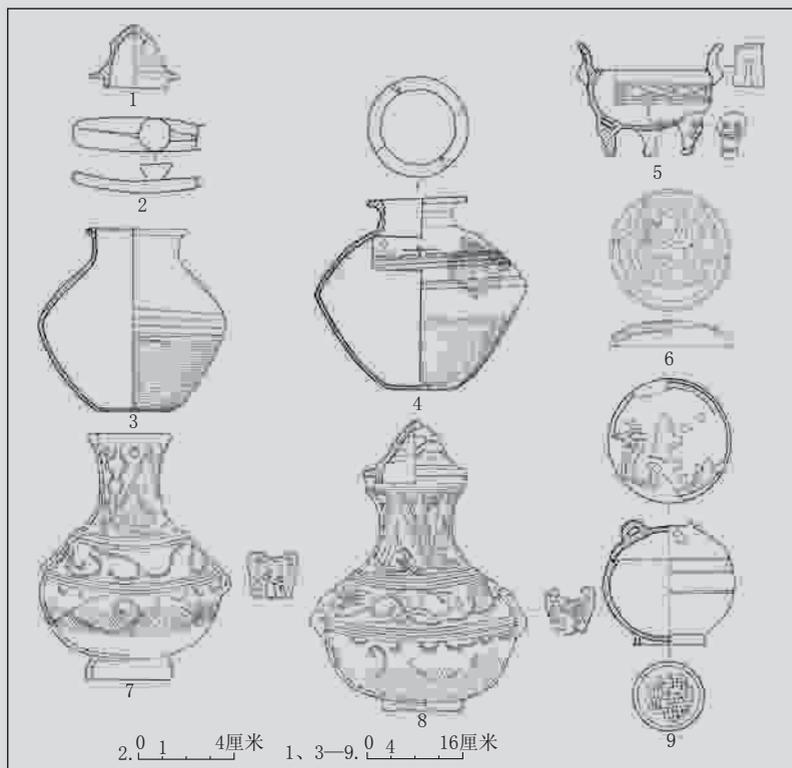
陶器盖2件。M381:2，夹砂灰陶，呈浅盘状，斜圆唇，盖顶浮雕两条三爪龙，龙首对视，张嘴吐舌；龙尾相互缠绕盘结。盖顶残留部分红彩。口径20.6、高4.4厘米（图十，6）。M381:5，夹砂灰陶，轮制。呈博山形，子口，方唇，宽沿，顶部峰峦叠嶂。器表面饰白地红彩，盖顶下部饰一周红彩。直径15.2、高10.2厘米（图十，1）。

陶罐2件。M381:3，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宽平沿，圆唇，直颈，斜肩，折

腹，下腹斜收，小平底。沿面对称刻划一对三角纹和一对竖线纹；颈内、外各饰一周凹弦纹；肩饰五周凹弦纹，局部饰斜向绳纹，另刻划两个“十”字形纹；下腹及底部饰斜向绳纹。口径16.8、最大腹径35.6、底径10.8、高32.5~31.5厘米（图十，4）。M381:6，泥质灰陶，轮制。直口，平沿微内斜，斜圆唇，微束颈，斜肩，折腹，下腹斜收，平底。上腹饰三周凹弦纹，间以两周绳纹，下腹及底部饰横向绳纹。口径17.2、最大腹径31.7、底径12.1、高30.6厘米（图十，3）。

陶壶2件。M381:4，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平沿微凹，尖圆唇，束颈，溜肩，鼓腹，圜底，圈足。颈饰三组白地红彩三角纹，内填圆圈纹及S纹，间以云气纹；肩部上、下各饰二周凸弦纹，间饰红彩勾纹，另肩下附对称兽面铺首，腹上部饰卷云纹，下部饰交错绳纹；足外饰一周凸弦纹。口径14、最大腹径34、足径14.8、高41.8厘米（图十，7；图十一）。M381:7，泥质灰陶，轮制。盘口，尖圆唇，束颈，圆肩，鼓腹，圜底，圈足已残。颈饰四组白地红彩三角纹，内填圆圈纹和S纹，间以红、白相间的卷云纹；肩部的兽面铺首和两组凸弦纹均饰白彩，两组凸弦纹间饰红、白相间的卷云纹；腹部红、白相间的卷云纹和竖向绳纹，部分已磨掉。口覆博山形盖，夹细砂灰陶，盖表面饰白地红彩，盖顶下部饰一周红彩带。口径17.6、最大腹径36.8、残足径14、通高49.6厘米（图十，8；图十二）。

陶盒1件。M381:8，泥质灰陶，口覆钵



图十 M381 出土遗物

- 1、6. 陶器盖 (M381:5、M381:2) 2. 铜带钩 (M381:9) 3、4. 陶罐 (M381:6、M381:3)
5. 陶鼎 (M381:1) 7、8. 陶壶 (M381:4、M381:7) 9. 陶盒 (M381:8)

形盖，盖顶置三个对称半环纽，顶面饰S形白彩带和三片不规则形的红彩，近盖缘处有一周凹弦纹，内填白彩。子母口，圆鼓腹，圜底，圈足。腹上部饰二周红彩带，且有明显轮痕，底部饰交错绳纹。口径20.8、最大腹径22.6、足径12.8、通高21.4厘米(图十,9)。

铜带钩1件。M381:9，残，仅存部分钩身，呈舟状，圆纽。残长5.3、身宽1.1~1.5厘米(图十,2)。

3. 刀把形竖穴土坑墓

刀把形竖穴土坑墓多为双人合葬墓，以M382为例。

M382 该墓为



图十一 彩陶壶 (M381:4)



图十二 彩陶壶 (M381:7)

刀把形竖穴土坑墓，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深1.5米，方向182°（图十三）。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7米，东西宽1.35~1.5米，墓道壁整齐，前段为斜坡状，坡长1.65米，后段为平底，南北长1.1米，距墓口深1.5米。墓室位于墓道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8米，东西宽2.8米，墓壁整齐，底部平坦，距墓口深1.4米。葬具为一椁双棺，棺椁已朽。椁痕呈长方形，长4.14米，宽2.5米，残高0.6米。椁内置双棺，东棺长2.06米，宽0.78~0.66米，残高0.22米，内置骨架已朽，头向北，面向不明，仰身直肢葬；西棺长2.08米，宽0.8~0.65米，残高0.22米，内置骨架已朽，头向北，



图十三 M382 平、剖面图
1—7. 陶罐 8. 陶孟

面向不清，仰身直肢葬。在两棺的北侧有一隔板，与椁北部形成长方形头厢，厢长1.66米，宽2.5米，残高0.6米，内置有陶罐7件，陶孟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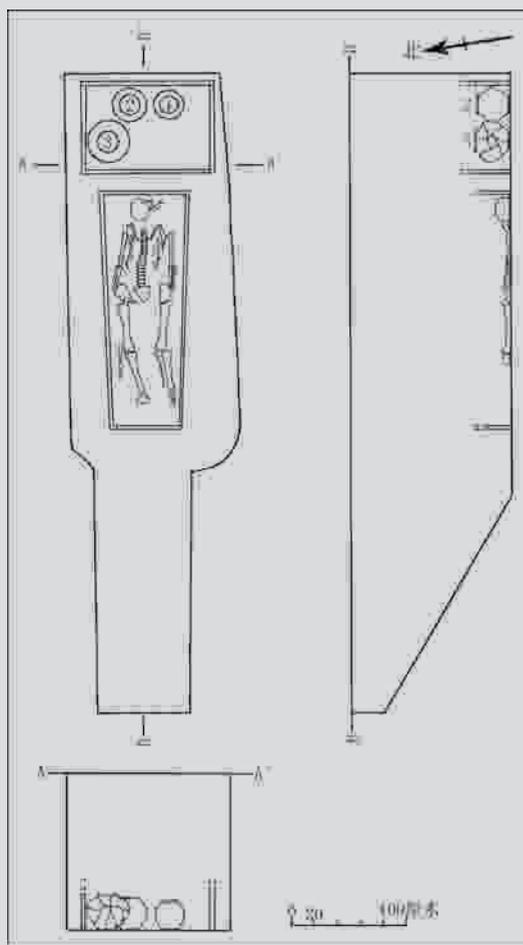
陶罐7件。M382:1，泥质灰陶，轮制。侈口，沿面凸起，束颈，圆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微凹。肩至上腹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斜向绳纹。口径11.1、最大腹径22、底径6.1、高23.5~24厘米。M382:2，泥质灰陶。侈口，平沿，方唇，微束颈，圆肩，弧腹，平底微凹。颈内壁有轮痕，肩至上腹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斜向绳纹。口径12.7、最大腹径21.7、底径6.1、高24~23.4厘米。M382:3，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圆唇，矮领，圆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微凹。肩下及腹部饰三周凹弦纹，间以一周波浪纹，下腹及底部饰横向绳纹。口径17.7、最大腹径33、底径14.6、高29.2厘米。M382:4，泥质灰陶，轮制。侈口，沿面凸起，尖唇，矮领，圆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下腹及底部饰斜向绳纹。口径14.8、最大腹径27、底径12.8、高23~23.5厘米。M382:5，泥质灰陶，轮制。侈口，方唇，矮领，圆肩，圆鼓腹，平底。肩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交错绳纹。口径16.1、最大腹径33.2、底径11.2、高30.8~29.2厘米。M382:6，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圆唇，矮领，圆肩，圆鼓腹，下腹斜收，平底。肩下部至腹饰数周绳纹，下腹及底部饰斜向绳纹，口径16.9、最大腹径33、底径16.6、高26.2~24.8厘米。M382:7，泥质灰陶，轮制。侈口，圆唇，矮领，圆肩，圆鼓腹，下腹弧收，平底。肩及腹部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绳纹。口径14.1、最大腹径28.9、底径12.2、高23.8厘米。

陶孟1件。M382:8，泥质灰陶，轮制。敛口，沿内斜，圆唇，折腹，下腹弧收，平底。腹外饰数周凹弦纹，腹内有明显轮痕。口径17.4、最大腹径17.9、底径7.1、高9.8~8.9厘米。

4. 凸字形竖穴土坑墓

以 M155 为例。

M155 该墓为凸字形竖穴土坑墓，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图十四）。墓深 1.3 米，方向 275°。墓道位于墓室西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 米，南北宽 0.78~0.8 米，墓道壁竖直，墓底呈斜坡状，坡长 2.08 米，坡度 30°，墓道底部距墓口深 1.3 米。墓室位于墓道东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2.9 米，南北宽 1.62~1.88 米，墓壁整齐，口、底同大，墓底较平。葬具为一棺，棺木已朽，棺痕长 1.90 米，宽 0.55~0.68 米，残高 0.20 米，残厚 0.03 米。棺内骨架保存一般，头向东，面向东，仰身直肢葬。长方形头厢位于棺的东端，已朽，厢长 1.02 米，宽 0.70 米，残高 0.31



图十四 M155 平、剖面图
1—3. 陶罐

米，残厚 0.03 米。头厢内置陶罐 3 件。

陶罐 3 件。M155:1，泥质灰陶，轮制。

侈口，方圆唇，高领，圆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肩及上腹饰数周凹弦纹，下腹及底部饰绳纹。口径 14.1、最大腹径 28.8、底径 13、高 26.6~27.3 厘米。M155:2，泥质灰陶，轮制。侈口，方圆唇，高领，圆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肩及上腹饰数周凹弦纹，腹中部一周凹弦纹内填绳纹一周，下部及底部饰网格纹。口径 17.4、最大腹径 31.4、底径 14.8、高 26.4~25.4 厘米。M155:3，泥质灰陶，轮制。侈口，方唇，高领，圆肩，鼓腹，下腹弧收，平底。肩及腹部饰数周凹弦纹间以两周绳纹，底部饰网格纹。口径 18.6、最大腹径 34.2、底径 16.2、高 29.6~29.2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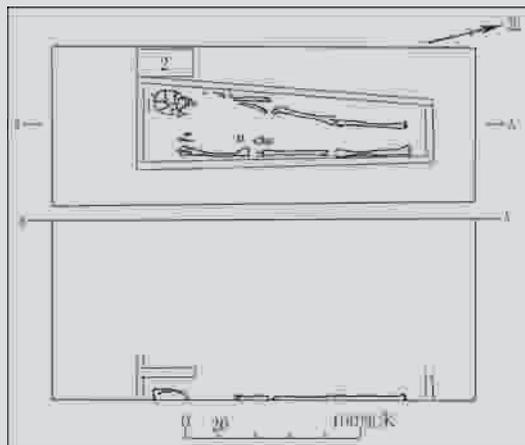
上述这几座墓葬的年代在西汉时期，其中 M67 出土的四乳草叶纹日光镜及草叶纹博局镜是西汉早中期较为典型的铜镜类型；M271、M381 出土的彩陶壶与山西朔县西汉中晚期墓葬出土器物形制与纹饰一致，为判定墓葬的年代提供了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开口于第②层堆积下，该层堆积厚 0.4~0.5 米，深 0.6~0.75 米，呈黄褐色花土，夹杂有褐色土块，土质疏松，颗粒较小，包含有少量残砖、瓦片等。这一时期的墓葬有土坑墓、梯形砖室墓及甲字形带墓道砖室墓三种形制，分别以 M317、M243、M121 为例介绍。

M317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深 1.04 米，方向 195°（图十五）。墓口南北长 2.4 米，东西宽 0.88~0.92 米，墓壁整齐，口、底同大，底部较平。葬具为单棺，棺木已朽。棺痕长 1.68 米，宽 0.54~0.36 米，残高 0.19 米，棺内骨架保存较差，头向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头部出土铜钗 1 件。在墓底西南部棺外清理出墓志砖 1 块。

铜钗 M317:1，钗首圆弧，断面呈三



图十五 M317剖面图
1. 铜钁 2. 墓志砖

角形。双股，一长13厘米，一短9厘米，钁首宽0.6、厚0.5厘米。

墓志砖 M317:2，长方形。铭文为“神龟元年二月十五日燕州上谷郡居庸黠民侯敬宗妻张龙姬”二十五个字，铭文由上到下、由右到左读（图十六）。“神龟”是北魏孝明帝的年号，为判定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确切的纪年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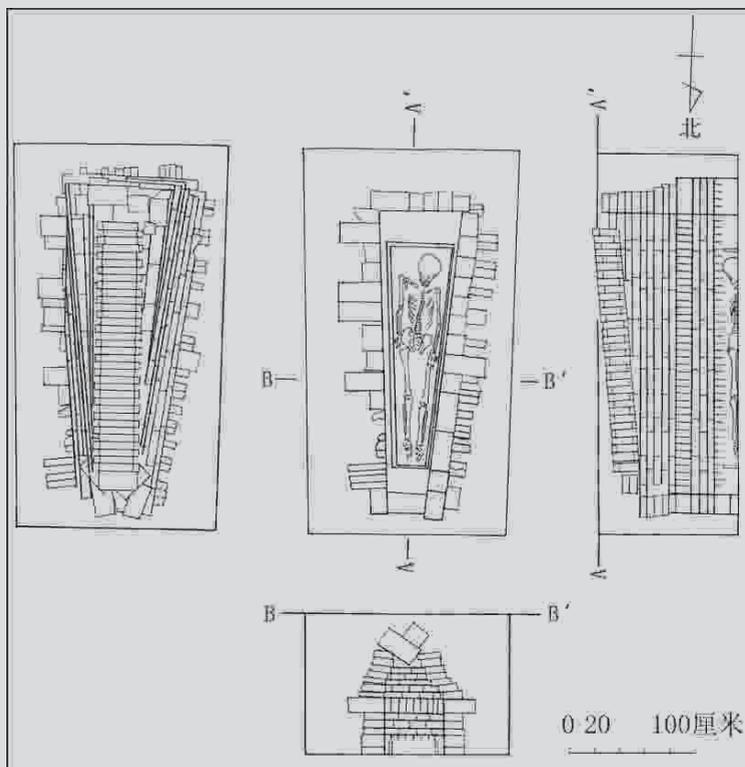
M243 该墓为梯形砖室墓，外有长方形竖穴土



图十六 M317墓志砖拓片（M317:2）

圻，深1.8米，方向183°（图十七）。土圻南北长3.18米，东西宽1.64米，墓壁整齐，口、底同大，底部较平。梯形砖室南宽北窄，南北长2.80米，东西宽0.62~1.2米。墓壁自底部向上一平一竖，再三平一竖，高至0.5米处用平砖顺向错缝叠涩内收，墓顶封砌分两部分，主体部分为两排侧砖交叉砌筑，南北两端为平砖叠错封堵。砖室内长2.32米，宽0.32~0.72米，墓顶南高北低，南高1.2米，北高1米。墓砖规格杂乱，以0.32×0.16×0.06米和0.26×0.13×0.05米两种规格用砖为主，大部分为半砖。墓室内置一棺，棺痕长1.82米，宽0.26~0.52米，残高0.4米。内置骨架一具，骨架保存完整，头向南，面向西，仰身直肢葬。经清理未发现随葬器物。该墓葬形制与北京房山岩上北魏纪年墓相同，年代大致也应该在北魏时期。

M121 该墓为甲字形竖穴土圻砖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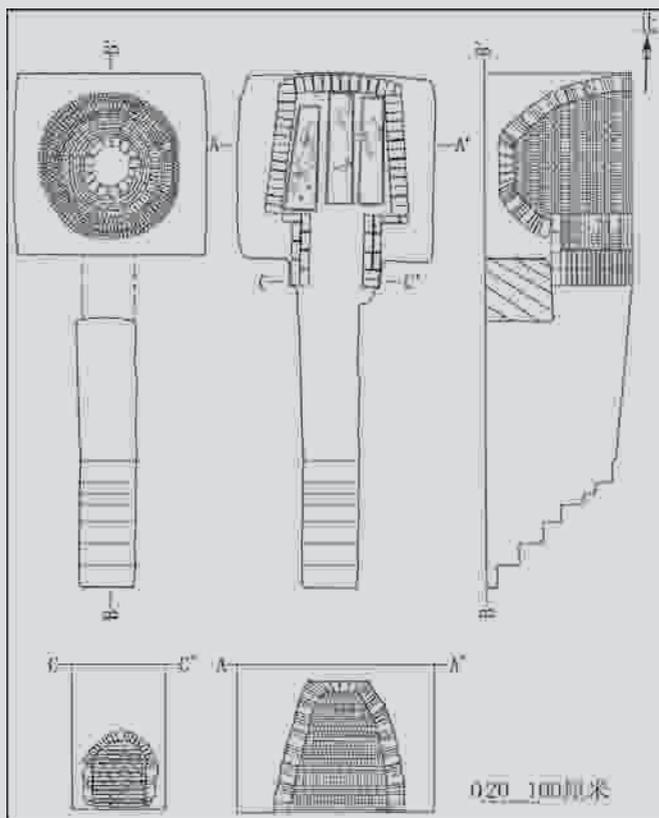
图十七 M243平、剖面图

由墓道、甬道、封门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图十八）。土圹深 2.58 米，方向 175°，南北总长 9.08 米，宽 3.45 米。

墓道：位于甬道的南端。平面呈长方形，长 5.32 米，宽 0.93 ~ 1.60 米，墓壁整齐，墓底自南向北修筑七步台阶，余为斜坡状。第一步台阶面宽 0.93 米，进深 0.40 米，高 0.35 米；第二步台阶面宽 1 米，进深 0.38 米，高 0.42 米；第三步台阶面宽 1 米，进深 0.38 米，高 0.30 米；第四步台阶面宽 1 米，进深 0.30 米，高 0.40 米；第五步台阶面宽 1 米，进深 0.20 米，高 0.20 米；第六步台阶面宽 1 米，进深 0.20 米，高 0.30 米；第七步台阶面宽 1 米，进深 0.38 米，高 0.06 米。斜坡长 3.1 米，坡度为 9°，墓道底部距墓口深 0.2 ~ 2.58 米。

封门、甬道：位于墓道和墓室之间。平面呈长方形，面宽 0.92 米，进深 1.28 米。两壁用青灰砖三平一竖错缝砌筑，高 0.90 米时起券，拱形单券。券顶上的生土向南延伸 0.90 米，与墓道相连接，高 1.40 米。墓门用青灰砖叠压错缝砌筑封堵，厚 0.60 米，高 1.24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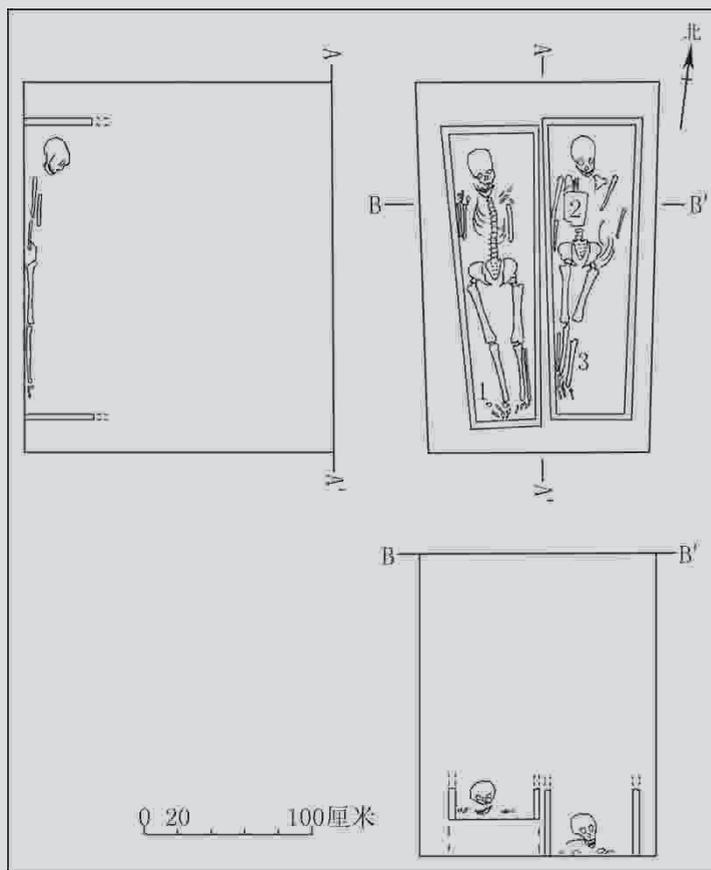
墓室：位于甬道的北端。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18 米，东西宽 1.54 ~ 1.9 米。四壁用青灰砖三顺一丁错缝砌筑，略向外弧曲。砌至高 0.15 米处开始起券，成穹窿顶，砌筑方法仍为三顺一丁，其间用碎砖、石块加以固定，接近墓顶处有楔形砖顺砌，逐渐内收。墓顶已被破坏，在顶部发现一直径为 0.60 ~ 0.70 米的圆形盗洞。墓底用平砖纵横错缝平铺，已被破坏。墓底距残顶高 2.3 米。在墓室底部清理出三棺，被厚厚的淤泥掩埋，均已朽，东棺南北长 1.88 米，东西宽 0.36 米，残高 0.10 米，骨架保存较差，仅留四肢残骨；中棺南北长 1.95 米，东西宽 0.40 ~ 0.44 米，残高



图十八 M121 平、剖面图
1. 铜手镯

0.10 米，骨架保存较差，仅留四肢残骨；西棺南北长 1.82 米，东西宽 0.32 ~ 0.54 米，残高 0.10 米，骨架保存较差，仅留部分肋骨、盆骨及四肢残骨，骨架间清理出铜手镯一对，形制相同，大小一致，编号 M121:1，圆环形，断面呈长方形。外径 7.5、内径 6.5、宽 0.5 厘米。

由于墓葬的后期破坏，西屯墓地西区这批带墓道近方形的单砖室墓中很少见到随葬品。20 余座相同形制的墓葬中仅 M13、M17、M126 三座墓葬出土有少量随葬品。其中 M13 出土的陶牛俑、牛车模型，具有中原地区十六国时期牛车的典型特征。M126 出土的直铭“位至三公”铜镜是从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较为流行的铜镜类型，双夔凤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型纹饰。墓葬形制特征上，墓室四壁向外侧弧曲的特征始于西晋中晚期，直至以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都较为流行；但是从墓道或甬



图十九 M204 平、剖面图
1. 铜钱 2. 陶瓦 3. 铜头簪

道偏于墓室中轴线一侧的特征来看，其年代不会晚于北魏时期。综合以上来看，初步判断 M121 的年代在十六国至北魏时期。

三、明清时期墓葬

明清时期墓葬均开口于第①层堆积下，该层堆积厚 0.25 ~ 0.3 米，呈黄灰色，土质较硬，颗粒较大，包含物有植物根系、现代杂物等。这一时期的墓葬以双人合葬墓数量较多，以 M204 为例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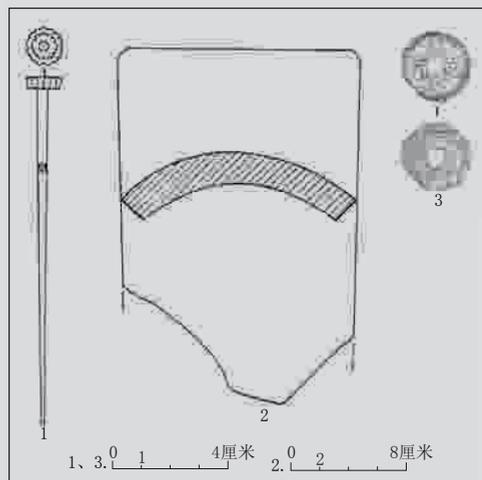
M204 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深 1.8 米，方向 344°（图十九）。墓葬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20 米，东西宽 1.3 ~ 1.45 米，墓壁整齐，口、底同大，底部较平，墓底距墓口深 1.80 米。葬具为双棺，棺木已朽，东棺痕长 1.74 米，宽

0.42 ~ 0.54 米，残高 0.40 米，残厚 0.04 米，棺内骨架保存一般，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西棺痕长 1.70 米，宽 0.36 ~ 0.50 米，残高 0.18 米，残厚 0.04 米，棺内骨架保存一般，头向北，面向上，仰身直肢葬。东棺出土铜头簪 1 件、陶瓦 1 件；西棺内有铜钱 1 枚。

铜簪 M204:3，簪首呈花朵状，上面图案由内、外两组花瓣组成。簪体细直，为锥形。通长 12.2、首直径 1.2、高 0.4 厘米（图二十，1）。

板瓦 M204:2，残，泥质灰陶。整体呈梯形，剖面呈弧形。正面光滑，背面施布纹。长 25.2、宽 16.1 ~ 16.9、厚 1.4 厘米（图二十，2）。

铜钱 M204:1，圆形方穿，正面有郭，铸“万历通宝”四字，楷书，上下右左对读，



图二十 M204 平、剖面图
1. 铜簪 (M204:3) 2. 板瓦 (M204:2)
3. 万历通宝 (M204:1)

背面有郭。直径 2.5、穿径 0.6、郭宽 0.3、厚 0.12 厘米（图二十，3）。



图二十一 M13 牛拉车

四、结 语

延庆县地处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以北，是一处既适于畜牧、又宜于农耕的较为理想的人类聚居环境，其北临边塞，南捍京师，是北京“北门锁匙”，自春秋以降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本次发掘的西屯墓地北靠冠帽山，南临妫水河，是一处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沿用时间较长，墓葬分布比较集中，并且同时期的墓葬很少有打破关系，推测是当时一处有规划的墓地。西发掘区以汉代和



图二十二 M126 出土“位至三公”铜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数量较多，西汉时期墓葬以中小型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出土随葬品以陶罐、陶壶、陶鼎、陶盒等器物组合为主，多面保存完整、典型的汉代草叶纹铜镜、日光镜、昭明镜、博局镜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为判断墓葬的年代提供了依据。东汉时期墓葬以带墓道多室砖室墓形制为主，其中 M100 是该墓地最大的一座砖室墓，为双墓道九墓室，破坏较为严重，但是出土的胡人俑、

羊、马动物俑以及陶马鞍等都较具有地方特色，具有重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 20 余座成排整齐排列的带墓道单砖室墓，可能是按昭穆制度有序埋葬的一处家族墓地，均为多人合葬墓，一般 2~3 人，头朝南，随葬的“牛拉车”陶俑（图二十一）、“位至三公”铜镜（图二十二）等为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特征增添了新的内涵。

该墓地涵盖内容丰富，出土了大量有意义的陶器、铜器以及少量的金器、铁器等，尤其是出土了年代较为确切的汉代铜镜和北魏“神龟元年”墓志砖，为大批汉墓和魏晋时期墓葬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有力依据，对于北京地区汉代至魏晋时期墓葬年代序列的树立和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北京地区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

发掘：朱志刚、丁利娜、张中华、
邹晓天

摄像：丁利娜、王殿平

修复：孙建国、张志伟、雷金福

绘图：孙建国、张志伟、刘凤英

整理：丁利娜、李卫国、刘凤英

执笔：丁利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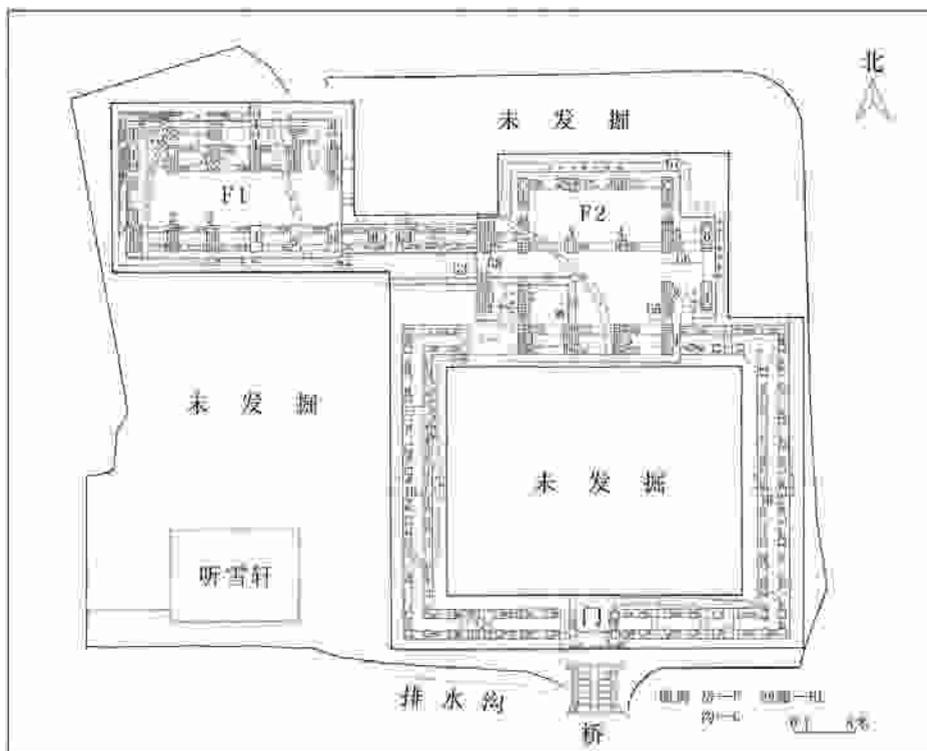
香山静宜园部分遗址 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11年9月23日至10月13日，为配合香山公园管理处的遗址保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香山静宜园内的部分建筑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区位于香山公园的中东部，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主要清理了韵琴斋建筑遗址（编号F1）、致远斋建筑遗址（编号F2）和两处

回廊建筑遗址（编号HL1和HL2）等。在全面清理时，考古发掘区内的东部和西部已有部分建筑基址暴露于地表，其余区域内的地表土中包含有大量植物根系、砖瓦残片、石块等（图一）。

一、韵琴斋建筑遗址（F1）



图一 香山静宜园部分遗址考古发掘平面图

韵琴斋建筑遗址（F1）位于考古发掘区的西北部，东距致远斋建筑遗址（F2）的西山墙基址 11.1 米，南距听雪轩的北台基 22.1 米，西、北两侧均为现代的游园道路。F1 坐北向南，方向 182° ，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7.7 米，南北宽 11.4 米。由于遭到后期的严重破坏，建筑基址残缺不全，仍旧可以见到电缆、水管等现代设施。F1 尚保存有墙基、礅墩、连地炕、散水等遗迹（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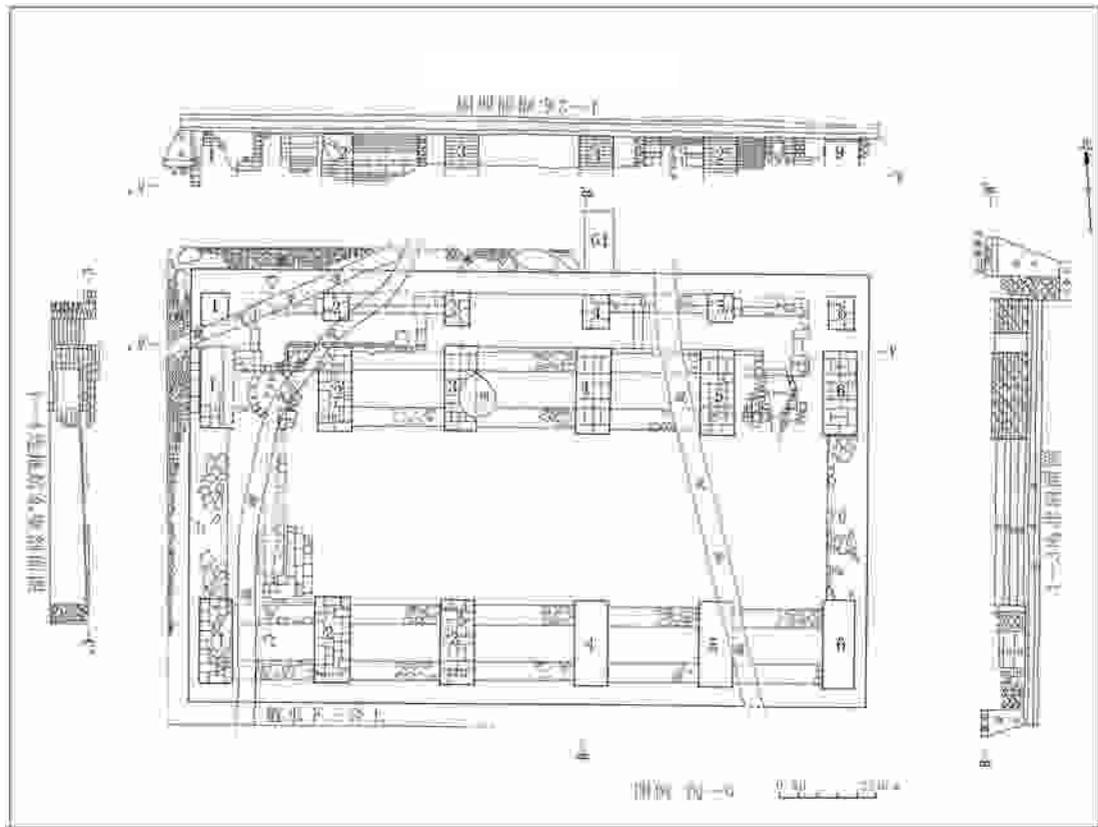
F1 的墙基均由虎皮石加三合土垒砌而成，其中西山墙的墙基保存较为完整。在西边台壁保留一小段台明，其高度为 0.35 米（从残存的鹅卵石散水面计）。台基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残留一件转角石，东南角的转角石石长 0.58 米、宽 0.21 米、残高 0.3 ~ 0.5 米，下面垫以青砖残块；西南

角的转角石石长 0.59 米、宽 0.13 ~ 0.22 米、残高 1 米。西山墙墙基宽 1 米。从清理出的迹象来看，可知西山墙墙基的北部砌在了山体的岩石之上。

在西山墙墙基外西侧和北墙基外北侧各保留有一段散水遗迹，均以鹅卵石铺砌。前者为南北走向，残长 9 米、宽 0.55 ~ 0.6 米；后者为东西走向，残长 8.3 米、宽 0.6 米。前者的北端与后者的西端相连接。

在东山墙墙基东侧有两道东西走向的墙基基础遗迹，南北排列，已发掘的长度为 0.5 米，其中北侧墙基宽 0.75 米，南侧墙基宽 0.50 米。由于这两道墙基的东部被叠压在现代道路之下，无法进行考古发掘，因此其具体的走向、用途、与其他建筑遗迹的关系等情况尚不明确。

F1 由南向北分布着三排礅墩（或者柱坑），第一排北距第二排 4.4 米，第二排



图二 韵琴斋建筑遗址平、剖面图

北距第三排 0.5~0.72 米。每排各有 6 个礅墩（或者柱坑），为叙述方便，分别加以编号，由西向东依次为 1~6 号。第一排礅墩（或者柱坑），平面均为长方形，其中 1~3 号为残存礅墩，均用青砖加白灰垒砌而成，4~6 号为柱坑，可见三合土基础：1 号，残存 4 层青砖，长 2.25 米、宽 0.89 米、残高 0.4 米，部分砌在了山体的岩石之上；2 号，长 2.27 米、宽 0.9 米、残高 0.85 米；3 号，长 2.27 米、宽 0.9 米、残高 0.85 米；4 号，长 2.25 米、宽 0.9 米、深 0.75 米；5 号，长 2.2 米、宽 0.9 米、深 0.75 米；6 号，长 2.23 米、宽 0.9 米、深 0.55~0.9 米。

第二排礅墩，由西向东依次为 1~6 号，平面均为长方形，均为青砖加白灰垒砌而成：1 号，仅残存 4 层青砖，长 2.25 米、宽 0.88 米、残高 0.4 米，部分砌在了山体的岩石之上；2 号，长 2.2 米、宽 0.85 米、残高 1.25 米，其基础建于山体的岩石之上；3 号，长 2.2 米、宽 0.88 米、残高 0.9 米；4 号，长 2.25 米、宽 0.9 米、残高 0.9 米；5 号，长 2.24 米、宽 0.9 米、残高 0.93 米；6 号，仅残留 1 层青砖，长 2.25 米、宽 0.88 米、残高 0.1 米。

第三排礅墩（或者柱坑），由西向东依次为 1~6 号，平面均为长方形，其中 1 号为柱坑，可见三合土基础，2~6 号为残存礅墩，均为青砖加白灰垒砌而成：1 号，长 0.85 米、宽 0.7 米、深 0.76~1.32 米；2 号，长 0.74 米、宽 0.67 米、残高 1.17 米；3 号，长 0.87 米、宽 0.66 米、残高 0.76 米；4 号，长 0.88 米、宽 0.67 米、残高 0.76 米；5 号，长 0.73 米、宽 0.66 米、残高 0.76 米；6 号，残高 0.55 米。

从礅墩（或者柱坑）的形制、大小及平面分布等情况，可以了解 F1 的柱网分布情况，推断 F1 的建筑形式和体量为一处带有前、后廊的面阔五间、进深一间的建筑。

在 F1 北部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处连地炕遗迹。西侧连地炕，由操作间、火门、火膛、火口、火道和烟道六部分组成。操作

间位于北端，平面呈矩尺形，地下室式，东西总长 4.25 米、宽 0.68~1.38 米、残高 0.42~1.18 米。操作间的东壁上方有一长方形壁龛，南壁下有一道小水沟。火门已遭破坏，残存底部的一层青砖，平面为长方形。火膛位于操作间南部，由于破坏严重，仅残存底部，平面呈椭圆形，残长 1.08 米、残宽 0.9 米。火口位于火膛南侧中部，仅残留东壁，残长 0.55 米、残宽 0.25 米、残高 0.6 米。火道位于火口南部，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大部分已被现代管道破坏。火道的东西两侧残存有烟道痕迹，其中东侧 7 条，西侧 2 条。

东侧连地炕的形制与西侧连地炕应大体相同，由于破坏严重，仅残存操作间、火门、火膛和火口等遗迹。操作间位于北端，平面呈矩尺形，地下室式，东西总长 3.95 米、宽 0.72~1.38 米、残高 0.26~0.93 米，底部基础为三合土。火门底部砌青砖残块，南北宽 0.18 米、高 0.09 米，上面为铁框火门，宽 0.29 米、高 0.30 米，铁框之上有砖砌痕迹。火膛上部已被破坏，平面呈椭圆形，上部呈弧状内收，上口长 1.03 米、宽 0.63 米，底部长 1.07 米、宽 0.86 米、残高 0.55~0.9 米。火口位于火膛南端中部，宽 0.24 米。

在 F1 北部第二排 3 号礅墩的北侧清理出一件柱础，青石质，长 0.6 米、宽 0.58 米、高 0.18 米，鼓镜直径 0.43 米。

二、中部回廊建筑遗址（HL1）

该回廊建筑遗址（HL1）大体位于考古发掘区的中部，其西端与韵琴斋建筑遗址（F1）的前廊相连接，东部与致远斋建筑遗址（F2）的西山墙墙基相连接，其中部被一条东北走向的现代地下管道打破。HL1 为东西走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1.1 米、南北宽 2.45~2.48 米。残存的基础均由虎皮石加三合土垒砌而成。从南向北保存着两排礅墩（或者柱坑），每排各有 7 个，残长 0.49~0.65 米、残宽 0.35~0.55

米，有的砌在墙基之上，有的砌在三合土基础之上。在HL1的西部发现一条排水道遗迹，西距F1东山墙墙基3.65米，东距F2西山墙墙基6.55米。排水道仅残存底部遗迹，用青砖残块砌成，东西宽0.9米。

在HL1的北部西侧有两道南北走向的墙基，东西排列，已发掘的长度为0.50米，西侧墙基宽0.7米，东侧墙基宽0.60米。由于这两道墙基的北部被叠压在现代道路之下，无法进行考古发掘，因此其具体的走向、用途、与其他建筑遗迹的关系等情况尚不明确。

三、致远斋建筑遗址（F2）

致远斋建筑遗址（F2）位于考古发掘区的东北部，平面呈“垂”字形，即南、北两端窄、中部宽，东西通长19.7米、南北宽15.8米。F2由南向北分布着4排磴墩（或者柱坑），每排有4或6个磴墩（或者柱坑），磴墩均用青砖加白灰垒砌而成，柱坑则可见三合土基础。为叙述方便，每排按照由西向东的次序分别加以编号。第一排磴墩（或者柱坑）：1～3号，长2.45米、宽0.9米；4号，长2.48米、宽0.88米。第二排磴墩（或者柱坑）：1号，长2.4米、宽0.9米；2号，长2.43米、宽0.9米；3号，长2.48米、宽0.9米；4号，长2.3米、宽0.88米。第三排磴墩（或者柱坑）：1号，长2.45米、宽0.9米；2号，长2.45米、宽0.9米；3号，长0.95米、宽0.88米；4号，长0.95米、宽0.9米；5号，长2.5米、宽0.86米；6号，长2.45米、宽0.86米。第四排磴墩（或者柱坑）：1号，长2.45米、宽0.9米；2号，长1米、宽0.9米；3号，长0.95米、宽0.9米；4号，长2.46米、宽0.88米。从发掘出的磴墩（或者柱坑）的形制、大小及平面分布等情况，可以了解F2的柱网分布，推断F2的建筑形式和体量为一处前有廊、后带抱厦的建筑，前廊和抱厦均面阔三间，中部屋室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前廊东西长14.1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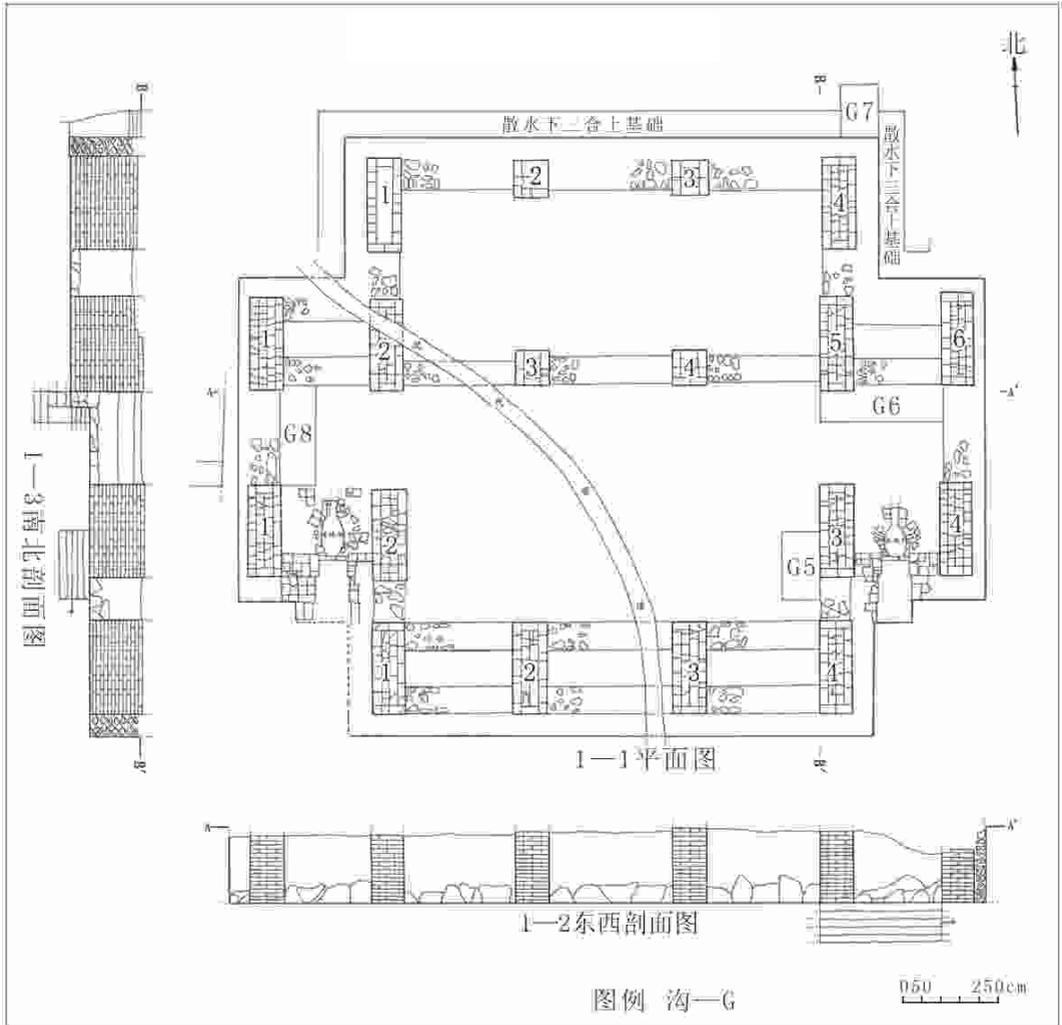
北宽2.4米。有南北并排的两道墙基，由虎皮石加三合土垒砌而成，各宽0.7米。东、西山墙墙基宽1米。后墙墙基宽1.4米（图三）。

F2北部东西两侧各有一处连地炕遗迹。西侧连地炕，操作间位于北部，平面呈“凸”字形，其北端已被破坏，残长1.4米、宽0.73～0.88米。火膛位于南部，平面呈椭圆形，长0.9米、宽0.6米。东侧连地炕，操作间位于北部，平面呈“凸”字形，其北端已被破坏，残长1.65米、宽0.75～1.05米。火膛位于南部，平面呈椭圆形，长0.85米、宽0.6米。这两座连地炕的火道、烟道已被破坏，具体情况不明。

在F2东北角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墙基，以虎皮石堆砌而成，已发掘的长度为1.1米，宽0.6米。由于其北部延伸至现代道路之下，无法进行考古发掘，因此其具体的走向、用途、与其他建筑遗迹的关系等情况尚不明确。

四、致远斋的回廊建筑遗址（HL2）

致远斋的回廊建筑遗址（HL2）位于考古发掘区的东南部，平面呈“回”字形，由四段相连的回廊基址组成，其北段回廊基址与F2前廊基址的东西两端相接。HL2东西总长31.85米、南北总宽26米。西段回廊基址南北长26米、宽2.4米，墙基宽0.7～0.73米。由西向东分布着2排磴墩（或者柱坑），每排各有14个。在西段回廊基址中部的东西两侧各残存一处踏跺基础遗迹，其中东侧踏跺基础还残留有砚窝石，南北长2.6米、东西宽0.4米。在西段回廊基址的北部残留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水道遗迹，长1.95米、宽0.65米，以青砖加白灰垒砌而成。东段回廊基址南北长26米、东西宽2.6米，有东西方向排列的墙基两道，其中东侧墙基宽0.9米，西侧墙基宽0.7～0.73米。在东段回廊的中部残存一处踏跺基



图三 致远斋建筑遗址平、剖面图

础遗迹，与西段回廊的踏踏基础遗迹的位置相对应。北段回廊基址东西长 26.8 米（包含了 F2 前廊基址的长度）、宽 2.35 米。在北段回廊基址的东西两侧各残存一处排水道遗迹，西侧排水道遗迹残长 2.35 米、宽 0.68 米；东侧排水道遗迹残长 1.6 米、宽 0.55 米。南段回廊基址东西长 26.8 米、宽 2.4 ~ 2.45 米。墙基宽 0.7 ~ 0.75 米。由南向北分布着 2 排磴墩（或者柱坑），每排各有 10 个。南段回廊基址的中部是门的基础遗迹，其东西两侧已被破坏，残长 4.45 米、南北残宽 3.6 米。门的基础遗迹的东西两侧

各有两个磴墩，以青砖加白灰垒砌而成。在南段回廊基址的东西两侧各有三条排水道遗迹，排水道均为南北走向，用青砖砌成。由西向东分别加以编号，依次为 1 ~ 6。第 1 条，残长 2.4 米、残宽 0.56 米；第 2 条，残长 2.4 米、残宽 0.63 米；第 3 条，残长 2.2 米、残宽 0.5 米；第 4 条，残长 2.45 米、残宽 0.43 米；第 5 条，残长 2.45 米、残宽 0.65 米；第 6 条，残长 2.45 米、残宽 0.75 米。在南段回廊的南侧有一个青石质的水门，宽 0.39 米、高 0.4 米、厚 0.1 ~ 0.14 米。

五、考古发掘区中的早期建筑遗址

通过考古发掘,根据地层关系、遗址的开口层位以及建筑基址的构造方式、建筑构件的形制等情况,我们认为上述发掘的韵琴斋建筑遗址(F1)、回廊建筑遗址(HL1和HL2)和致远斋建筑遗址(F2)(即此次考古发掘的主体建筑遗址)为同一历史时期的遗存。

此外,我们在韵琴斋建筑遗址(F1)内、中部回廊建筑遗址(HL1)的南侧和致远斋建筑遗址(F2)内分别发现了三处早于此次考古发掘的主体建筑遗址的遗迹(本文称之为早期建筑遗址)。这三处早期建筑遗址均叠压于主体建筑遗址之下,且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打破关系。

在韵琴斋建筑遗址(F1)内的西部发现了一段墙基,为虎皮石加三合土垒砌而成,呈南北走向,南北长4.4米,东西宽1.1米,其南端和北端分别被F1的第一排3号礅墩和第二排的3号礅墩打破。在中部回廊建筑遗址(HL1)的南侧发现了一段墙基,也为虎皮石加三合土垒砌而成,为东西走向,长6.4米,宽0.62~0.65米,其东端被F2的西山墙墙基打破。在致远斋建筑遗址(F2)内的西南部,发现了一段东西走向的墙基和一段南北走向的墙基,其长度分别为4.4米和4.06米。前者的东端和后者的北端相接,其中前者的西端被F2的西山墙墙基打破,与中部回廊建筑遗址(HL1)的南侧早期墙基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后者的南端被F2的礅墩打破。此外,在这两条早期墙基的南侧有一片早期砖砌遗迹现象和一件长方形青石质的地漏。地漏长0.58米、宽0.55米、厚0.14米,其平面明显低于F2内的礅墩,地漏内的排水道为青砖垒砌而成,向东部延伸。根据香山公园管理处此次遗址保护的目標和要求,我们没能对这三处早期建筑遗址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入的考古发掘工作,因而对其整体存在状况不得而知。

六、小结

静宜园位于香山的东坡,是著名的清代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之一。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初步建成,作为皇帝临幸、驻蹕、游玩的行宫。乾隆年间,开始大规模的营造建设。根据乾隆御制的《静宜园记》所述:“乾隆乙丑秋七月始廓香山之郭,荆榛莽,剔瓦砾,即旧行宫之基,葺园筑室。佛殿琳宫,参错相望。而峰头岭腹,凡可占山川之秀,供揽结之奇者,为亭、为轩、为庐、为广、为舫室、为蜗寮,自四柱以至数楹,添置若干区。越明年丙寅春三月而园成,非创也,盖因也。”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式定其名为“静宜园”。之后,静宜园的营造工程仍旧陆续进行。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掠夺并焚烧了“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内的珍宝、文物等被劫掠一空,建筑名胜等也遭到了焚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使香山静宜园再次经历了浩劫。此后,香山静宜园基本处于荒废之中。

香山静宜园在其全盛时期,包括内垣、外垣和别垣三大部分。内垣位于静宜园的东南部,是该园规模最大的建筑、景致荟萃区。此次考古发掘的致远斋建筑遗址即位于内垣中宫殿区的正殿勤政殿的北部。致远斋是皇帝接见臣僚、批阅奏章之处,其西侧即为韵琴斋。致远斋和韵琴斋均毁于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两次侵略战争之中,而民国时期在原址基础上简单地进行了修葺。根据地层关系、遗址的开口层位以及建筑基址的构造方式、建筑构件的形制等情况,我们认为此次考古发掘的主体建筑遗址应为民国时期的建筑遗存,而另外的三处早期建筑遗址应为清代建筑遗存。

执笔:孙勣、董育纲、刘凤亮
发掘:孙勣、董育纲、刘凤亮
绘图:李青娥

北京古代的窖藏遗存

郭京宁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北京发现过形形色色的古代窖藏，共约 96 处。^①需要说明的是，考古记录上的“窖穴”被一些学者视同为“灰坑”。^②笔者认为，“灰坑”的含义较为广泛，有意识的储藏物品的窖穴和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垃圾灰坑还是有区别的，反映了使用者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应该加以分辨。本文中的“窖藏”指作为仓库专门储藏物品以便再次利用的一类遗迹。

一、类型

以藏品不同区分，可分为以下几种。

1. 古钱币

该类型是最多的，约占总窖藏数量的一半。

1957 年，朝阳区呼家楼北京机械学校操场发现战国钱币窖藏 1 座。为一方坑，共出土各种铸币 3876 枚。铜币出土时，是成捆绑扎在一起的。^③这批铜币分为刀、布两种，以“匱”字刀币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71%。

1964 年，德胜门外六铺炕东出土一批战国刀币，出土时全部堆在一起，上下叠压在一个土坑内，具体数目不清。

1966 年，通州永顺地区杨庄发现战国刀币 15 公斤。古币纵横摆放在一个土坑内。

1967 年，顺义大孙各庄镇尹家府村辽金时期窖藏，出土铜钱 200 公斤。

1970 年，延庆县城外工地发现窖藏战国金属铸币 1 罐，重约 20 公斤，属方折式“匱”字刀币。^④

1978 年，延庆香营公社辛堡村发现窖藏燕尖首刀币 1 瓮，重约 30 公斤，计 1350 枚。^⑤

1978 年，朝阳区和平街北口发现一灰陶瓮，内贮古币 100—150 公斤。计有汉四铢、半两、武帝五铢、东汉五铢及东汉磨郭、剪轮、私铸五铢钱等。

1979 年，怀柔泉河街道怀柔镇西北角土坑内出土战国刀币 3 公斤。

1980 年，顺义张镇镇大故现村，在长 1 米、宽 0.8 米石板铺就的石室中，叠放宋代淳化、端拱、政和、大观通宝，辽代天显、大同、应历通宝，金代泰和、大定、大安通宝铜钱五万余枚。

1981 年，房山北庄出土一陶罐，上扣六釜铁锅，内有宋、金时期钱币 35 公斤。原崇文区东晓市药王庙内施工时发现一瓷坛，内装银元宝 10 个。2 个较大，每个重 1875 克；小的 8 个，每个重 375 克，共重

6750克。此外还有清光绪朝和民国时期的银元99枚。门头沟清水镇燕家台村西龙门涧内出土商代贝币100余枚，有大、中、小三种规格。通州张家湾镇烧酒巷村发现一方形土坑，体积1.44立方米，出土汉代五铢铜钱约1吨。

1982年，顺义李桥镇北河村南，在一陶罐中发现300余公斤汉五铢钱。顺义高丽营镇南郎中村，在一陶罐内发现明代钱币约300公斤。怀柔北房镇南房村出土宋代铜钱50公斤，装在一元代六釜铁锅内。密云大城子镇后张庄出土燕国“明刀”45公斤，盛于两个陶罐内。密云十里堡镇岭东村出土汉代五铢钱40公斤，盛于一陶罐内。通州西集镇金各庄村发现一大型灰陶罐，罐口覆一陶盆，出土西汉半两、五铢、唐“开元通宝”与北宋各朝代铜钱约350公斤。

1983年，房山南韩继村发现窖藏战国金属铸币一罐，共5捆，重约5公斤多，以绳索贯穿刀币环首，属弧背式“匱”字刀币。^⑥朝阳大屯小营村东发现一宋代古币窖藏，出土宋代建隆、开宝、雍熙、淳化通宝50公斤。密云城关镇一街教育局院内出土唐开元、乾元通宝147枚，盛于一陶罐内。延庆镇付余屯村北出土钱币47.5公斤，多为宋钱，少数为汉、唐钱币。次年，又在同村东出土唐宋铜钱90公斤。

1984年，大兴黄村发现一陶罐，内装有10公斤的铜钱，大部分属宋代，杂有唐、金时期。顺义大孙各庄镇大段村发现一陶罐，内存南宋钱币约250公斤。延庆香营乡辛庄堡村出土战国燕刀15公斤，主要有“明字刀”和“尖首刀”等。延庆镇王庄村向阳化工厂院内出土钱币90公斤，装在一灰陶瓮内。多数是东汉五铢钱，有少量王莽货泉。

1985年，平谷东高村镇西高村出土宋代淳化、咸平、祥兴通宝铜钱150公斤，装在一铁釜釜内。平谷上宅村发现成串叠放的钱币16.5公斤，共3398枚。年代有汉、唐、南唐、北宋、南宋、金。

1985年，房山石楼村发现金属铸币一

瓮。瓮高约0.72米，腹径约0.6米，上盖石板，内装有燕刀币400余公斤。^⑦房山周口店车厂村发现清代元宝12个，分大小两种。大部分上面印有戳记，标明元宝的所铸银号、作坊、成色、姓氏，如“隆祥良作”等。密云十里铺镇统军庄发现民国银元40块，盛于一陶罐内。通州宋庄镇西赵村南口发现一辽代砖砌方坑，容积约0.125立方米。条砖草砌，上覆一块方砖。出土北宋铜钱50公斤。品种齐全，版别较多，对子钱较多。

1986年，石景山鲁谷街道衙门口村西北出土铜钱3.5公斤，近1万枚。计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四种。五铢约占85%。最早的是西汉半两，最晚的是东汉晚期的四出五铢等。顺义北小营镇北府村，在一陶罐内发现宋钱150公斤。大兴黄村老街，发现清咸丰铁钱窖藏一处。窖用砖砌成长方形，长0.9米、宽0.5米、深0.8米。上盖石板，共出土铁钱500公斤。面书“咸丰重宝”。延庆镇米家堡村出土战国“明刀”5公斤，大部分锈在一起，完整者130余枚。延庆千家店花盆村出土辽金钱币100公斤，装在一陶罐内。

1987年，大兴黄村镇高家堡发现一钱币窖藏，重6.5公斤，年代为唐、北宋等。

1988年，昌平马池口辛店发现一陶罐，内装铜钱242.5公斤，均为唐、宋时期。

1989年，通州马驹桥大葛庄发现一钱币窖藏，在一铲碎的酱釉平底瓷罐中，出土唐、北宋、南宋铜钱25公斤。房山霞云岭龙门台出土战国刀币约400枚。

1990年，房山青龙湖豆各庄西南，发现汉代红、灰夹砂陶罐5件，罐内装满五铢钱，重约600公斤。

2000年，延庆大榆树镇北小泥河桥北侧发现二个陶罐盛有古钱，因遭哄抢，仅收集到30余枚，大多为东汉五铢，并有少量王莽时货泉。延庆镇南关康安小区发现元丰通宝、祥符通宝等北宋钱币400余枚及少量唐开元通宝，还有陶器残片等。延庆镇东大街发现古币，主要为开元通宝及少数隋五铢、乾元重宝等。通州张家湾镇

北仪阁发现一方形砖坑，出土汉代“五铢”钱数十公斤。

2001年，房山金陵主陵区第四台地清代修葺的金世宗小宝顶西侧20米，发现一处铜钱窖藏。铜钱直接埋于土坑中，坑直径约90厘米，深约30厘米。铜钱码放整齐，出土时串联的绳索痕迹清晰可辨（图一）。钱币计2255枚，分属西汉、唐代、五代十国、北宋、南宋、金代。推定该窖的埋入时间在大定年间。^⑥



图一 金陵铜钱出土情况

2008年，大兴康庄发现一辽金时期的钱币窖藏，出土时已被破坏，铜钱放于陶瓮内，时代有唐、辽、南宋等。^⑦

2. 瓷器

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兴青云店农民发现瓷器窖藏，出土时放在一荷花缸内。1983年追回瓷器8件。其中有乾隆青花鼎式壶、光绪青花天球瓶、青花盘、红釉穿带瓶等。

1961年，通州永乐店镇永乐店村发现明代青花象耳瓶2件、青花加彩香筒1件、青花三足炉1件、珐华三彩器2件、三彩蜡台2件。

1964年，朝阳太阳宫北郊药王庙出土一明青花人物瓷坛1件、青花龙纹盘1件、“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开光人物罐1件、“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松梅纹罐1件、青花花鸟纹罐1件、青花盘1件和清康熙青花开光博古纹罐1件。

1970年，旧鼓楼大街豁口东发现窖一座。窖深不到1米，上面覆盖一个陶盆。内藏10件青花瓷和6件影青瓷。^⑧两件影青瓷碗的底部均有墨书八思巴文字，音译汉字为“张”或“章”。在瓷器上以八思巴文书写姓氏当在泰定二年（1325年）以后，由此便可判定这批瓷器为元代晚期。

这批瓷器中，就包括著名的元青花凤首扁壶。通州张家湾镇张家湾村发现明代青花龙凤纹六孔小瓶1件、黄釉暗花龙凤纹盘1件，同时伴出的还有水晶翠饰2件。

1971年，昌平东小口霍营出土明代龙泉三足炉1件，龙泉双耳瓶4件。昌平流村镇郎儿峪发现明代龙泉青瓷坐佛3尊。通州漷县镇郭庄发现明代五彩盘1件、青花人物碗1件、青花盘5件。

1975年，东华门内孔德前巷发现一瓷器窖藏，出土有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五个年号款识的瓷器，皆为黄釉青花瓷盘，盘底均涂有一圆孔或书一个“甜”字。据《天府广记》载，此为宫内甜食房专用盘。

1977年，海淀区双榆树街道大钟寺后墙出土五彩盘、青花碗、盏托等共129件，多属道光、同治和光绪朝制品。

1984年，通州西集镇张各庄村在土坑内发现罐、碗、盘、壶、瓶类瓷器100余件。其中有康熙民窑青花大碗一对、足底外文标识与商标外销套盘、胭脂红花口垂腹料瓶，多为晚清及民国制品。

1985年，房山南关发现一瓷器窖藏，出土酱釉鸡腿瓶2件，双系黑釉罐1件。房山城关顾册村出土磁州窑圈足碗1件、酱釉瓷罐1件。

1986年,大兴礼贤镇东梁各庄发现清代瓷器200多件。类型有碗、盘、碟、壶、笔筒、帽筒、花盆、酒杯、汤匙等,釉色有青花、粉彩、豆青等。出土时全部放在一大缸内,保存完整。

1987年,房山石楼镇二站村东出土唐代白瓷盘1件、双系酱釉瓷罐1件。

1996年,通州梨园镇大稿村出土一清代乾隆官窑青花大鱼缸,上盖青石板,内有碗、盘瓷器以沙土稳置,其中有乾隆官窑青花碗一对;缸外侧埋有瓶、罐类较大瓷器,多为晚清民窑制品,共计190余件。

3. 铜器

1950年,房山窦店出土战国晚期铜铃8个。

1956年,西便门外发现一处辽代铜器窖藏,出土圆盒、水注、匱等17件,^①可能是寺庙的祭器。

1970年,宣武医院对面下斜街纳鞋社院内地下3米处,发现一处元代铜镜窖藏。25面铜镜按大小顺序排列双行。直径26厘米的大型素面镜9件,直径21厘米的云鹤铜镜3件,直径16.8厘米的鸾兽葡萄镜1件,直径16—19厘米的双鱼铜镜12件,是北京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的铜镜窖藏。^②

1975年,延庆县西拔子驻军在地东古河滩修路取土,距地表深约1米的砂窝地里发现一批窖藏青铜器。包括兵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狩猎工具和装饰品等共53件。^③

4. 铁器

1961年,房山焦庄村出土辽金时期铁器64件,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两类。有锄、镰、铍、刀等。^④

1973年,安定门内炮局胡同东口发现明代铁炮38门,整齐排列在一起,除两门小型竹节炮外,其它36门均为牛腿形炮。

1983年,房山琉璃河常舍村东出土辽代铁六釜锅6口,其中3口破损,尺寸与造型均相同。

1985年,延庆西屯出土元代六釜锅5口,铁锄20把。

1986年,门头沟斋堂镇东斋堂村出土汉代箭镞125枚,长0.2—0.25米,铜头铁铤,完整者69枚。箭头为黄铜质,三面锥形,十分锋利。怀柔长哨营满族乡二松沟的元代窖藏,出土金代铁犁铍、炊具和元代盔甲等30件。

5. 其它

20世纪50年代对房山石经山九个藏经洞和云居寺南塔前的地穴清理中,出有隋至明的佛经刻石近一万五千石。^⑤

1960年,房山闫村焦庄村西出土陶壶4件,1件有盖。还有红、灰夹砂陶鬲各1件。

1984年,房山良乡富庄村出土唐代鎏金铜牛角杯2件。

6. 混合

这类窖藏的物品种类不单一,由多种质地的文物构成。

1952年,西城南礼士路南市儿童医院内出土一批陶瓷器。有金代陶迦罗频伽、黑釉双耳陶罐、黑釉四耳陶罐、白釉三耳壶、白釉小瓷碟,元代釉陶水壶、陶盘、白瓷杯、黑白釉四耳瓶、黑半釉双耳瓶、钧釉盘及鸡腿瓶等共14件。原宣武区太平街路西陶然亭公园内的一土坑内,发现有辽代黑釉罐、瓶、酱釉壶和陶质迦罗频伽,金代白釉碗、碟,元代钧釉炉、佛头、铜印、灯等21件器物。

1958年,顺义大故村西小学院内发现一长1米、宽0.8米的窖。底部平铺大石块,上置铜钱约5万多枚。种类有淳化、皇宋、大观、绍兴等23种宋、金钱。其中时代最早的一枚是“太平”,最晚的一枚是“绍兴”。^⑥还有铁农器2件及圆形铁器1件。^⑦

1964年,西城石碑胡同出土元代青釉瓷狮1件、白釉杯1件、陶俑1件。

1969年,房山良乡南街发现一窖藏,计有瓷器35件、铁器13件、铜器4件。这些器物大部分装在两口大缸内。瓷器的盘、罐底部有墨书,推测可能是元代良乡驿站的小吏埋藏的。^⑧房山良乡南街药材批发部内出土枢府釉印花瓷盘4件、钧釉瓷

盘3件、钧釉双系罐2件、白釉黑花罐3件、黑釉罐、黑釉梅瓶、白釉黑凤纹大罐各1件、双耳铁锅2件、三系耳铁壶1件、木把铁穿子1件、弯把铁铲1把。

1973年，通州城北某地发现两块铜佛版和两件缸胎小罐。佛版长16.5厘米、宽9.8厘米。一面铸小佛共10行，每行10尊小佛，另一面有把手，上下刻四兽。一边铸“河东南路都僧录特授赐紫文妙大师口善广口”；另一边铸“皇统戊辰岁次十一月日记平阳府李稀造”。^⑩

1975年12月，平谷夏各庄镇张各庄村出土汉代彩陶壶、博山炉等12件陶器，同时伴出的还有铁剑1把和五铢钱130枚。

1977年，门头沟硃窝电厂发现一窖藏，出土各类器物20余件，上盖布纹瓦。有蟹青色沙胎瓷砚、歙石砚、红褐色缸胎瓷鸡腿瓶、双耳砂胎小瓷瓶、宋代铜钱等。^⑪

1978年，门头沟齐家庄中学发现金代窖藏，方形坑东西1.17米、南北1.15米、深1米。器物大部分反扣并叠压在一起，有瓷、铜、铁器共计19件，以瓷和铁器为主。^⑫

1981年，怀柔庙城乡发现金代窖藏一处，出土10件六鑿锅和2件铁叉。一口锅内置大型铜镜1件。圆钮宽边，背面铸神话故事、楼台殿阁，花草树木、佛像仙人，共有8个不同形象的人物。重4.3公斤，直径29.4厘米。是北京少见的大型铜镜。^⑬房山大石窝镇南尚乐村西口出土铁杈、斧头、耙尺、犁头及铜镢斗各1件。

20世纪80年代，延庆清泉铺乡罗家台村发现元代窖藏，出土文物十余件。有铜器、铁器、漆器等。代表有龙纹三足双索耳铜鬲炉、铜洗、六鑿釜、铁镐等。其中一件朱书圆漆盘，高9.5厘米、口径36.3厘米。木胎夹纆，表里髹朱色，盘底髹黑色。盘底直书朱楷体款识三行。中行“内府官物”，右行“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漆匠作头徐祥天”，左行“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

是建国以来北京出土的漆器中唯一带款识的。^⑭

1983年4月，平谷南独乐镇刘家河出土元代白瓷碗5件、定窑白瓷盘2件和铁铤1件、六鑿锅1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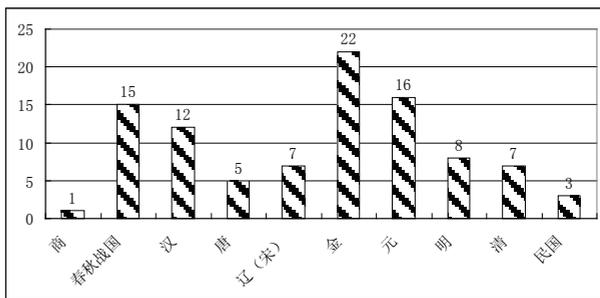
1985年，房山张坊镇大峪沟村西北2公里处出土元代梅瓶2件，瓷瓶1件，铁六鑿锅1口。

1986年，门头沟龙泉务村出土陶罐、柳条纹水斗和白瓷碗等器物共10件。密云新城子镇太古石村一元代窖藏出土金代六鑿铁锅及元代铡刀、菜刀、镰刀、斧头、镐头、锄头、矛头、犁头、鼎和瓷罐等共84件。延庆大关头村元代窖藏出土瓷器2件、铜器2件、铁锄7件。出土时，这些器物均被放置在一件大黑釉瓷缸内。

二、特点

1. 时代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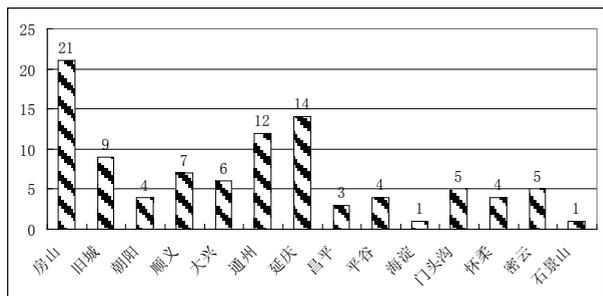
窖藏的时期从商代延至民国。特别是北京有城市之后的主要历史时期皆有发现（图二）。可见以窖藏的形式收藏自己需要的物品由来已久。说明这种行为的心理动机根深蒂固。



图二 北京窖藏时代表

2. 地域广

几乎各个区县都发现有窖藏。旧城内发现有发现，北京小平原地区也有发现，更多的则见于山区、半山区（图三）。说明这种行为是不分城市居民和农民、不分官方还是私人的，具有普遍性、广泛性。



图三 北京窖藏地点表

3. 类型多

类型多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窖本身，二是包含的物品。

从建窖材质看，基本皆为土窖，只有石经山的藏经洞是一种洞窟形式的石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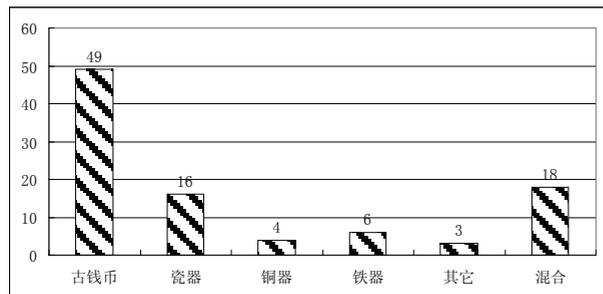
从建窖工艺看，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挖出坑后不作进一步的加工，将器物放入。这是最简单的类型。例如陶然亭公园的窖藏，就是将坑挖好后把各类文物直接放入。

第二种略讲究一些。在挖好的坑中简单作一些修理，底部铺有石块，再放入器物。有的在上面还置瓦（砖）盖。例如通州宋庄镇西赵村的辽代窖藏，窖是砖砌成的，放入铜钱后，上面再覆砖。

第三种是将具体的窖具放入挖好的土坑（窖）中。窖具种类有罐、瓮、缸、锅等，有的在上部盖器盖或石板；材质有陶、瓷、铁等，以铜钱类窖藏多见。例如朝阳区和平街北口出土的灰陶瓮中，内贮 100 余公斤的汉代铜钱。

包含物品的材质种类多已如前文所析（图四）。不同时期窖藏的包含物种类是



图四 北京窖藏分类表

与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或生活资料相适应的。例如商代的窖藏为贝币，战国窖藏为刀币，辽、金时期为铜、铁器、铜钱，元代为瓷器等。

三、成因

窖藏的成因有两个层面的来源。

从概念的内涵来说，性质和使用者的身份很关键。有普通百姓的日用品，例如普通的铁器窖藏；有低级别官吏物品，如良乡的驿站窖藏；有军事用品，如安定门的明代铁炮窖藏；有宗教用品，例如西便门的辽代铜器窖藏和昌平流村的瓷坐佛窖藏等；有皇家用品，如东华门的瓷器窖藏等。

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动机很重要。

窖藏与普通灰坑的最大区别在于普通灰坑不论是垃圾坑、祭祀坑、矿坑，还是水井、火塘等，坑中的器物都不再考虑以后的使用。而窖藏中的器物是为了有再次使用的机会而有意识的保存。所以窖中的物品若非特殊原因，应是完整的。从制造者的心理溯源，灰坑的产生可能是无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有意识的，而窖藏的产生一定是有意识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灰坑不一定是窖藏，而窖藏一定是灰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灰坑的一种功能性分类。新版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没有对“灰坑”的表述进一步细化。但若能在“灰坑”中甄别出“窖藏”，岂不善哉？同样在《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J”表示的是井，为避免混淆，如能在灰坑中辨识出窖藏遗存，不妨以“JC”表示。

窖藏的年代以战国、辽、金、元等战争频繁之际为最多。这也是窖藏与灰坑的又一个不同之处——自然也是理解成因的重要依据。太平盛世，除非特殊的原因，一般很少有人会去主动埋藏。由于大量的耕作、活动，正常的生活行为使得灰坑的数量很多。而社会动荡的时代则不同，人们出于各种心

理考虑，会对物品收藏后埋藏。

窖藏的原因，有复杂的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根源。值得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深究。就考古发现的迹象而言，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收藏大量的钱币。这是因为钱币流通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观念深入人心。有钱便能有一切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其二是收藏大量的农业工具，特别是铁器。这可能是农业人群将农具视为生存之本的反映。所以这类窖藏的主人多半为农民。其三是由于临时的避乱而将喜爱的物品进行埋藏，以便不受到破坏。例如旧鼓楼大街豁口东的窖藏，这种窖藏的主人可能为市民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

日常用品的窖藏多为单独分布，而不是集中、大量出现，所以这些窖藏的形成都是私人的原因，没有官方背景在内。军事品和皇家用品的窖藏则另当别论，需要结合当时的文献记载进行分析。

总之，亘古不变的收藏心理是主观原因。具体的原因较复杂，有珍惜、节约、避祸等。

北京处于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的交错地带，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汇之所。在这种大背景下，民族的迁徙、社会的动荡、人群的和战、社团的更迭极为频繁，这可能也是造成北京有众多窖藏的客观原因之一。

但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尚未见到周边地区已有的新石器时代的食物（动物或植物）窖穴。这是储藏物品的不同所致还是地区差异？还待深究。

四、小 结

区分“窖藏”与“似窖藏”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藏”。“藏”指的是收藏，而不仅是埋藏。窖穴中的物品是为了保留，还能再次使用。这是甄别“窖藏”与“似窖藏”的核心。从这点出发，在田野发掘阶段，将遗物与遗迹结合考虑，可以排除

三种假象。

一是遗物虽然是器物完整，但不可能再次使用。例如2007年密云大唐庄的唐代墓葬M96、M98。M96在铺地砖下置一坑，放3件陶器；M98铺地砖下置一正方形坑，放陶罐、器盖、铁犁铧（图五）。^⑥在墓葬铺地砖下挖坑置物，显然不可能为现实生活中再次使用，而是期望主人将器物带至另一世界使用，其实质是随葬器物的一种表现。只是在随葬的过程中，这种行为或许多少受到了“窖藏”的心理影响。



图五 密云大唐庄 M98 墓底器物坑

二是遗物中有完整器物，但也有其它（不完整）器物。由于不完整（无用）器物的混入，这类窖穴的性质应被定义为灰坑。例如1978年，房山刘李店的灰坑（78H1）中，虽然复原了10多件完整的西周早期陶器，但只是“夹杂大量陶片”的一部分，^⑦并非只是为保存这些陶器而筑，所以这座灰坑应是一般意义上的垃圾坑。

三是遗迹窖穴是人工修筑的，但包含物非为再次使用。例如镇江营遗址商周第三期灰坑H57，有一级台阶，坑壁有清晰的工具痕迹，可以看到鹿角镞和钺的痕迹，坑底有一周鹿角痕迹，底部平整夯实（图六）。但此坑包含物多为破碎陶片，完整者并不多。^⑧所以此灰坑的性质仅为垃圾坑。至于为何修整窖穴后未进行仓储，则不得而知。

仅有人为修筑痕迹是窖藏的不充分条件。2005年西城区毛家湾的巨型瓷片坑出土明代瓷片上百万片，^⑨虽然盛放坑也是人



图六 镇江营 H57 坑壁上的掘土工具痕迹

为修建的，但这些碎瓷片显然不考虑再使用。因此这座坑只能是垃圾坑。

仅看盛放的物品是否完整也是不够的。例如 1982 年在朝内大街的元代枯井中，发现一批瓷器和铁器。很难说是利用枯井做有意识的收藏还是这些器物是被无意识的弃于井中。

反映在遗迹现象上，甄别“窖藏”与“似窖藏”的区别，一是窖穴是否有人为修筑的痕迹，二是盛放的物品是否完整。若两者皆有，则极可能是窖藏。两者缺一不可。

判断窖藏的时代应以窖具或所藏器物的最晚年代为准。例如怀柔北房镇的钱币窖藏，铜钱是宋代的，但窖具六釜锅是元代的，则窖藏的年代自然是元代的，而不是原报道中的辽金时期。但石经山的藏经洞历朝代均有修补，则是例外。

由于窖藏为一次性行为，有着比灰坑更为精确的时间尺度，窖中的物品为考察器物的共存组合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实例。但钱币的情况应区别对待，特别是宋、辽、金之际，经济上的交流使得钱币互通，尤其是大量宋钱北流。

坑”小议》，《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2 月 29 日，第 3 版；陈星灿：《窖穴和灰坑》，《中国文物报》2000 年 7 月 12 日，第 3 版。

③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朝阳门外出土的战国货币》，《考古》1962 年第 5 期。

④⑥⑦⑱⑲⑳㉑㉒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 1 月。

⑤高桂云、张先得：《北京市出土战国燕币简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 年 9 月。

⑧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2008 年发掘资料。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72 年第 1 期。

⑪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便门外发现铜器》，《考古》1963 年第 3 期。

⑫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 年第 6 期。

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 年 1 月。

⑭苏天钧：《北京出土辽金时代铁器》，《考古》1979 年第 6 期。

⑮杨亦武：《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北京文博》1999 年第 3 期。

⑯苏天钧：《北京地区发现辽金时代文物》，《文物》1959 年第 10 期。

⑰田敬东：《北京良乡发现一处元代窖藏》，《考古》1972 年第 6 期。

⑱鲁琪：《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一处金代窖藏》，《文物资料丛刊》第七辑，文物出版社，1983 年 2 月。

⑲高桂云：《元代“内府官物”漆盘》，《文物》1985 年第 4 期。

㉒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庄——白河流域古代墓葬发掘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商代遗迹》，《文物》1997 年第 4 期。

㉔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5 月。

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毛家湾明代瓷器坑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除单独标明之外，本文窖藏资料的出处均出自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 7 月。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文物出版社，1982 年 12 月；吴小平：《“灰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迁徙初探

韩建识

李邕（678年—747年），唐朝著名书法家，其书法初学王羲之，后自具风格。李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李阳冰称他为“书中仙手”^①。传世碑刻主要有《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李思训碑》、《东林寺碑》、《叶有道碑》、《法华寺碑》和《李秀碑》等。在今北京市东城区文天祥祠享堂东壁嵌有李邕书云麾将军李秀断碑两块。由于李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天府府丞吴涵将李秀残碑移置文天祥祠后，世人在提及文天祥祠时多要谈到此碑，对该碑的迁移过程也多有涉及，但其内容却有颇多矛盾之处。本文试结合传世文献及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云麾将军残碑及摹本拓片，就云麾将军李秀碑迁徙情况等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李秀碑在良乡县的迁移

1. 云麾将军李秀碑最初立于范阳郡福祿乡。根据《唐云麾将军李秀碑》记载，李秀“以开元四载（716年）四月一日”“薨于范阳郡之私第”，“以天宝元载（742年）合葬于范阳福祿乡原”，该碑立于唐天宝元年。^②李秀碑全称为“唐故云麾将军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辽西郡开国公上柱国李府君神道碑”，此碑既然是神道碑，最初就应立于云麾将军李秀的墓道上，那它在唐天宝年间理应在范阳郡福祿乡。关于福祿乡的方位，陈康先生在《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一文中讲道，在丰台长辛店迤南发现《唐故云麾将军行右领军卫中郎将右羽林上下赠本卫将军上柱国赵郡李（神德）君志铭》，志载：“启殡合葬于幽府城

西叁拾里福祿乡卢沟河西鹿村西北百步平原”，又有人在其附近拾到一块“范阳都督府福祿乡 开元元年”的刻砖。^③李秀碑既然也在范阳郡福祿乡，它离“（唐）幽府城西叁拾里”应该不会很远。

2. 宋代文献记载，云麾将军李秀碑在幽州。宋赵明诚《金石录》^④、宋陈思《宝刻丛编》^⑤、宋无名氏《宝刻类编》^⑥等文献都记载唐云麾将军李秀碑在幽州。宋高似孙撰《纬略》时云麾将军李秀碑尚遗存。^⑦幽州在唐朝天宝元年（742年）改为范阳郡，乾元元年（758年）又改称幽州。宋代称幽州，清朝称顺天府。《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幽州：天宝元年改为范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幽州。领县八：蓟、幽都、良乡、永清、安次、武清、潞、昌平。”^⑧《新唐书》卷三十九：“幽州范阳郡，大都督府。本涿郡，天宝元年更名……县九。蓟，幽都，广平，潞，武清，永清，安次，良乡，昌平。”^⑨《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幽州，汉曰燕国，后汉为幽州治，晋以后因之，唐仍曰幽州，亦曰范阳郡，领蓟县等县十，今顺天府。”^⑩

3. 到了元代，唐云麾将军李秀碑被移入良乡县驿。《元一统志》卷一：“云麾将军碑：碑在良乡县驿……今碑石尚存，以李邕所书，碑本盛传于世。”^⑪

4. 明初，云麾将军李秀碑在固节驿。《顺天府志》载：“云麾将军碑，碑在固节驿。”^⑫据《大明会典》记载，顺天府良乡县有固节驿。^⑬明代固节驿的方位应在良乡县治南。《顺天府志》载：“固节驿在县治东南城内。洪武三年（1370年）创。盖旧名良乡译（驿），九年改今名。”^⑭《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良乡县固节驿在县治南。”^⑮据王灿灿先生在《北京固节驿考略》一文中考证，在明代，

固节驿位于良乡县城南门内迤西。^⑩

5. 李秀碑在明代良乡县学宫被琢作柱础。明朝早期，唐云麾将军李秀碑徙入良乡县学宫。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载：“良乡学宫故有李北海云麾将军碑。学官某谓其已断，因修大成殿，琢为柱础。后更葺殿宇，杂置瓦砾。”^⑪明徐昌祚撰《燕山丛录》^⑫所记内容与《长安客话》相同。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一十一：“唐云麾将军碑，李秀也。李邕书，在良乡县。今徙学中，止存上半。”^⑬《六艺之一录》描述李秀碑“止存上半”情景的时代应属于明代早期。

李秀碑曾在良乡县学宫，而明代良乡县学位于县治东南方，县学建于洪武五年（1372年），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修。清朝顺治十年（1653年）良乡知县张士彪对其进行增修。《大明一统志》卷一：“良乡县学在县治东南。洪武五年建，正统十二年重修。”^⑭《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良乡县儒学在县治南。”^⑮《畿辅通志》卷二十八：“良乡县学在县治东南。明洪武五年建，正统十二年重修。本朝顺治十年知县张士彪增修。”^⑯

在明朝早期，云麾将军李秀碑曾存于良乡县学宫，由于它已经断裂，因为修大成殿，就被琢作柱础。云麾将军李秀碑曾存于良乡县学宫，而良乡县学建于洪武五年，因此，笔者认为，云麾将军李秀碑琢作柱础的时间应该在洪武五年之后。

二、云麾将军李秀残碑被嵌于明宛平县署古墨斋

明朝万历初年，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在良乡县学宫被邵正魁、董凤元发现，告诉了当时的宛平县令李荫，李荫派人用车将李秀残碑运至宛平县署，利用县廨西边的空地修建了小斋，李秀残碑被砌到了斋壁间，由王世懋题匾曰古墨。关于云麾将军李秀残碑移入宛平县署的经过多见于明人著述。明王同轨撰《耳谈类增》载：“云

麾将军碑：良乡县有云麾将军碑极佳，为学博某瘞为柱础，而闽人董生适见之，腹痛不已，言于宛平令李袭美荫，荫固词人之雄，即委曲寓书于其令博，辇致嵌其署壁间，匾曰古墨斋。”^⑰《燕都游览志》：“古墨斋在宛平县署内，唐李北海所书云麾将军碑，邑令李荫购得，斲之署壁，旁构小亭，植柳蒔花，以为公余退思之地。”^⑱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载：“良乡学宫故有李北海云麾将军碑。学官某谓其已断，因修大成殿，琢为柱础。后更葺殿宇，杂置瓦砾。有南士见之，以告宛平令南阳李荫，遣人辇致署中，起斋覆之。王尚宝世懋题曰古墨，与名士皆有吟咏。碑字存者凡一百八十九。北海尝书两云麾将军碑，其一为左卫将军李思训；此名秀，幽州人。”^⑲明徐昌祚撰《燕山丛录》关于云麾将军李秀碑迁徙过程的记载内容^⑳与《长安客话》相同。明朱孟震撰《续谈》载：“涿州良乡学宫亦有石，岁久不传。友人邵长孺，博雅士也，过其地见学宫柱础一面，以告黎秘书惟敬。时李袭美比部为宛平令，闻之，移书县官，取而置之衙斋，匾曰古墨。一时好事者争为赋咏。”^㉑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载：“古墨斋：县廨之西，旧有隙地方丈，万历六年（1578年），河南李荫来尹宛平，即其地为小斋，偶得础石，有唐李邕所书云麾将军碑墨，因辇至斋中，斲之壁间，而以古墨名其斋。”^㉒明人黎民表撰写的《古墨斋记》对这一过程记载得最为详细：“良乡县学有云麾将军碑，盖唐北海刺史李公邕所书也。云麾将军名秀，幽州人，事迹具载碑中。天宝三载（744年）正月建。公书云麾将军碑二，其一为左武尉李思训，其一此碑也。旧置官廨，不知何时为校官裂为柱础，墨本遂不见于世，好古者深惋惜之。近复修学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砾中，过者不睨也。友人邵生正魁、董生凤元往经其地，踪迹之，则古础存焉，规如铁鉴，字尚未泐也，以语宛平李侯于美。侯喟然兴叹。寓书县令，辇致都下，将为亭以覆之。视寝室之右，

有别馆可度，亟涂墍之，纳础其中，属藩参王子世懋署之曰古墨斋，志存旧也……且宛平，赤县也，宜有金石，志其兴作之岁月，周视廡宇，迄无传焉。侯始亭而碑之，俾采风者得以故事列于纪载，文献将有征焉，非侯之功邪！亭成，侯歌以落之，和者自博士欧子大任而下，凡若干人，民表从铅槩之后，因记其事，甘棠之爱，庶几勿翦焉。侯名荫，南阳人。万历六年，岁次戊寅夏六月，岭南黎民表撰并书。承德郎知宛平县事南阳李荫建。”^②

关于云麾将军李秀碑在明代万历初年的迁移过程，后人也有不同说法。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认为，云麾将军李秀残碑是在明万历初年，李荫任宛平县令时发现的。《帝京景物略》载：“古墨斋，在宛平县署。万历初，河南内乡李公荫令宛，发地，得柱础六，微有字迹，洗视之，唐李北海云麾将军碑也。”^③清代官修地方志《康熙宛平县志》也持相同观点。^④明末清初人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⑤、《天府广记》^⑥、《庚子销夏记》^⑦和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⑧等文献都认为，云麾将军李秀残碑“不知何时入都城”，“宛平令李荫掘地得六础”。《畿辅通志》也认为是“明万历中知县李荫掘地得唐李邕云麾将军碑”^⑨。清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和赵绍祖辑《古墨斋金石跋》^⑩明确记载了其发现人是宛平令李荫，发现地点在宛平县署中。《金石文字记》卷四：“碑不知何时入都城。万历初，宛平令李荫署中掘地得六础，洗视乃此碑。”^⑪

沈榜著《宛署杂记》和黎民表撰《古墨斋记》告诉我们，云麾将军李秀残碑是由邵正魁、董凤元在良乡县学中发现的，李秀残碑被运抵宛平县署和建立古墨斋的时间都是万历六年。笔者认为，沈榜和黎民表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另外，根据上文所引《燕都游览志》的记叙，宛平县令李荫是通过购买的方式而得到云麾将军李秀残碑。

明万历六年，云麾将军李秀残碑被移

入古墨斋。古墨斋在宛平县廡的西边，而宛平县署设在明代北安门之西。《宛署杂记》记载：“署廡：县署设北安门之西，中为节爱堂。堂东为幕庭，西为库，后为见日堂，各三楹……见日堂后为知县廡。”^⑫又载，古墨斋在“县廡之西”^⑬。出版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由沈应文等纂修、张元芳汇编的《万历顺天府志》中有一张《金门图》，图中标有宛平县署的具体位置。^⑭明代宛平县署在今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现衙署已无存。^⑮

清嘉庆十年（1805年）夏，翁方纲手摹杨介坪旧拓本共五石，包括残额一，横一，圆础二，又半础一，存347字。^⑯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时，嵌于古墨斋中的云麾将军李秀残碑还有189字可以辨认。用翁方纲重摹本与《宛署杂记》一书中所录李秀残碑文字^⑰进行比对，虽然部分文字有出入，但基本可以断定，杨介坪旧拓本应该拓自古墨斋中的李秀残碑。这就可以判定，古墨斋中的李秀残碑至少有五石。《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宸垣识略》、《金石文字记》等书认为有“六础石”移入明宛平县署。笔者推测，其中一石中的文字不见著录也许是础石上的文字漫漶的缘故。

三、明朝万历年间，云麾将军李秀残碑的再次迁移

明万历年间，云麾将军李秀残碑二础石被移至少京兆署中，另外的四础石被王惟俭携带到河南开封。《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七：“（此碑）后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础，其四础传谓万历中王京兆惟俭携去汴中。”^⑱《金石文字记》卷四：“（碑）后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础，其四础相传万历末王京兆惟俭携之大梁。”^⑲王惟俭，《明史》有传。《明史》卷二百八十八：“王惟俭，字损仲，祥符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授潍县知县，迁兵部职方主事。三十年（1602年）春，辽东总兵官马林以忧税使高濂被逮，兵部尚书田乐等救之。

帝怒，责职方不推代者，空司而逐，惟俭亦削籍归。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光禄丞。三迁大理少卿。”他嗜好书画古玩，万历、天启年间，被世人称为“博物君子”。^④由于他对古物的喜爱，所以笔者认为，他在万历年间携四础至汴之事可信。又从《明史》所记其身世看，王惟俭在万历三十年削籍归，因此，他携四础至汴的时间很可能是在万历三十年。上文中提到的汴、大梁应指河南开封。王惟俭是祥符人，“祥符”是河南开封旧称。万历三十年，王惟俭削籍后回到开封老家，把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四础石携带到开封也符合情理。

《宛署杂记》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⑤从沈榜著《宛署杂记》对古墨斋的描述来看，当时古墨斋尚存。由此可见，云麾将军李秀残碑二础石移入少京兆署中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三十年间。

清叶奕苞著《金石录补续跋》载：“唐云麾将军李秀碑：右李秀碑在顺天府廊中。”^⑥叶奕苞为清初人，可见，他在著《金石录补续跋》时，云麾将军李秀残碑二础石尚在顺天府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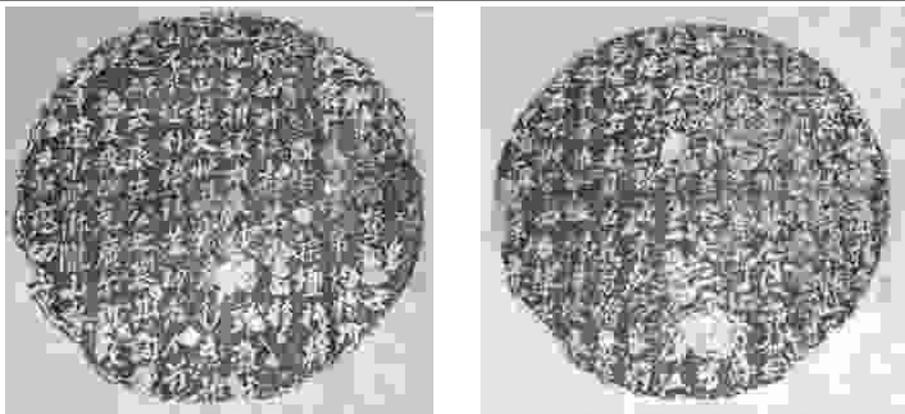
清朝顺天府署沿用明代。少京兆署应属于清顺天府署一部分。《康熙顺天府志》载：“顺天府：府治在安定门大街南里许，西转向南。”^⑦《畿辅通志》卷二十六：“顺天府尹署在京师北城迎春坊，明洪武年建。”^⑧明顺天府署在今东城区东公街45号。^⑨

四、李秀碑被嵌入文天祥祠堂东壁

清康熙三十一年，顺天府府丞吴涵在顺天府署蔓草中发现了云麾将军李秀残碑二础石。吴涵以为“官舍之屡易，不如祠宇之常新”，为了使云麾将军李秀残碑能够得到长久保存，传之后世，吴涵让人将李秀残碑二础石嵌入文天祥祠堂东壁。

《云麾将军断碑记》对这一过程有详细记载。现据我中心藏《云麾将军断碑记》拓

片录文如下：“唐云麾将军李秀碑，北海太守李邕书也。北海所书云麾碑有二，其一名思训，秦人；其一名秀，范阳人。碑在秦中者，至今屹立如故，而在范阳者断裂弃置迁徙无定所，盖物亦有幸有不幸哉。碑刻于天宝中，在今良乡县地。其后碑石既断，良乡学博士某断为柱础。又若干年，重修学宫，弃础杂置瓦砾间，闽人董生见之，以告宛平令李荫。荫寓书良乡令，攀致宛平署中，凡六础。孙侍郎承泽谓碑不知何时入都，又谓宛平令掘地得之，皆未尝详考也。荫既得石，嵌于署壁，号为古墨斋……时明嘉靖中事。又若干年，移入京兆少尹署，而王京兆惟俭携四础之大梁。今所存者遂止二础。余以康熙三十有一年承乏顺天府府丞，公务之暇，访求所谓云麾碑者不可得，召胥史讯之，皆云无有，余疑前人所纪或未可据。其夏，因校士宿署中，日既暮，闲步于庭，见蔓草中有二石，就视之，则碑石也，惊喜过望。急拂拭读其文，已多漫漶不可辨，可辨者才数十字而已，又为叹惜久之……余惜其弃置，思仍嵌之署壁，既又念是署中宦游者往来如传舍：然下者若良乡博士，不免视同土石；而博雅好古若王尹其人，又或且取之而去。余虽复效古墨斋遗事，安在其能久存者？而宋丞相信国文公祠，去府署甚近，数百年祭祀不绝。窃以为官舍之屡易，不如祠宇之常新也；宦游者之去来无定，不如忠臣义士之历久而不歿也。故北海书石不嵌于署而嵌丞相祠中，既使前贤遗迹不终弃于瓦砾草莽间，且令四方之士谒信国祠者，既有口激发其忠孝之心，因退观壁间之书，思古直臣风概而为之慨然兴慕，亦未必非廉顽立懦之一助也。康熙三十一年八月顺天府府丞石门吴涵记并书。”这里，吴涵认为，孙承泽“谓碑不知何时入都，又谓宛平令掘地得之，皆未尝详考”，是正确的。^⑩岑仲勉先生撰文认为，吴涵书《云麾将军断碑记》以为云麾将军断碑二础石运至宛平为“嘉靖中事”是传闻失实，^⑪该观点可从。



图一 市文物图书资料中心藏云麾将军李秀断碑二础拓本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收藏有云麾将军李秀断碑的二础拓本（图一），拓本曾经周肇祥收藏。该拓本第一石第十行末“彼胜”之“胜”字、第二石第六行“使持节”之“持”字、第二石第十行首“其一”之“一”字、第二石第十行末“祖敦”之“敦”字全泐，符合民国时期拓本特征，^⑤因此，我中心藏拓本应拓于民国。

翁方纲重摹李秀残碑刻石现嵌在法源寺悯忠阁东壁外（图二），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有民国时期拓本。我中心还存有《翁摹李元秀碑残石》一轴，通过与现存于法源寺的翁方纲重摹本进行对比，结合所用纸张等因素，可以初步判定，其应该是翁方纲重摹本的重刻本，约拓于清末民初。



图二 嵌在法源寺悯忠阁东壁外的翁方纲重摹李秀残碑刻石

①（宋）无名氏撰：《宣和书谱》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251页。

②《宋拓云麾李秀碑完本》，文明书局，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月再版。

③陈康：《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北京文博》2006年第1期。

④（宋）赵明诚撰：《宋本金石录》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91年1月第1版。

⑤（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01页。

⑥（宋）无名氏撰：《宝刻类编》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27册，商务印书馆影印，第498页。

⑦（宋）高似孙撰：《纬略》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30页。

⑧（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金陵书局刊行。

⑨（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1019、1020页。

⑩顾祖禹辑著：《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7月第1版，第225页。

⑪（元）李兰盼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3月第1版，第55页。

⑫（清）缪荃孙自《永乐大典》抄出《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次影印，第376页。

⑬（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45，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6年7月初版,第2019页。

⑭(清)缪荃孙自《永乐大典》抄出《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次影印,第370、371页。

⑮(明)沈应文等纂修、张元芳汇编:《万历顺天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08册,齐鲁书社,1996年8月第1版,第63页。

⑯王灿炽:《北京固节驿考略》,《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⑰(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99页。

⑱⑳(明)徐昌祚撰:《燕山丛录·古迹》卷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二八四》,齐鲁书社,1995年9月第1版。

㉑(清)倪涛撰:《六艺之一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㉒(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0页。

㉓(明)沈应文等纂修、张元芳汇编:《万历顺天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08册,齐鲁书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8页。

㉔(清)唐执玉、李卫等监修,(清)田易等纂:《畿辅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626页。

㉕(明)王同轨撰:《耳谈类增》卷三十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刻本。

㉖(清)朱彝尊等辑:《日下旧闻》卷十一,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本。

㉗(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98、99页。

㉘(明)朱孟震撰:《续谈》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04册,齐鲁书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96页。

㉙㉚㉛㉜(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7-18页。

㉝(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36页。

㉞(清)王养廉修,李开泰、张采纂:《康熙宛平县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传抄本。

㉟㊱(明)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第471页。

㊲(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三十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第595页。

㊳(清)孙承泽撰:《庚子销夏记》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第68页。

㊴(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北京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94页。

㊵(清)唐执玉、李卫等监修,(清)田易等纂:《畿辅通志》卷五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210页。

㊶(清)赵绍祖辑:《古墨斋金石跋》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1版,第89页。

㊷㊸(清)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㊹(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5页。

㊺(明)沈应文等纂修、张元芳汇编:《万历顺天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08册,齐鲁书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页。

㊻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163页。

㊼《翁方纲摹李秀碑残石》,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73、174页。

㊽(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第7399、7400页。

㊾(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4页。

㊿(清)叶奕苞著:《金石录补续跋》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1版,第65页。

①(清)张吉午纂修、阎崇年校注:《康熙顺天府志》,中华书局,2009年6月,第90页。

②(清)唐执玉、李卫等监修,(清)田易等纂:《畿辅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582页。

③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71页。

④参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云麾将军断碑记》拓片。

⑤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283页。

⑥仲威著:《中国碑拓鉴别图典》,文物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638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馆员)

清代王爷园寝螭夔形态考

周 莎

“古之政治尚典章制度，至儒教兴盛，尤重礼仪。故先秦两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部署鲜涉殿堂之结构。嗣后建筑之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均足以证明政治、宗法、风俗、礼仪、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①

清朝共有 12 位皇帝，历 13 朝。清代王爷园寝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清代王爷园寝承袭了明代王爷园寝的建筑形制，在建筑结构上更注重细节。笔者就多年之实地考察，对北京地区及周边清代王爷园寝螭夔的形制特点，运用考古学方法加以总结，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龙之九子简述

所谓“龙之九子”，究竟是哪九种动物，到明朝，出现了各种说法。其中如：“螭吻，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龙而小，性吼叫，有神力，故悬于钟上。宪章，其形似兽，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狱门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桥头。蟋蜴，形似兽，鬼头，性好腥，故

用于刀柄上。螭虺，其形似龙，性好风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龙，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金貌，其形似狮，性好火烟，故立于香炉台上。椒图，其形似螺蛳，性好闭口，故立于门上。今呼鼓丁非也。蚺虺，其形似龙而小，性好立险，故立于护朽上。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兽吻，其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门环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鱼尾有两翼，其性通灵不睡，故用巡警。”^②“杨升庵曰：按尸子云，法螺蚪而闭户。《后汉书·礼仪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着门户。唐韵‘涪’音塔，注涪头也，今俗名护朽。”^③

在清代王爷园寝的建筑中，建有神桥、墓碑、宫门、东西配殿、飨殿、宝顶，墓碑为螭首龟趺。螭虎，其形似龙，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④李西涯的《怀麓堂集》中，认为负重者名为霸下。杨慎《引庵全集》记载：“夔夔，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又有记载：“夔夔其形似龟，性好负重，故用载石碑。”^⑤

二、北京及周边王爷园寝螭首龟趺（夔夔）碑调查

碑，《说文》中注：“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秦之记功德之碑，曰立石，曰刻石；其言碑者汉以后之语也。”这说明古代所谓碑，皆无文字。秦有立石刻记功文字，始名刻石。汉以后，多镌志先人功德，植于墓圻、宫庙等处，才叫做碑。故此，清代王爷园寝中的墓碑也是用以为园寝主人歌功颂德，表示功绩的。

清宗室爵位，崇德元年（1636年）定为九等，顺治六年（1649年）定为十二等级。据《大清会典》记载，最高一级称和硕亲王，以下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多罗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其中镇国将军至奉国将军又各分为三等。再往下，则为闲散宗室，用四品顶戴。典章规定，

一般爵位均为降级世袭。而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为了褒扬八家入关有功的王爵，恢复睿、礼、郑、豫、肃、庄六亲王，克勤、顺承两郡王的原封号，并决定其子孙可以“世袭罔替”，俗称“八大铁帽子王”。八大铁帽子王分别是：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清中后期，乾隆封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同治封恭亲王，光绪封醇亲王和庆亲王，亦为“世袭罔替”，形成十二家铁帽子王。

王爷园寝，严格上是指亲王、郡王的墓葬（园寝）。现今，散落于乡间田野的清代王爷园寝遗迹成为研究清代陵寝制度、皇族世系、建筑史及其他专门史的重要文物资料。我们可知现存螭首龟趺碑的王爷园寝有27座^⑥，如表一所示。为便

表一 清代王爷园寝现存螭首龟趺碑调查表

序号	名称	墓主	支系	品级	所属时期	谥号	碑存地点
1	礼烈亲王墓碑	代善	天命汗努尔哈赤次子	亲王	顺治朝	烈	墓碑现存于海淀区香山植物园内
2	惠顺(礼)亲王墓碑	祜塞	礼烈亲王代善第八子	亲王	顺治朝	顺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街道门头村
3	顺承恭惠郡王墓碑	勒克德浑	礼烈亲王代善之孙	郡王	顺治朝	恭惠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
4	敬谨庄亲王墓碑	尼堪	广略贝勒褚英第三子	亲王	顺治朝	庄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东甘池村
5	敬谨悼亲王墓碑	尼思哈	敬谨庄亲王尼堪次子	亲王	顺治朝	悼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东甘池村
6	顺承忠郡王墓碑	诺罗布	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第三子	郡王	康熙朝	忠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
7	康良(礼)亲王墓碑	杰书	礼烈亲王代善之孙	亲王	康熙朝	良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街道门头村
8	纯靖亲王墓碑	隆禧	顺治皇帝第七子	亲王	康熙朝	靖	天津市蓟县孙各庄村黄花山
9	肃愬亲王墓碑	富寿	肃武亲王豪格第四子	亲王	康熙朝	愬	墓碑现存于北京市日坛公园内
10	显密亲王墓碑	丹臻	肃武亲王豪格之孙	亲王	康熙朝	密	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拢驾庄
11	裕宪亲王墓碑	福全	顺治皇帝第二子	亲王	康熙朝	宪	天津市蓟县孙各庄村黄花山

序号	名称	墓主	支系	品级	所属时期	谥号	碑存地点
12	理密亲王墓碑	允弼	康熙皇帝次子	亲王	雍正朝	密	天津市蓟县 孙各庄村黄花山
13	怡贤亲王墓碑	允祥	康熙皇帝第十三子	亲王	雍正朝	贤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石亭镇东营房村
14	裕悼亲王墓碑	保寿	裕宪亲王福全第五子	亲王	雍正朝	悼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裴山镇北白虹乡南福地村
15	裕庄亲王墓碑	广禄	裕宪亲王福全之孙	亲王	乾隆朝	庄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裴山镇北白虹乡南福地村
16	诚贝勒墓碑	允祁	康熙皇帝第二十三子	贝勒	乾隆朝	诚	河北省遵化市兴旺寨乡
17	顺承恭郡王墓碑	泰斐英阿	顺承恪郡王熙良长子	郡王	乾隆朝	恭	北京市房山区 韩村河镇二龙岗村
18	果毅亲王墓碑	允礼	康熙皇帝第十七子	亲王	乾隆朝	毅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梁格庄镇上岳各庄村
19	果恭郡王墓碑	弘瞻	雍正皇帝第六子	郡王	乾隆朝	恭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梁格庄镇下岳各庄村
20	和勤亲王墓碑	永璧	和恭亲王弘昼次子	亲王	乾隆朝	勤	北京市顺义区 李桥镇王家坟村
21	恂勤郡王墓碑	允灏	康熙皇帝第十四子	郡王	乾隆朝	勤	天津市蓟县 孙各庄村黄花山
22	顺承简郡王墓碑	伦柱	顺承慎郡王恒昌长子	郡王	道光朝	简	北京市房山区 长沟镇西甘池村
23	瑞敏郡王墓碑	奕誌	瑞怀亲王绵忻长子	郡王	咸丰朝	敏	北京市海淀区 四季青镇瑞王坟村
24	肃慎亲王墓碑	敬敏	肃武亲王豪格四世孙	亲王	咸丰朝	慎	北京市朝阳区 王四营乡道口村
25	肃恪亲王墓碑	华丰	肃武亲王豪格五世孙	亲王	同治朝	恪	北京市朝阳区 黑庄户乡万子营村
26	醇贤亲王墓碑	奕譞	道光皇帝第七子	亲王	光绪朝	贤	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 北安河村妙高峰山腰
27	孚敬郡王墓碑	奕譞	道光皇帝第九子	郡王	光绪朝	敬	北京市海淀区 苏家坨镇北安河村

于对清代王爷园寝规制的分析,笔者把各园寝按年号划分成四个时期^⑦,分别是:

1. 清代早期:天命朝、天聪(崇德)朝;
2. 清代前期: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
3. 清代中期: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
4. 清代晚期:咸丰朝、光绪朝、同治朝、宣统朝。

以上四个时期以清代前期、中期的园寝螭首龟趺碑现存数量较多,由此可以窥

见清代王爷园寝规制。

三、清代王爷园寝螭凤样式、风格及一般规制

清制,“凡坟莹飨堂亲王五间,世子以下至辅国公皆三间,亲王世子郡王门三,贝勒以下门一,亲王绘五彩饰以金,覆以绿琉璃;世子郡王止,绘五彩皆覆绿琉璃

瓦；贝勒以下施朱不绘用甗瓦。凡墓碑亲王至辅国公皆交龙首龟趺，惟郡王以上得建碑亭，镇国将军螭首，辅国将军麒麟首，奉国将军天禄辟邪首，皆龟趺；奉恩将军圆首方趺。”^⑧

墓碑从结构上大体可分为上、中、下三大部分。上部指碑首部分，中部指碑身部分，下部指龟座部分。另龟座下面有些建有辅助结构水盘。碑首部分有用圭额和螭额两种。唐代的龟形较矮，龟头很短。自汉代之后，普遍用螭额，圭额少见。到明清时，整个形制较高，龟头伸得也长。明清皇帝碑的龟座，龟头刻得很像龙头。在王爷园寝中亦是如此。早期的墓碑螭额形似乌龟，如：东京陵的舒尔哈齐墓碑、大尔差墓碑、穆尔哈齐墓碑等。入关后，随着清王朝的日渐鼎盛，螭额在造型上渐趋于龙的形象。

1. 龟座部分——螭额

(1) 头部

龟座，即将碑座做成龟形。龟座的龟，有个专门的名字，名叫“螭额”。螭额形象狰狞，看上去十分凶悍，同时，又不失威武。笔者多次考察清代皇家陵寝，发现帝陵之螭额多为闭嘴状，而王爷园寝则多为张嘴怒吼状，少数为闭嘴狰狞状。清代前期是一个演变到定型的时期，如顺治朝礼亲王代善、祜塞及代善之孙勒克德浑的墓碑。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的墓碑为闭嘴状，与其同一时期的敬谨亲王家族园寝中的螭额均为闭嘴状。定型期是在康熙时期，清代中期的工艺水平达到了鼎盛。从器型分析，乾隆朝雕刻器形尤为庞大，仰头突鼻是一大特色，其他时期的看上去五官端正，不如乾隆朝夸张。从线条分析，光绪之后的螭额头部雕功比较复杂，略显死板。

①闭嘴

闭嘴的螭额在现存王爷园寝中较少。现存有：顺承恭惠郡王墓碑、惠顺亲王墓碑、肃慎亲王墓碑。惠顺亲王墓碑的螭额现存于礼王府园寝中，其碑身部分已被移至北京

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旁的碑林保存。笔者考察这两处存放地点发现，惠顺亲王墓碑的碑身部分体型很大，碑身两侧伴有二龙戏珠图案，放置其旁边的礼亲王代善墓碑碑身部分亦是同样造型。推测礼亲王代善墓碑之螭额可能与惠顺亲王墓碑之螭额形式相同。一方面表明，在同一时期，螭额的造型与家族园寝中的造型相关；另一方面表明，清代前期对螭额的样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②张嘴

张嘴怒吼状螭额在清代王爷园寝甚是多见，然而，清代王爷园寝中的螭额则多呈“∠”型张嘴状。螭额头部两侧有圆状及长状像须的图案，推测可能是螭额的发。现存有：敬谨庄亲王墓碑、敬谨悼亲王墓碑、顺承忠郡王墓碑、康良亲王墓碑、纯靖亲王墓碑、肃愍亲王墓碑、裕宪亲王墓碑、理密亲王墓碑、怡贤亲王墓碑、裕悼亲王墓碑、裕庄亲王墓碑、顺承恭郡王墓碑、果毅亲王墓碑、果恭郡王墓碑、和勤亲王墓碑、恂勤郡王墓碑、顺承简郡王墓碑、瑞敏郡王墓碑、肃恪亲王墓碑、醇贤亲王墓碑、孚敬郡王墓碑。

(2) 尾部

①尖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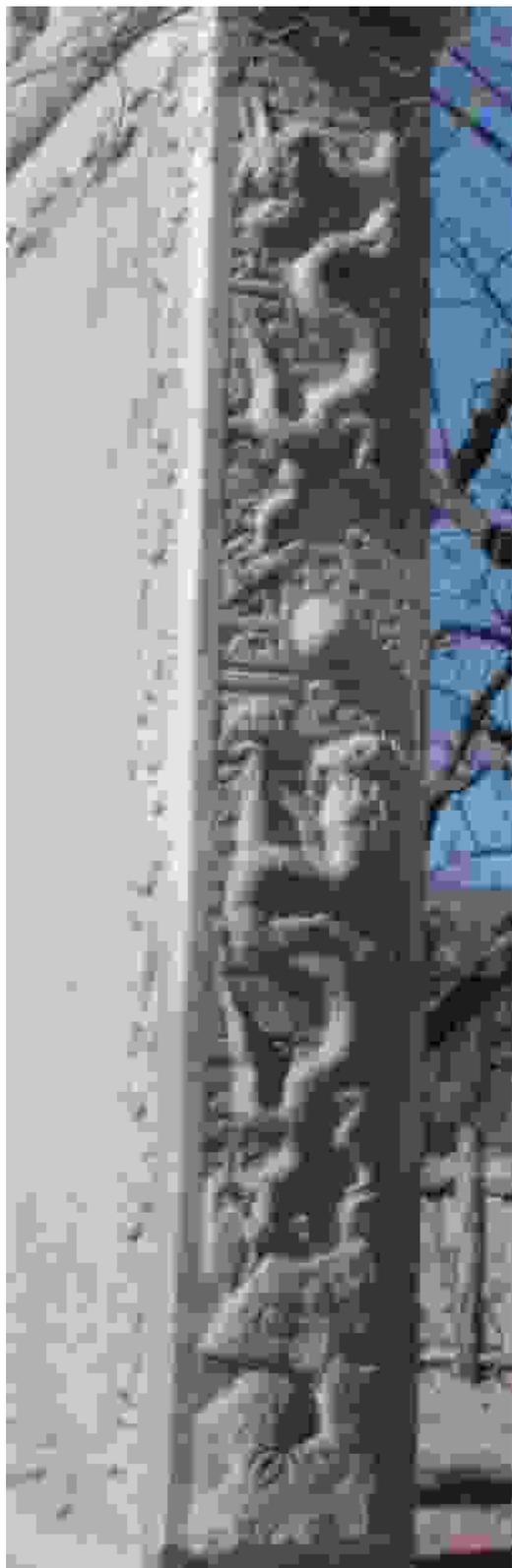
螭额的尾部分尖尾和圆尾两种。尖尾包括垂直向下状和圈曲状。理密亲王墓碑、裕悼亲王墓碑、顺承恭郡王墓碑、肃恪亲王墓碑这4通碑尾部呈尖状。其中，理密亲王墓碑尾部比较特殊，为3条尖状。这种造型略同于帝陵。

②圆尾

这一造型是清代王爷园寝螭额形态的主流，贯穿清代前期至清代后期，圆尾均为圈曲状。

2. 碑身部分

碑身是指碑的中间部分(即撰文部分)。其形制主要取决于其上下的宽度，隋唐碑身多有收分，至南宋以后，则无收分。明末清初的碑，阴面往往凸出来。碑身阳面阴刻有碑文，碑文记述墓主人一生功绩，



图一 代善墓碑碑侧

或为敕建，或为御制。碑阴无文字。文字书体除皇帝御笔外，多为清代官方在碑文中通用的馆阁体。其中，裕宪亲王福全墓碑为康熙皇帝御笔，在碑阳盖有“康熙御笔”之印。

碑身两侧饰有图案，四周伴有祥云。升龙，作向上升起之势的龙饰。据考察，亲王、郡王多雕有升龙图案，贝勒及以下品级为素面，不再饰有碑侧图案。诚贝勒园寝是按郡王规制建造，所以从品级上是一个例外。代善、祐塞两通碑侧图案为二龙戏珠；尼堪、尼思哈、杰书、永璧、允禔、奕誌、奕譞 7 通碑侧图案为升龙戏珠；诺罗布、泰斐英阿、伦柱、奕誥 4 通碑侧图案为升龙（图一、图二、图三）。

3. 碑额部分——螭首

碑额即碑首部分，又称螭首。交龙首龟趺，又称螭首龟趺。在《大清五朝会典》中，仅规定了墓碑样式是交龙首龟趺，并未规定是几交龙首。笔者在实地考察时发现，清代王爷园寝中大都以四交龙首为主，唯独河北省易县保寿的墓碑为六交龙首，较为独特。

（1）四交龙首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皆为交龙首龟趺，这与史料记载正相吻合。通过考察发现，螭首多为四交龙首。

（2）六交龙首

“顺治十年（1653 年）题准，亲王至辅国公碑身均高九尺，用交龙首龟趺。亲王碑广三尺八寸七分，首高四尺五寸，跌称之。世子、郡王碑广三尺八寸，首高三尺九寸，跌高四尺三寸。贝勒碑广三尺七寸三分，首高三尺六寸，跌高四尺一寸。贝子碑广三尺六寸六分，首高三尺四寸，跌高四尺。镇国公碑广三尺六寸三分，首高三尺三寸，跌高三尺九寸。辅国公同。”^⑧

裕亲王保寿为六交龙首，交龙形制与四交龙首形制相同，碑身厚度大体一致，并无特别之处。笔者推测，在清代王爷园寝中，对于螭首应是偶数递增，碑身厚度只要不超出常规，并无等级限制，六交龙

首已不常见，八交龙首及以上墓碑尚未发现。

4. 碑担

碑担，指龟趺与碑身连接的两壁，主要承担碑身向下的压力。龙是封建统治阶级建筑上的重要装饰题材。^⑧“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上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之基本结构，而在雕饰。建筑雕饰可分为三大类，雕刻、绘画及镶嵌。雕饰之题材，则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文字、几何纹、云气等。植物纹有藻纹、莲花、葡萄、卷草、蕨纹、树木等。在王爷园寝中，见于龙、水波纹、海浪纹，多为中国固有纹饰。动物以四神形象为最常见，马、鹿、鱼等皆汉人喜用之装饰母题也。明、清以后，雕刻装饰多用于阶基，须弥座、勾栏、石牌坊、华表、碑碣、石狮亦为施用雕刻之处。”^⑨清代前期的尼堪墓碑碑担浮雕有奔马图案；尼思哈墓碑碑担浮雕有梅花鹿图案（图四）。由此，可见清初期在墓碑装饰图案上承袭明制，逐渐接受汉人的思想。

（1）有浮雕

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出凸起形象的一种雕塑。依表面凸出的厚度不同，又分为高浮雕、浅浮雕两种形式。^⑩图案有团龙、鹿、奔马等，寓意吉祥。诺罗布、泰斐英阿碑担浮雕为麒麟；杰书、伦柱、奕誌、奕諲墓碑为正视龙的形象（图五）。道光朝以后均为正视龙的形象，后期只是在雕刻上显得复杂。

（2）无浮雕

在清代王爷园寝中，龟趺与碑之间的两壁未有纹饰者居多，无论是清代前期、中期还是后期，碑担上的浮雕图案与品级



图二 永璧墓碑碑侧



图三 伦柱墓碑碑侧

无关，推测与王爷本身个人喜好和家族习惯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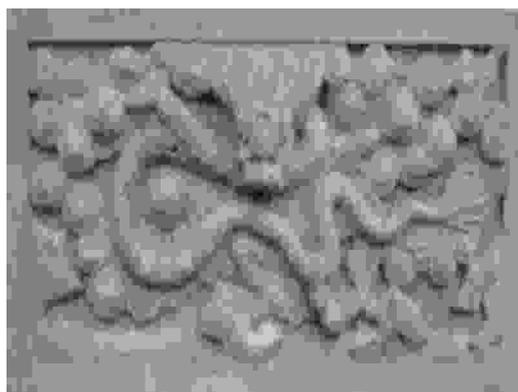
5. 水盘

水盘，是指碑底底面的海漫石图案，多刻画以江河波涛。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物的，一种是动物的。焘辰四周有海漫、海水江崖。在海漫四个角各有一个旋涡，内有鳖、鱼、虾、蟹各一，反映出焘辰的生活地点及所食食物。清代中期，水盘的题材较为多样，标新立异。至清代晚期，水盘的题材比较单一，装饰细节等程式逐渐固定化。

（1）人物



图四 尼思哈墓碑碑担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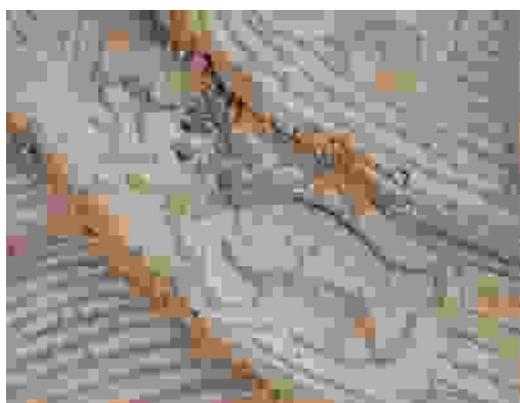
图五 杰书墓碑碑担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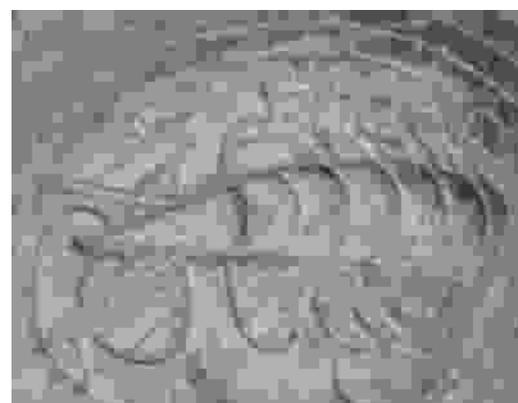
图六 弘瞻墓碑水盘人物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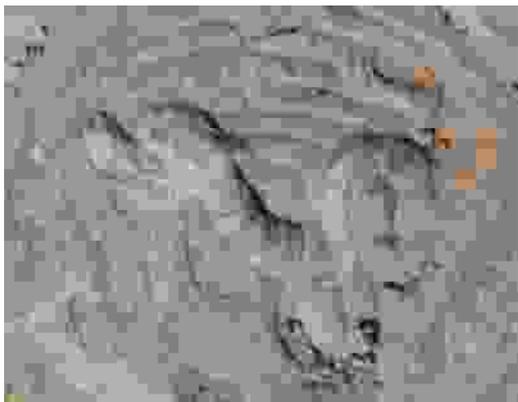
图七 泰斐英阿墓碑水盘马的图案



图八 泰斐英阿墓碑水盘游龙图案



图九 泰斐英阿墓碑水盘虾的图案



图十 泰斐英阿墓碑水盘乌龟图案

水盘四个角雕有人物的造型在清代王爷园寝中比较特殊。人物形象有马面人、打鱼者，如诺罗布墓碑、弘瞻墓碑（图六）。

（2）动物

水盘四个角雕有动物的造型比较普遍。其中包括海洋动物及奔马、蛟龙等（图七、图八、图九、图十）。

（3）海水江崖

这种图案见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墓碑。

综上所述，清代王爷园寝中的墓碑规制除规定碑首、碑宽、趺高等尺寸数据外，碑的做工造型、细节则趋于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造型，便于工匠们在造型艺术上的发挥，更能体现某一具体时期的风格、样式。从总体上来说，各个时期反映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清代王爷园寝中螭趺形态可分为4期，即：初始期（清代早期）；发展期（清代前期）；鼎盛期（清代中期）；衰落期（清代晚期）。

清代早期以东京陵和硕庄亲王舒尔哈齐的墓碑为例，至清前期顺治朝是一个过渡时期。到了清代中期，乾隆朝螭趺为清代王爷园寝石雕艺术品中的精品，更具典型性。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经济、物质财力有关。纵观其规制，康雍乾盛世时期的雕刻细而圆润，精美复杂；到清朝晚期，道光朝、咸丰朝雕刻稍有死板，工艺较清朝中期笨拙、线条简单。

四、余 论

清代王爷园寝在建筑组合上，可分为I型、II型、III型。I型：神桥、碑亭及墓碑、宫门、东西厢房、飨殿、宝顶。II型：石碑坊、神桥、碑亭及墓碑、宫门、东西厢房、飨殿、宝顶。III型：碑亭及墓碑、石碑坊、石拱桥、石碑坊、华表、平桥、神桥、宫门、东西厢房、飨殿、宝顶。

本文只论述自太祖努尔哈赤位下清代宗室爱新觉罗支系的亲王、郡王，并未涉及清代的蒙古亲王、郡王、外藩藩王等。他们之间相互的联系、相关制度与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第13页。

②（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17页~18页。

③（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第114页。

④⑤（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17页。

⑥在现存螭首龟趺碑中，其中1座贝勒园寝按郡王规制建造，即康熙皇帝第23子允祁园寝。因此，将此处计算为清代王爷园寝墓碑的数量。

⑦周莎：《北京地区及周边清代王爷园寝地宫形制管窥》，《北京文博》2008年第3期。

⑧《钦定大清五朝会典》，线装书局，2006年4月，第十一册，第672页。

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四十九，《工部、园寝规制·坟茔规制》。

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词典》，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第170页。

⑪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第57页。

⑫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词典》，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第288页。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民 国 总 统 徐 世 昌

手 札 初 探

付 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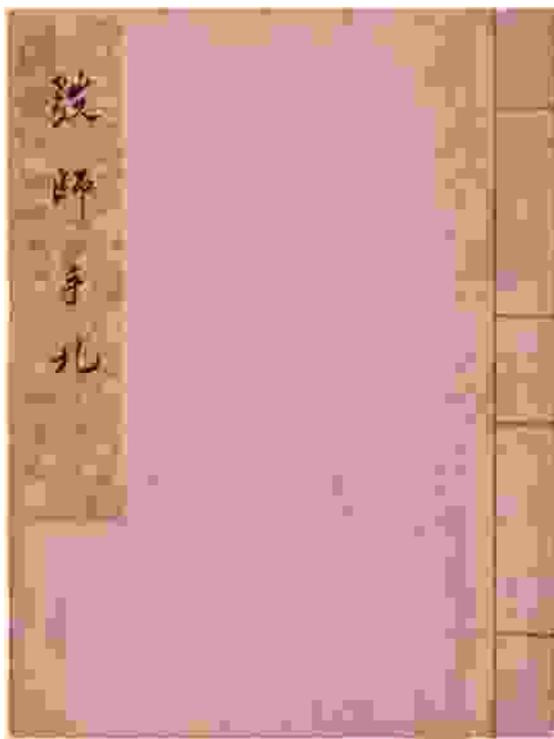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弢师手札》五册，各册封面皆有周肇祥题签“弢师手札”（图一）。民国前总统徐世昌有号曰弢斋，故晚后若周肇祥等辈便每以“弢师”尊称之。由此可知，这五册手札当是徐世昌的书信集。或即由周肇祥收集装订成册，并一度收藏。周氏去世后，他收藏的部分书稿、拓片转交我所收藏。

徐世昌（1855—1939年），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等。1886年中清光绪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等职。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成为袁的主要策士。清末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东北三省第一任总督等职。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被袁世凯封为“嵩山

四友”之一。1918年被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下台，后迁居天津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世昌屡次拒绝出任日军伪职。1939年6月在天津病逝。徐世昌一生著述颇多，据初步统计，其著作超过30种，在近代史学、文学领域中，徐世昌堪称大家。他精通诗文、鉴赏、收藏，善

于书法、绘画、篆刻等，素有“文章魁首”和“总统诗人”之美誉，在清末民初的诗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周肇祥（1880—1954年），浙江绍兴人，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室名宝觚楼、婆罗花树馆。周氏为清末举人，毕业于法政学校。清末至民国，历任奉天警务局总办、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使、山东盐运使、京师警察厅总监、湖南省长、临时参议院参政、葫芦岛商埠督办、



图一 《弢师手札》书影

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清史稿》总提调等职。曾在北京主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他善长书法、绘画、篆刻等，尤其善画兰，颇清雅。他还精通诗文、鉴赏、收藏。周肇祥的著作亦甚丰，著有《补正宋四家墨刻簿》、《山游访碑目》、《东游日记》、《古都怀古诗》等。

所藏《弢师手札》五册，横 25.9、纵 34.8 厘米。收录徐世昌书信 370 余件。徐氏手札粘贴在五册装裱良好的册子上，疑为周肇祥精心整理后装裱的，足见他对此手札的珍视。此手札第一册首页钤印有“王研堂”、“曹秉章”。可知在周肇祥收藏前，为王研堂、曹秉章收藏。曹秉章即曹理斋，是编纂《清诗汇》的重要成员之一。《弢师手札》的内容极其丰富，有编纂《清诗汇》之事，有编纂《退耕堂政书》之事，有论书法之事，有清代诗歌等。

徐氏手札中大多数无收信人名号，仅少数有收信人“樊樊山”、“柯凤孙”、“曹理斋”等。据手札所载，徐氏曾请王式通、樊樊山、柯凤孙、傅沅叔、董受金等学者铨选清诗，辑成《晚晴簃诗汇》（又名《清诗汇》），那么徐氏手札中有关《清诗汇》的内容很可能是与王式通、樊樊山、柯凤孙、傅沅叔、董受金等学者相关的。另外，手札中多无具体纪年，只有某日，或者某月某日。徐世昌于 1922 年下台后，在天津从事学术活动，又据《水竹村人年谱》“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王书衡式通自京来商选诗各事。”而《清诗汇》为 1929 年刊行。因此，有关《清诗汇》的手札当写于 1923 年至 1929 年。具体年代还有待考证。

《弢师手札》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文献未载或论及不详的许多史料，颇具文献价值，兹略举数例。

一、《清诗汇》的出版思想与活动

《清诗汇》原名《晚晴簃诗汇》，是

迄今规模最大、收诗最多的清诗总集，选录从明末遗民至民国初年已卒全清各时期的诗人，共六千一百余家，诗二万七千余首。为研究清代诗史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徐世昌手札》广泛论及《清诗汇》的选题、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印刷等问题，体现了丰富的出版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出版思想史料，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 关于《清诗汇》的定名

徐氏说：“晚晴簃诗录字仍有录有不录之义，当不如用晚晴簃诗汇字，包括较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能汇聚于一国，其诗亦可汇集于一册之中。吾弟以为何如？请与诸君子酌裁。”又说：“昨嘯鹿来言斟酌诗集名目，诸吟坛所商均极周至，鄙意亦拟一名曰《晚晴簃诗选》，极空洞，极涵盖。名称其实与诸公所筹商皆不触不背，请卓裁。如用此名目，则诗话仍用晚晴簃字样。”徐氏指出：“选诗定名为清诗汇何如？请诸吟坛酌定。”徐氏在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充分发扬民主协商精神，共同拟定诗汇名称。《清诗汇》原定名为《晚晴簃诗汇》，因徐世昌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晴簃诗社”。而《清诗汇》又是晚晴簃诗社诸人一起编选的，因此诗汇名为《晚晴簃诗汇》。后经诸吟坛反复协商，最终定名为《清诗汇》。

2. 关于《清诗汇》的目录

徐氏手札云：“诗汇前应否要目录？某人若干首，某人若干首。”他反复强调“各省目录中，尚有已阅过诗而未入目录者，将来全书告成，卷首似应编定人名目录。每人送若干首，应否旁注于人名之下。”又说：“将来刻书时，序、凡例后，拟应将所选各家人名下注选若干首，列一目录如何？祈卓裁。”他认为应按朝代分列目录，“御制诗闻已编成，未见目录，各省如方外闺秀，各类尚未见目录。按朝代目录甚清晰，将来正本目录，必是暗中按朝代分列。然目录已甚多，必须数本，请卓

裁。此次目录是否亦须另存？”还说：“现在所阅各册，尚有国初各家之时，不知何时方能据朝清理。分省目录名下，注字注籍，甚便于检查。将来成书后，能将此清本另印出，存查亦佳。江浙两省最多，其它省有太少者如何？限于疆域，限于人才，无如何也。然不可有遗漏之省，请检查为嘱。”徐氏认真负责亲自审阅诗汇目录，“此次送来目录已阅一过，没有详细校正目录，仍随时送阅，未检查者，速检齐开出送阅。”“分省按朝前目录均阅过，仍寄回，请察入。”“元诸人一为检查，以便详编书目也（五条书目已编出）。”“已选之诗阅定者，现有若干者，如有草单目录，拟先一览，未阅定者，尚有若干，待搜求补遗，约略尚有若干，所示一大概否？”徐氏在此提出了编制诗汇目录的具体方法，强调了编纂《诗汇》目录的必要性，对《诗汇》的编辑出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关于《清诗汇》的选诗

徐氏对选诗自有一套标准，其一，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徐氏云：“未选各诗应先将顺、康、雍三朝各专集分发各君选完再发乾隆朝，庶有次序，以免紊乱，祈酌裁。”其二，徐氏提出选诗应选本人最擅长之诗，徐氏认为“统论有清一代各诗家，律诗擅长者最多。古体除诸大家分音节，多不能入古，且时时有律句麇入，选诗者应留意。七绝有擅长者，五绝最难入选。此致理斋、叔衡两吟坛卓裁。”他说：“选诗当看本人，工于古体者，多选古体，工于近体者，多选近体，则得矣。”“每一集中不能各体皆佳，应择其擅长者入选，不必专备各体。诸吟坛以为何如？”“所选各家中有加签编时再酌者，如以原选一、二首不甚洽意者，或将原本检出另选一、二首，以存其人。”其三，选诗分为三种类型，他认为：“选诗大宗当分诗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如国初吴梅村诗人之诗也，钱龚皆才人之诗，其王渔洋、朱竹垞诗人之诗也。宋施皆学人之诗。沈尚有诗人之意，此分南北各有诗人家。康

乾以后大江以南之诗仍多才人，真正诗人之诗一代能有几人？学人之诗时或有之，才人之诗近于诗人，其奥妙非神明于此者，不能辨也。学人之诗见力量，才人之诗见才华，至诗人之诗，则灵气往来超然之妙意。按朝分列，仍当以诗人之诗居首。”其四，选最佳之诗入选，不宜太多，切勿重复。徐氏云：“十次各册中，选诗稍多，请叔衡再阅，如有过多者，仍可酌删。”“以后如有原选过百首者，不妨先删，不可先发抄，免费时日，又多费抄资。”“如有仅选一首多首，须探其本集极佳者或写一联一句极佳者亦可。”“所选各诗有复选者，一人两选三选者，汇总时须格外留意，勿一人两列之。”“收来会合各卷综核时，如有原选太多者，仍可一并酌删。如有原选太少者，可酌量加选……，卓裁。”其五，应注意选乐府诗。徐氏云：“乐府请留意入选，以备一格。”其六，要谨慎选择优秀的御制诗及乐章。徐氏说：“乐章只录御制，不载各乐章，论议甚确当，惟平金川三十章是否皆协宫商？须请通乐律者谱过才好，不然后世知乐者读之，必有论议矣，慎之。或选御制数篇，再选乐章尤雅者数篇何如？大清乐章共若干卷，有无专书，会典中是否全载？请查示。所抄第二册乐章，看似叶音律，乐章必以叶音律为合。”“前阅御制诗及乐章均已选定，拟先发刻，请先交来一阅。如欲一面选，一面刻，请先将凡例拟出，大家考订后，并将选诗人姓氏亦排列，一稿序文亦不妨先拟出……同商酌。”其七，要注意搜罗北方之诗。他认为：“北方各省诗集请注意搜罗，河南诗集亦请详细搜求。”其八，应留意酌选短歌诗。他说：“所选诗各体中短歌甚少，请诸君留意酌选，以备一格。”其九，为诗歌作者撰写人物传。徐氏曰：“俟诗选成后再选诸君著作，亦各撰一小传，以存此一段文字因缘也。”其十，选父子祖孙之诗亦按长幼排列。徐氏认为：“编诗时如有父子祖孙各有专集入选者，编列勿倒置，请留意。”“同时有父子弟兄均有诗

入选者，请留意前后次序，勿子亦父前。”“收来全诗选，就兄上代入选之诗是否注明吾弟代选，抑于凡例内注明一条，请卓裁。”其十一，还应选闺秀各卷。他说：“序文凡例，亦须预备闺秀各卷，亦须即选定也。”

4. 关于《清诗汇》的编校

徐世昌对《清诗汇》的校对要求极严，做到逐字逐句，绝不放过一个错字。他指出：“各卷中讹误之字及格式可拟之处，均请分别酌定校正。”“各册内不免有讹误字未校出者，请再查校，免缮清本时，又讹错也。”“各卷有斟酌处皆注有字，请酌裁。”徐氏在校对中还提出了格式要统一：“各卷题目书人名，有旁写有直写者，请酌定，须一律不可参差。各卷题目没有序文，有高一格写者，有低一格写者，须一律不可参差，请酌定。”同时字体也要统一，他认为：“各卷写手不一，字亦有一字各写不同者，将来写正本宋字时，须详校。凡一字数体者，能择定一体，一律照写方好。避讳缺笔者，亦有缺有不缺，亦须校正一律。”他还强调“每刻成若干卷，当必随时校对，其中恐有大讹误处，尚请叔衡闰枝随时校看，以期精善为重”。这样做，体现了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

5. 关于《清诗汇》的装帧

徐氏手札广泛涉及版式、字体、用料等问题，他说：“董受金由津返京，作数日留。属其晤执事，酌商刻书及诗版格式诸事。印数、字体、版式，请与受金即酌定。”又说：“写宋字比上板刻亦费时日不少，请先与沅叔将从前商定书板样式，先与刻工将刻资商定，先行发写校对，积有多卷再行发刻，写字非先行挑选好手字体。”可见他对《清诗汇》的装帧尤为重视。

关于刻书的字体，他认为：“既定以此本即照写宋字刻本”，“如刻本写宋字时，须请高手详校一过”。表明了他对宋字情有独钟。

关于用料，他主张“至诗选将来刻印时，皆用棉连纸”，棉连纸为高档纸张，价格昂贵，只宜制作精印刻本。而“自己收藏，

或用榜纸”。“蓝样本只刷粉连纸，不刷好纸”。表明徐氏很有经济头脑。

6. 经费

徐氏手札谈及晚晴簃诗社的经费问题：“社中用款浮于预算，明年预算请先酌核拟定，以节缩为宗旨，以便预为计划。”“昨将前来函分明注明寄去，即请预为记画，明年款项格外从俭，尚须若干以便筹画，所有办法即照来函至阴历年内，截止明正即照新章办理，一切节缩或易办理，亦可从速，明年计画应分上半年、下半年两项分计也。”这样做体现了徐氏按计划用款、勤俭节约的思想。

二、关于徐世昌书法

徐世昌以翰林出身，擅长书法，他的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徐氏手札中曾言及其书法。他说：“近鄂人重修赤壁……余作楹帖复属苏东坡赤壁两赋。余学苏书二十余年矣，近写此两赋而不敢用苏体，盖望文忠而却步矣，略参晋唐笔意，坡公当亦许我乎？余藏东坡西楼帖、宋拓精本，与世传苏书多不同，坡公之书得力于钟太傅为多。赤壁胜迹籍两赋，始传自东坡，至今江上多事临臯赤壁之胜，又不知几经兴废，今之重修赤壁者，有功于坡公亦不少。”可见徐氏长期收藏学习苏轼书法，又参考晋唐等书法家的笔法，并能取其精华，略变其体，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书法艺术。

目前，学术界主要偏重于徐世昌政治生涯的研究，而对其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甚少。《弢师手札》的发现，对研究清朝及民国的文学史、政治史、艺术史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徐世昌的思想、艺术、文化等亦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徐悲鸿与《风雨归舟图》

佟 刚

一、一段收藏佚事

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阳朔时收藏到一幅画，它是五代大画家董源的一张巨幅画作《溪岸图》。徐悲鸿十分珍爱，视之为“天下第一北苑”。不久，张大千到桂林拜访徐悲鸿时见到这幅画，立即被它深深吸引住，他向徐悲鸿提出要带回四川“研究和鉴定”，作为好友，徐悲鸿答应了他。于是，此画一直保存在张大千处。一晃几年过去，1944年，徐悲鸿又同意张大千的请求，把《溪岸图》与张大千收藏的一幅清代金农的《风雨归舟图》（图一）作了交换，于是两人各遂其愿，皆大欢喜。《风雨归舟图》一直被收藏在徐悲鸿身边，现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而《溪岸图》也一直收藏在张大千身边，直到1968年，美籍华人大收藏家王己千用十二幅其他的画与张大千作了交换。现在，《溪岸图》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在这件事中有意思的是，董源的名气比金农要大得多，董源存世作品的数量十分稀少，《溪岸图》的尺幅也比《风雨归舟图》大得多，所以若论经济价值，《溪岸图》要比《风雨归舟图》高何止数倍，那么，徐悲鸿为何会爽快地同意这么交换呢？

二、董源和《溪岸图》

董源，五代南唐画家，生卒年不详。中国美术史上，五代时期的荆浩、关仝、

董源和巨然四人，以他们的作品，对后世的中国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元四家、明代吴门画派、清初四王等后来历代的多位开宗立派的大画家，都潜心学习过董源的手笔和风格，对其推崇备至。

《溪岸图》，徐悲鸿当年称之为《水村图》，直到1957年谢稚柳审定后，才确定其正确的名字应该是《溪岸图》。《溪岸图》为水墨绢本，宽110厘米，长221厘米，画面中峰峦叠嶂，树木茂盛。山脚下宽阔的水面上荡起层层涟漪，坐落岸边的水榭中有一家四人，女主人公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童处于水榭的左侧，头戴高巾的男主人公坐在右侧的栏杆边，正在向远处眺望。他们后面的山坡上，精细描绘的屋舍、农人、樵夫及耕牛，交织出一幅山村晚归的景象。整幅山水人物画传达出陶渊明《桃花源记》一般的出世意境。

这幅作品的身世至今是个谜，从画面钤盖的印章可以看出，这幅画曾被宋、元多位名人收藏，在明代也曾被皇家收藏。此后不知何时流落民间，直到1938年被徐悲鸿在桂林发现。

由于年代久远，画史上记载董源的资料太少，董源存世的作品只有寥寥几件，所以对于这幅画的真伪年代，人们曾多有争论。但徐悲鸿、张大千、谢稚柳等人当年根据作品的艺术表现一致认为它应当是董源的真迹无疑，并且是董源的一张尺幅巨大的珍贵作品，它的深具时代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笔墨功力均非后人所能仿造。199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利用现代技术

手段也鉴定出《溪岸图》是一幅年代久远的作品，其所用绢的物理特性最晚也不会低于13世纪。近年来，考古资料不断丰富，根据作品的笔墨风格和时代气息判断，作品应是五代时期的作品，再根据画面落款和画史记载推断，作品应非董源莫属。前些年喧闹一时的现代伪造一说也逐渐变得不值一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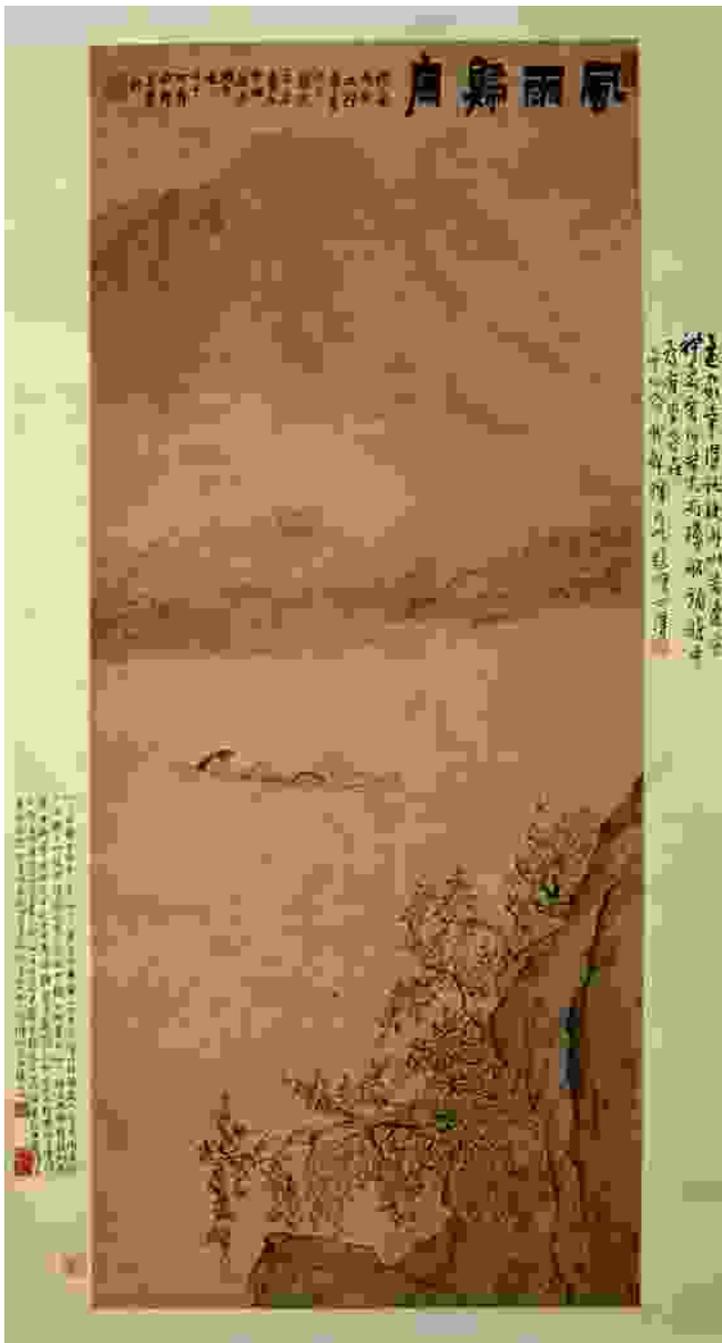
徐悲鸿在1938年得到这幅画时，就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弟得董源（《水村图》）巨幅，恐为天下第一北苑。大千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弟即托之作一番考证（有款及宋内府印，贾似道、柯九思印）。绢本颇损，但画极佳。人物、界画、房舍、山村、山泉均极妙。”今天看来，当初徐悲鸿从一个画家的角度对该画的审视是非常中肯的。纵观中国美术史，能有此笔墨气韵的绘画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与画史记载的董源十分相似。至于画面落款“后苑副使臣董元画”与一般人们所知的“董源”和“董源为北苑使”的称谓不符问题，只能留待今后作进一步考证，但这幅画的古老年代和重要艺术价值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金农和《风雨归舟图》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先生，清代乾嘉时期“扬州八怪”之首，其作品不落前人窠臼，更多的是呈现自身风格和抒情气氛。虽然在50余岁之后才开始大量作画。但在短短的20多年里，

他出手不凡，落笔生花，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传世名画。

《风雨归舟图》长54.5厘米，宽126厘米，画面纵向，上方是雨中迷蒙的远山和山脚下岸边随风雨起伏的苇丛。中间留白处是大片的水面。画面右下方，工细写



图一 清代金农《风雨归舟图》

出峭立的山岩和岩石上经受狂风骤雨的树木。而这一切作为铺垫，衬托了风雨交加的水面上，一叶孤舟正在顶风逆水而行的场景。船头一人撑伞蜷缩，船尾艄公身裹蓑衣在奋力摇橹。画面全以淡墨勾描渲染，风雨大作的气氛和小船赶路心切的情态跃然纸上。

金农在世的时候就享有画名，慕名求画的人很多，作品很值钱，所以他代笔的作品也很多，这还遑论后人的伪作。并且有些代笔作品可以说几可乱真。金农也曾公开说，他的画很多都是自己的学生罗聘和项均代笔的。目前，书画界普遍认为金农亲笔画作的数量不足其所传世画作的十分之一，现在市场上流传的金农画作，90%都是代笔画或者赝品，同时，金农代笔画作的艺术水平也差别极大。作为仿画高手的张大千对金农也青睐有加，认为金农是高过同时代其他画家的。在扬州八怪之中他只仿造金农。《风雨归舟图》这幅作品，当年徐悲鸿在张大千处看到时就很喜欢。今天我们无论从笔墨、构思、气韵看都应该是金农的亲笔无疑，并且是金农真迹中的珍品。

徐悲鸿1950年题写的跋文给予这幅画高度评价。他写道：“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宋人《雪景》，周东邨《北溟图》，与此幅可谓现世界所存在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尚有之，巨大卑俱难当吾选也。1938初秋，大千由桂林挟吾巨帧去。1944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品为重，不计名字也。”徐悲鸿之所以很高兴地用五代董源的大画换清代金农的小幅，是缘于他认为《风雨归舟图》是五千年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其艺术价值要比“天下第一北苑”更高。

四、徐悲鸿跋文的解读

为什么在徐悲鸿眼中，大名鼎鼎的董源的巨幅山水比不过金农的一张小画呢？在张大千看来，金农肯定是比不过董源的，所以他用《风雨归舟图》换取了《溪岸图》。那么两张画哪张更有价值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一下徐悲鸿和张大千的不同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就会得出答案。

张大千十分喜爱董源等古代大师，他的创作首先来源于仿古和摹古。张大千的学古之路，贯穿其大半生，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最初在上海时他曾学任伯年、改琦人物，后遵师嘱转师石涛、石溪、八大等野逸派文人山水与花卉画，渐弃早年所习。随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宫名画的散佚，他北上到古物陈列所研究古画，眼界日宽，在上世纪30年代，其画开始上溯宋元时的董巨和王蒙、赵孟頫诸家，主攻水墨与浅绛山水，同时，他又受北方画家于非闇启发，涉足宋人著色花鸟。40年代，张大千西渡流沙，面壁敦煌，临摹失传已七八百年的晋唐人物画达三年之久，风格随之大变，人物画全然转向双钩重彩的唐风，画山水则水墨与丹青并举，结合北宋李郭派遗格，形成了以唐融宋的华贵新风。至1948年后避居海外前，张大千已理解并掌握了传统中国画包括水墨、丹青两格的几乎所有法门。通过对古画的临摹和仿造，张大千的作品深入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堂奥，并能做到学而能舍，学有所创，不为古人所囿。他的柔韧的线条和冷艳的设色、优雅而明快的构图，也使徐悲鸿赞其为“五百年来一大千”。

张大千的创作基本是遵循了中国传统美术的脉搏，近现代美术革新的巨浪袭来，只是使他更深地埋头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源流，从中汲取营养和寻找精神寄托。从董源、范宽到石涛、金农，无论是历代名迹还是敦煌壁画，张大千都仔细地加以分析和取舍，并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创作中，直到他晚年以前，他作品一贯的风格堪称富丽、精细，具有职业画师的一丝不苟和井井有条，当然也深具天才艺术家的灵气和感染

力。同时张大千的意识和情感是倾向于“出世”的空灵洒脱而不羁于世俗，所以他自号“大千居士”，这也造就了他作品的唯美和避世的格调。虽然有着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写实精神和创造精神，不像一般文人画那样追求笔墨趣味或笔笔讲求师承，但终究是回避了社会变革和民族救亡的大前提，是一种独善其身而非兼济天下的处世风格及艺术境界。但这也说明了张大千酷爱董源的《溪岸图》是顺理成章的。

徐悲鸿的性格充满了不屈不挠的自强和与世抗争色彩。他 17 岁就独自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边作画，边教学，这后来也几乎成为了他一生的创作模式。徐悲鸿面对残酷现实坚强不屈、冷静思考的性格决定了徐悲鸿作品的写实风格的基调和偏好。他人格中的悲悯，不是文人的风花雪夜或寄情山水的隐遁、“出世”，而是路漫漫上下求索中的一种孤独无助，是非常“入世”的一种现实主义情怀。现实世界和周围的人，是徐悲鸿时时所关注的，眼见祖国的积贫积弱和被列强欺辱，下层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美术成为徐悲鸿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

徐悲鸿的艺术也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在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存亡攸关的时代，徐悲鸿像众多仁人志士一样，心系民族危亡，他抱定艺术救国的信念，以博大的胸怀和敏锐的洞察力，艰难开拓，力图改变中国画的颓势，重振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他只身从宜兴农村来到上海，在开阔了视野后，又争取到留学日本和法国的机会，先去日本，再赴欧洲八年，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写实艺术，在中西艺术比较中进行中国画的创作和油画创作。徐悲鸿说，他学习西画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画。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徐悲鸿早在 1918 年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观点，并践行终身，为中国画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创作出一批深具影响的国画、油画和素描，成功地实现了自己艺术报国的理想。

在徐悲鸿的创作中，对苦难现实的悲剧性思考和对光明未来的强烈期待成为主要的情感色彩，而写实理性的表达方式也成为他的一种创作自觉。他创作的中国画既符合传统审美，又有时代精神，开辟了中国画的新境界，他对人的表现，使中国人物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极具时代精神。徐悲鸿的艺术不是唯美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他非常反感传统文人画中的逃避现实的矫揉造作和唯知师法古人的八股画风。他推崇在题材上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反映现实和表现人的性格、精神来讴歌真善美的古代作品。

金农的《风雨归舟图》，画面上人物与风雨的抗争，全然不是一般文人画的渔樵归隐和空泛的笔墨游戏，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准确描写和生活情感的细腻表现，笔墨技法也很高超，得到徐悲鸿的由衷喜爱就不足为奇了。反观《溪岸图》，虽然徐悲鸿认为它“画极佳，人物、界画、房舍、山村、山泉均极妙”，但画面表现的主题和人物的精神面貌则和徐悲鸿的艺术追求大相径庭。所以徐悲鸿称《风雨归舟图》为奇迹，心甘情愿地用《溪岸图》与张大千进行了交换，并在裱边上题写了如前所述的长篇跋文。

徐悲鸿和张大千，是中国现代史上同时期的两位美术巨匠，他们的艺术成就彪炳千秋且垂泽后人，而他们各自的艺术追求却又迥然不同。他们的换画佚事，很多地方都令人回味，故事明白无误地传达给我们两位伟大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和对古代艺术杰作的热爱，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关艺术评定标准问题的长久的思索。

（作者为徐悲鸿纪念馆助理馆员）



图九 清光绪明黄缙丝五彩云蝠寿金龙袍

北京故宫文物 调拨抚顺市博物馆30周年

张 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受抚顺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秀嫣的邀请，到抚顺郊区的元帅林帮助鉴定存放在园内的明、清石刻及石刻的陈列摆放工作（元帅林是当年张学良为父亲张作霖修建的陵寝，但张作霖并未安葬于此，而是因故改葬他处。这些石刻大部分是张学良从北京王爷陵、太监墓等处收购的石像生、石牌坊、石雕件等及后人收集的石刻）。

鉴定工作结束后，杨伯达院长受邀到抚顺新宾永陵、赫图阿拉城进行参观，参观中他发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发祥地的早期城址及祖辈陵墓都在抚顺新宾，却没有相关的文物陈列。抚顺在研究清前期历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很需要一批相应的文物作为研究之用。而抚顺博物馆

是成立于1973年的小馆，建馆时间较晚，到1980年前后，馆藏数量不过几百件，且没有高等级的文物藏品。杨伯达院长深感地方文物资料研究的缺乏，很想为抚顺做点什么。

当时抚顺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秀嫣也深感其馆藏文物数量太少，难以撑起一座市级规模的展馆，对地方研究人员来说缺少馆藏难以开展学术研究；同时抚顺市博物馆还打算在抚顺举办一个大型的清朝文物展览。所以，为了抚顺市博物馆的长远发展，为了举办清朝文物展览，他们决定四处征集文物。正好有了杨伯达院长来抚顺的契机，他们就多次到北京请求杨院长的帮助。在杨院长主持下，经多次来抚顺调研后，由抚顺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经国家文物局特批，决定将北京故

宫博物院一批清宫旧藏文物无偿调拨给抚顺市博物馆和新宾满族自治县文管所。

1982年8月31日，抚顺市博物馆到北京接收这批文物。故宫博物院保管部的高和、张兰芳等人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各部门筛选出的总计310件宫藏文物，移交给抚顺市博物馆的王秀嫣、赵秀芝。能够得到大批宫藏文物的无偿调拨，这是一个特例，其对抚顺文博界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意义重大。这批文物，包括瓷器101件、宫廷器物102件、工艺品35件、青铜器20件、织绣52件。如今，这批文物藏品已成为了抚顺市博物馆馆藏中的精品文物，其中有两件藏品已被定为一级文物，是抚顺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现择其重要藏品简要介绍如下：

一、瓷器类文物共101件，其中一级文物1件，其余均为二三级文物，各类瓷器大部分以清代各时期的器物为主。

1. 明永乐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瓷碗（一级文物）

碗高9.8厘米、口径20.8厘米、足径7.2厘米，敞口，圆唇，弧壁，深腹，圈足。碗内壁刻有莲瓣纹，外壁釉下刻暗花缠枝花卉，口沿下有回纹带一周。纹饰刻画规整，线条清晰自然。胎质坚致细密，器壁较薄，通体施白釉，釉色光亮洁白，温润如玉，制作工艺极为精细，堪称“甜白”釉瓷的优秀之作。甜白釉是永乐时期景德镇窑厂创烧的一种白釉品种，其特点是釉白如凝脂，素若积雪，其色调恬静柔润，代表了中国制瓷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这种白釉给人以甜润之感，所以被称为“甜



图一 明永乐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瓷碗

白”，也有人称其为“填白”，是因这种白瓷可用来填彩绘画。永乐时期甜白釉瓷器的产量大于宣德时期，是宫中主要用瓷。这只“甜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瓷碗已成为抚顺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让地方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接触了国家级文物，打开了研究的视野（图一）。

2. 东晋婺州窑青瓷褐彩双系壶（二级文物）

壶高20.9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9.7厘米，盘口，束颈，丰肩，鼓腹，平底。口沿处点缀四处酱褐色的斑点，肩部弦纹带内塑一对半环状系、贴一对装饰小耳。胎质灰褐，施有化妆土，施青釉不到底，釉面光亮有细碎的冰裂纹，给人一种似冰如玉之感，尤其是褐色的斑点装饰突破了青釉传统的贴塑装饰手法，更显新颖独特，为婺州窑典型产品（图二）。

婺州窑是浙江青瓷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地区继“德清窑”、“越窑”后的又一个青瓷窑场，婺州窑创烧于东汉，以民用瓷为主。西晋晚期为掩盖其胎色，在胎的表面涂一层白色化妆土，然后施釉，使釉层滋润柔和，提高了青瓷釉色的发色效果，采用化妆土装饰的工艺技术是我国陶瓷工艺史上的一大突破。

3. 唐青瓷双龙柄尊（二级文物）

尊高36.5厘米、腹径18.5厘米、底径9厘米，盘口，口沿外卷，长束颈，深腹，



图二 东晋婺州窑青瓷褐彩双系壶



图三 唐青瓷双龙柄尊



图四 北宋龙泉窑青瓷莲瓣纹五管盖瓶



图五 清康熙青花锦地福寿字花瓶



图六 清康熙五彩龙凤纹碗



图七 清雍正天蓝釉尊

腹下内收，平底，施半截青釉。肩部塑双龙形曲柄，龙形矫健威猛，龙口衔于口沿上，造型新颖别致。此器的特色不以纹饰为重，而是通过新颖的造型取得独特的艺术效果。造型设计受西亚和中亚影响，吸收外来胡瓶的特点，带有异国情调，既反映了唐代人们的生活意趣，也浸透着外来文化的因素，显示出唐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图三）。

4. 北宋龙泉窑青瓷莲瓣纹五管盖瓶（二级文物）

瓶高 26.5 厘米、瓶口径 8.4 厘米，五管瓶盖呈塔式，葫芦形盖纽。盖面上刻画覆莲瓣纹，叶脉纹饰清晰。瓶为直口，溜肩，四重塔式长腹，圈足。肩部塑荷茎状五管，管中空直立。腹下部用浅浮雕技法刻二层仰莲瓣纹。瓶的造型奇特，端庄古朴，极富北宋时期的时代特征。胎灰白，通体施青釉，青中泛黄，有细碎的冰裂纹，釉色透明莹润（图四）。

青瓷五管瓶是龙泉窑特有的产品，其他窑口不曾烧造。龙泉窑烧造的五管瓶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北宋时五管瓶大量生产，种类丰富，品种繁多，装饰多样。就器盖而言，有葫芦钮、莲花钮、振翅的小鸟、打鸣的公鸡、仰吠的小狗；就小管数量而言，有四管、五管、六管、七管，



图八 清乾隆影青暗画缠枝莲纹高足碗

其中五管最为常见；就管口形状而言，有圆形、花形，还有的不是管状的，而是叶形的，有五叶、四叶等；就装饰而言，有篾划纹、莲瓣纹、素面无纹。五管瓶用于陪葬，为冥器，也有说法称之为“谷仓罐”，是对灵魂永生的寄托。

5. 清康熙青花锦地福寿字花觚（二级文物）

觚高 45.7 厘米、口径 22.5 厘米、足径 13.8 厘米，大敞口，唇略外卷，粗长颈，丰肩，鼓腹，束颈，底部外展，二层台圈足。花觚外壁满饰锦地“福寿”字为装饰，又称“百寿图”。字体工整，书写形式多样，笔画有力（图五）。

此种器物其器型因口部外展呈凤尾状，故也被称为“凤尾尊”。造型修长，优美大方，线条硬朗，胎体洁白、细腻，坚致，釉质细润，紧密融于胎骨之上，浑然一体，有“硬亮釉”之赞誉，青花颜色有深浅层次变化，表现出较强的立体感。这种凤尾尊在清康熙早、中期大量生产，基本是民窑产品。

6. 清康熙五彩龙凤纹碗（二级文物）

碗高 6.5 厘米、口径 14.7 厘米、足径 6 厘米，口微侈，深腹，平底，圈足。胎质细腻坚密，白釉莹润光洁。碗内壁口沿饰二道弦纹，碗心绘红彩团龙，团龙周边衬绿彩山字形火焰纹。火焰线条灵动，好似微风吹拂。碗外壁口沿饰八宝纹带，其下为五彩龙凤、花卉纹，圈足外壁饰二道弦纹。底施釉，中部青花书写“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书款。碗造型典雅大方，纹

饰较为繁缛，绘制精良，釉色鲜艳明快（图六）。

五彩瓷比较著名的有嘉靖五彩、万历五彩、康熙五彩，经明代发展到清康熙年间达到高峰。康熙五彩因劲利而结实，因此被称为“硬彩”。康熙时期的五彩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多种颜色的搭配和运用。由于有了深色调的蓝和黑，使得康熙五彩的色彩对比更加和谐、沉稳。

此类五彩龙凤纹碗始烧于康熙朝，属宫廷日用瓷。作为官窑瓷器的一种固定品种，一直延续至清末。

7. 清雍正天蓝釉尊（二级文物）

尊高 36 厘米、口径 22.6 厘米、足径 16.7 厘米，侈口，圆唇，长颈，扁鼓腹，高圈足外撇。颈与足各有凸棱装饰。胎质坚密洁白，器型修长典雅不显笨重。器内施白釉，外壁施以淡雅柔和的天蓝色釉，釉色富丽娇艳，犹如雨过天晴后清澈的蓝天。器型以柔美的圆弧线为主，转折棱角处制作得非常柔和，具有雍容、典雅之风貌（图七）。

天蓝釉是一种高温色釉。由“天青”演变而来，釉色浅而发蓝，似天蓝色，清康熙时创烧，雍正时天蓝釉瓷器的烧造在康熙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深浅不一的两种釉色，深若雨后晴空，淡趋月白，给人以清新淡雅、赏心悦目之感。

8. 清乾隆影青暗画缠枝莲纹高足碗（二级文物）

碗高 9.5 厘米、口径 14.3 厘米、足径 4.2 厘米，敞口，深腹，弧壁，平底，底下承以高足，足下外撇。碗心书楷书款“大清乾隆年制”。碗口沿暗画二周弦纹，碗内外通体画缠枝莲纹。胎质坚细轻薄，纹饰线条刻画流畅自然，釉似白而隐约可见青色，晶莹透明（图八）。

此高足碗为仿明永乐影青制品，而永乐影青又仿自宋影青，代代相承。若明若暗的刻画纹，给人以无穷韵味，然又不失古拙之趣。为乾隆官窑的著名品种，国内外多种重要的瓷器图录均有选录。

二、其他类别的珍贵文物计 209 件，其中一级文物 1 件，其余均为二三级文物，以清代宫廷文物藏品为主。

1. 清光绪明黄缙丝五彩云蝠寿金龙袍（一级文物）（见标题页）

身长 125 厘米、袖长 56 厘米、中宽 70 厘米、下宽 108 厘米，无领，马蹄袖，四开裾式长袍。彩绣缙丝，刺绣金龙九条，前胸、后背分别为一条正金龙，肩部、袍下面前后分别有行龙共计九条龙纹。从正面或背面看时，均可见五条金龙，恰与九五之尊数相吻合。袍面间绣五彩祥云、蝙蝠、福、寿、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传统纹饰。下摆处饰斜向排列红、黄、蓝等色弯曲的线条，名谓水脚。水脚之上饰波涛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崖。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含意之外，还隐喻着“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此金龙袍为清光绪皇帝御用之袍（图九）。

清代皇帝的服饰分为礼服和常服两大类。朝服是主要礼服之一，并保留了具有满族风格的披肩和马蹄袖等传统形制。抚顺馆藏的这件即为常服，衣领间可见磨损痕迹。从此件龙袍可推测光绪皇帝的身高和胖瘦，亦可探索清代制丝和刺绣的工艺水平。

2. 清象牙“寿同日月”纹如意（二级文物）

如意长 40.9 厘米，由象牙、玛瑙、白玉刻琢而成。如意首以玛瑙雕成卷云状，内刻“寿同日月”四字，柄为浸绿色象牙雕制，呈弧形，中心嵌半圆形红珊瑚，意为太阳，与柄首“寿同日月”相映，柄身浅浮雕苍松、山石、祥云，尾嵌雕饰人物、松石纹的白玉。做工华贵，刀法流畅，堪称绝品（图十）。

3. 唐瑞兽葡萄纹铜镜（二级文物）

直径 13.2 厘米、缘厚 1.4 厘米，圆形，伏兽钮。凸弦纹圈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浅浮雕憨态可掬的四瑞兽同向攀援葡

萄枝蔓，外区葡萄蔓枝间硕大的葡萄串和禽鸟等相间环绕，枝蔓曲卷，叶实垂吊。叠云纹缘。铜镜图纹繁缛，装饰华美，细



图十 清象牙“寿同日月”纹如意

部变化较多，视觉效果强烈，把中国传统的瑞兽纹和传入中国的葡萄纹结合起来，形成了风格独特的瑞兽葡萄纹样，以浮雕艺术形象表现了“大唐盛世”的灿烂辉煌（图十一）。

调拨给抚顺市博物馆的310件文物，对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80万件藏品来讲也许只是沧海一粟，而对于抚顺市博物馆却是意义重大。不仅增加了抚顺市博物馆的藏品数量，更提高了藏品的质量，也为文博专业人员打开了研究宫廷文物之门，包括对永、宣时期瓷器“苏麻离青”铁黑色结晶斑的认识，对永乐“甜白”的“甜腻”感觉的认识，以及亲眼看到康熙时期瓷器的豪放大气、雍正时期瓷器的隽秀典雅、乾隆时期瓷器的精致繁缛的风格特征等，



图十一 唐瑞兽葡萄纹铜镜

使研究人员在瓷器研究领域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提高。

抚顺在中国清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位于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赫图阿拉城“黄衣称朕”，建立后金政权，赫图阿拉城成为后金政权的第一都城，是清王朝的肇兴之地。

满族是一个神奇的民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的迅速崛起过程一直以来备受世人关注。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满族完成了从统一各部到入主华夏称帝，迅速完成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层面都有了飞跃发展。正因为抚顺有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所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使抚顺的文化积淀增加厚重之感，将清宫旧藏的珍贵文物，无私地调拨给清王朝发祥地的抚顺，以资抚顺展开更加广阔的清前期历史的研究。

310件珍宝文物回归清朝祖先的故里，对于抚顺是一件文化盛事。感谢北京故宫博物院，将光绪皇帝穿用过的明黄缙丝五彩云蝠寿金龙袍等大批珍贵馆藏文物慷慨调拨给抚顺市博物馆。值此北京故宫博物院向抚顺市博物馆无私调拨馆藏文物30周年之际，仅作此文，以表达我们对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崇高敬意。

附注：

曾经与杨伯达院长接触最多的原抚顺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秀嫣现已去世。关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无偿调拨抚顺市博物馆的经过，是原抚顺市博物馆馆长肖景全、原保管部主任赵秀芝提供的（两位均已退休）。

（作者为抚顺市博物馆馆员）

北京城的本根——古蓟城

陈 平

俗话说：“木有本，树有根”。今天的北京城也有本有根，她的本根就是古蓟城。如今，一般的北京人对于古蓟城，可能已经比较陌生、茫然了。但是我们只要粗略做一遍“倒推北京城”的脑保健操，对之就可大致了然。笔者给这个操编了段口诀，其辞曰：“今日北京城，民国叫北平；清、明称北京，元号大都城；金代叫中都，辽称南京城；五代唤幽州，唐前称蓟城。”

一、北京与“蓟”之名是怎样脱钩的

这里说的“唐前称蓟城”，是长话短说，实际上暗含了北京古城名称上一次极为重要而复杂的变故。史称唐以前的古北京，一直是幽州大都督府的治所，称幽州，也称蓟城，城内一向分为幽都与蓟二县。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朝廷从幽州大都督府“割渔阳、玉田、三河，置蓟州”，以渔阳为蓟州治所。这是“蓟”之名从北京外移的开始。至明代，又将其州治渔阳县省改，迺称蓟州，属顺天府；入民国，改称蓟县，今为天津蓟县。然而，在唐分置蓟州后的幽州蓟城内，仍分为幽都与蓟二县，直至唐亡。据《辽史·

地理志》记载，后晋幽州城内仍有蓟县，后改为蓟北县。辽并幽州，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州城内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至此“蓟”名外移过程终结，古北京方与“蓟”之名完全脱钩。屈指算来，至今已足“往事越千年”矣！难怪现在不少北京人对“蓟”已经生疏淡忘了。

二、古蓟城是什么年代始建的

作为北京城源头的古蓟城，侯仁之先生曾著文将其始建年代推定为武王伐纣之年。^①关于古蓟城，文献典籍从当代依次上溯到战国，可谓史不绝书、历历在案；地下出土的陶文等古文字资料，绝对年代也可以早到战国。^②我们判定：历史文献所反映的古蓟城始建的时代，至迟也不会晚于商代末年。这些文献典籍成书的年代，晚则两汉，早则战国；所记则多集中在商末周初周武王大封诸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相关记载主要有以下五则：

1. 《汉书·地理志》曰：“蓟，故燕国，召公所封”。此则记载，成书年代，东汉初年；所记事件年代，商末周初。
2. 《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克

殷),乃罢兵西归……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此则记载,成书年代,西汉武帝时期;所记事件年代,商末周初。

3.《韩诗外传·三》云:“《诗》曰:‘(武王)既反商,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舜之后于陈’。”此则记载,成书年代,战国晚期;所记事件年代,商末周初。

4.《礼记·乐记》云:“子曰:‘且女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此则记载,成书与所记事件年代,均同上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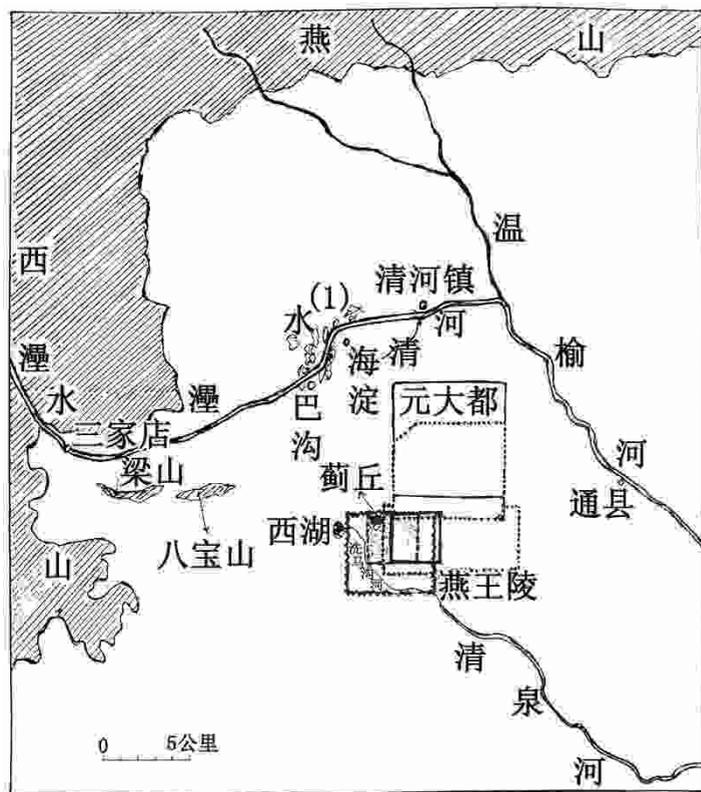
5.《吕氏春秋·慎大》曰:“(武王)胜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此则记载,成书与所记事件年代,也均同上则。唯黄帝后所封“铸”即“祝”,帝尧后所封“黎”即“蓟”,皆因音近而通借。

以上五则文献,可以说已相当完备地反映了与蓟城始建年代相关的历史记载的全貌。所述内容,都指向周武王封侯于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间点则都定格在刚刚“克殷反商”的关键历史时刻,即殷商王朝刚刚灭亡和姬周王朝建立最初的日子。尽管所册封的诸侯,有黄帝之后、帝尧之后和召公的不同,但所封城邑都是蓟,时间也都在刚刚灭商兴周之日,则是确凿无疑的。周朝甫立就能把诸侯册封到蓟城去,说明至少在周朝建立前的商代末年,“蓟”作为城邑就已经先期存在了。这,就是我们认定蓟城始建年代至迟不会晚于商代末年的唯一根据与理由。但最早又能到什么时间?目前以至永远,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关于召公奭所封之北燕,前些年笔者曾在一篇小文中据北京地区多出商末周初鬲侯铜器,推测那里原是箕子之箕国。^⑤在另一本小书中,笔者也曾推测商末的蓟城本是箕国之国都。^⑥但这两种说法仅是推测,并非定论,还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性意见看待。

三、蓟城始建与北京建城有什么关系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曾于1987年5月4日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尽早考虑北京建城始于何年?^⑦随后,北京市有关部门便组织召开了研究北京建城之始的学术会议。作为会议的总结之作,侯仁之先生不久发表《论北京建城之始》一文。^⑧文中建议:将赵光贤等专家推定的周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045年,^⑨作为北京建城之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周武王把黄帝之后和召公分别封到了今北京市辖境以内的蓟、燕二城国。侯先生还指出:“在此以前,这两处地方随着南北交通的发展,其原始聚落也应该已经开始具有城市的功能,但是无法断定其开始的年代。有年代确实可考的,就是从武王伐纣建立封国时开始。”“因此也就可以认为是建城的开始。”就这样,由侯仁之先生最终一锤定音,武王伐纣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的公元前1045年,便成了北京建城之年。于是,1995年,北京市就有了庆祝北京建城3040年的一系列大型活动。

任何一个具有久远历史的重要都市,都应当考虑并确定她的始建之年。作为拥有三千年以上建城历史的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就更当如此。应当肯定:上述侯仁之先生关于北京建城之年的建议,仍是现有条件下的不二之选。但问题和遗憾也是存在的。比如,正像侯先生文中已经提到的,武王伐纣之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蓟城始建之年。蓟城在斯年之前即已存在,“但是无法断定其开始的年代”。将“武王伐纣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之年确定为北京建城之年,既有能借重重大历史事件的喜悦,也隐含着一丝的无奈。此外,赵光贤等先生所推定的公元前1045武王伐纣之年,似并非定论;以李学勤先生为首席科学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把斯年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⑩其它不同说法还有二十余种。^⑪而武王封召公于燕的伐纣之年,



图一 未改道前的第一条最古老的永定河

也未必就是燕都始建之年，燕都的始建更可能要略晚到成王初年。^⑩总之，在武王伐纣封蓟、燕之君及蓟城始建之年上，先天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要求其先有确定之年而后再定蓟城和北京建城之年，就多少有点难为其人了。

四、古蓟城是怎样孕育生成的

作为北京升华为皇都本根的古蓟城，又是怎样孕育生成的呢？孕育生成古蓟城

的系列重大自然与人文因素，概括起来就是“一河、一丘与二道”。

(一) “一河”，北京与古蓟城的母亲河——永定河

“一河”，就是永定河。

西汉以前称治水，东汉与北朝称灋（灋）水，西晋以来别称清泉河，隋唐称桑干河，又名无定河，清代改称永定河而至今。水是生命之源、城市之源，河流往往是内陆城市的母亲。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伦都城，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都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都城，而古永定河则孕育了古蓟城。故永定河被朱祖希、尹钧科等先生尊奉为北京的母亲河。^⑪当然，她也是古蓟城的母亲河。

据侯仁之先生早年的研究，在距今一万八千年地球上最近一个冰期结束以前，古永定河是从今三家店出西山，折而向东北流，

继今巴沟村、万泉庄、海淀镇西丹菱泮、圆明园，再向东汇清河、温榆河，转向东南，最终由天津入海的（图一）。^⑫至于此后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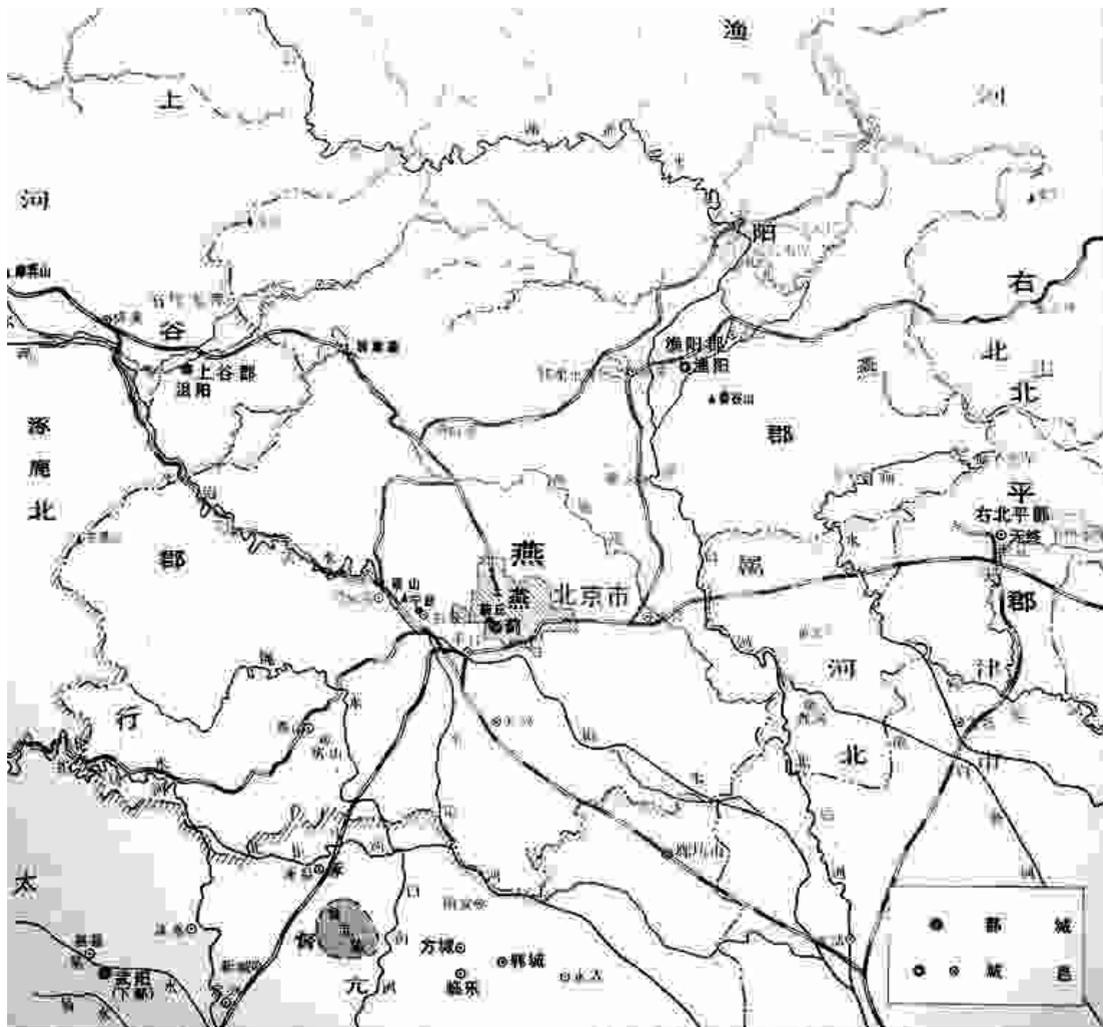


图二 侯仁之先生对蓟城与附近水道相对位置示意图
(采自《文物》1959年9期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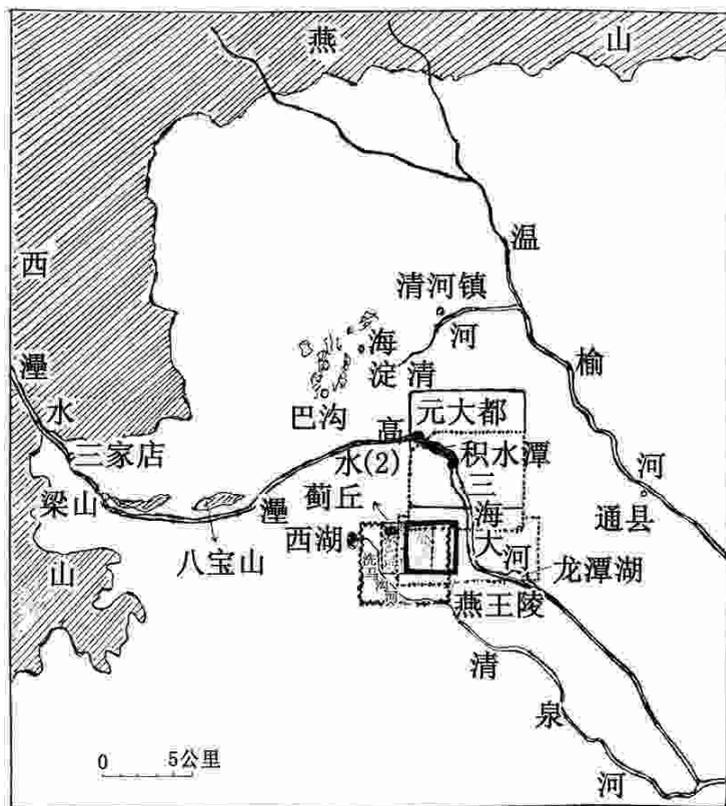
一万八千年前到隋唐时期古永定河的流向，从北魏酈道元到当代的侯仁之，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它应当近似或等同于从西晋到唐代，自古蓟城以南流向天津的灋水、清泉河或桑干河。这一点，从酈道元《水经·灋水注》指认《水经·灋水》“过广阳蓟县北”为“盖经证误矣”，从侯仁之先生1959年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图二），^③从1988年出版的由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从原始社会到唐代的多幅地图^④（图三）便可明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关地质专家的一项重大发现，彻底颠覆了上述传统认

识。专家们通过对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的河湖沟坑的勘查分析，发现了一条此前从未被人们认知的全新的古永定河河床遗迹。这条古永定河从今石景山以南出西山，东经今衙门口、八宝山，再沿其北谷向东北流至田村，经今紫竹院、西直门北、什刹三海，再向东南至龙潭湖，经马驹桥，最终由天津入海。由于她从今什刹三海等水域通过，故而专家们将她命名为“三海大河”。并综合各种指标，将其年代上限大致判定在距今最近的那次冰期结束以后，下限则推定在东汉末叶以前（图四）。^⑤在时空关系上，她正好上接侯仁之先生20世



图三 《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的《战国》北京图



图四 第一次改道与第二条永定河

纪 50 年代所发现的距今一万八千年以前的那条最古老的永定河，下连西晋至隋唐那条改从蓟城以南流向天津入海的古灋水、清泉河或桑干河，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关键位置。这一点，恰好可以从东汉桑钦所著《水经》“灋水过广阳蓟县北”的“经证”得到有力印证。这一重大发现一经面世，立刻在北京史学界引起了轰动，并迅速成为了共识与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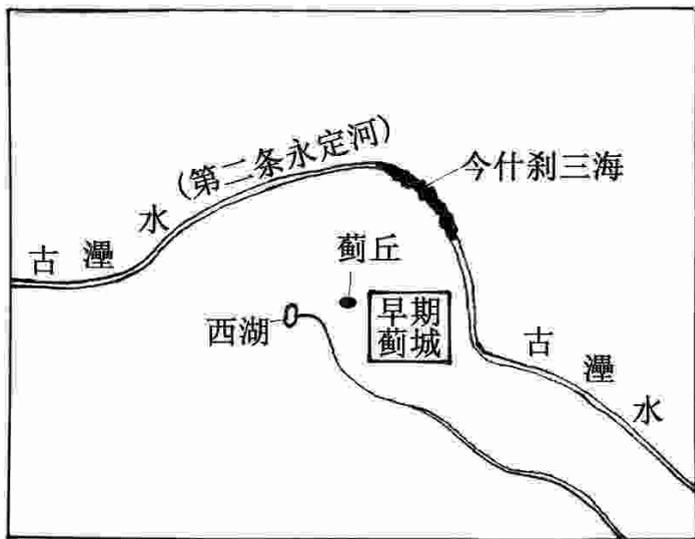
“三海大河”所处的年代，从一万八千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东汉末叶，大致涵盖了古蓟城从商末最初的萌芽孕育期到东汉末成长壮大期这整个生命周期的前半段。古蓟城的孕育生成，与作为永定河第二前身的“三海大河”有着难以割舍的密切关系。近年我在一篇小文中论及“三海大河”与古蓟城孕生关系时曾指出：“在从石景山南到龙潭湖的这一河段，古‘三海大河’以今什刹海为转折点，拐了一个

近似于直角的大弯。在这个大弯以里，不仅北、东两面是古‘三海大河’为（即将诞生的）蓟城围成的天然屏障，而且‘三海大河’（古永定河）以其充沛的水源，为河湾地区内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潜流，为古蓟城准备了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玉渊潭、莲花池这样的清泉湖池。正是这河湾里的一方肥田沃土，为作为北京城前身与根源的古蓟城预留了绝好的生存发展空间。”^⑥经过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中晚期数千年古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古蓟城终于落种于“三海大河”河湾内的沃土之中，借助穿越这里的两条古代交通大通路而聚起的人气，依托河湾里的高地蓟丘旁形成的古聚落，最终于商代晚期升格演进成了古蓟城（图五）。

（二）“一丘”，北京与古蓟城最初的起点——蓟丘

1. 蓟丘——北京与古蓟城最初的起点

如果说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古蓟城是北京城的本根的话；蓟丘就是古蓟城的起点，也是整个北京城的起点。上古北京地处黄河下游平原，这里是九河下梢、水涝祸患集聚之地。故先民们多择高丘聚居，以避水患，一如今世湖北荆州分洪区内所建之“高台庄”。因此，上古聚落和由之而来的城邑率多以“丘”为名，如河南有封丘、商丘，山东有安丘、章丘、营丘，河北有任丘、邢丘。北京最早的城邑蓟城则依托并起源于蓟丘，一座上面长满一种名叫“蓟”的野草的黄土高丘，并因此而得名。最早记录蓟城与蓟丘这一生成因果关系的经典文献，便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他在《水经·灋水注》中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



图五 第二条永定河与早期蓟城位置图

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也。”

2. “蓟门烟树”不是蓟丘

真正蓟丘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是太清楚，于是经常有将“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误认为蓟丘者。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对蓟丘的认定。该书称：“蓟丘，在河北宛平县北。今亦名土城关。《长安客话》‘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旧多林木，蓊翳苍翠，风景如画。燕京八景有蓟门烟树，即此。”^⑩清代乾隆帝书写的“蓟门烟树”景点题名碑，就立于德胜门外蓟门桥北的元大都土城之上，而今仍在。《大辞典》初版于1931年，虽已成书距今80余年，但去年（2011年）我在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做有关蓟丘的讲座时，仍有某些听众相信这种“蓟门烟树”即蓟丘的说法，并以此质疑于笔者所讲的蓟丘。当代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已充分证实：“蓟门烟树”绝不是蓟丘。作为1931年民国时期成书的《大辞典》著者，和当代普通听众有上述认识，尽管均情有可原，但作为从事北京历史、考古研究的专业人员，笔者深感有责任纠正旧说的谬误，帮

助社会公众获得科学的相关认识。

《大辞典》成书于1931年，那时北京叫北平，属河北省管辖，北平市区内又置宛平县，其误认为蓟丘的蓟门烟树景区正在县内北部，故《大辞典》称其“在河北宛平县北”。这与明人笔记《长安客话》说其地在“都城德胜门外”，是一个意思。而且，《大辞典》误将燕京八景中的蓟门烟树当作蓟丘，应当就导源于《长安客话》一类的明人笔记。而《长安客话》之误，则又导源于“燕京八景”。

“燕京八景”，又称“燕山八景”或“北京八景”。据明代北京旧志书记载，相传其源于金明昌遗事的“燕京八景”。元明以来，著咏颇多，但名目不一，所指也代有更移。现在传世的版本，乃定型于明初永乐年间胡广等人题咏的“北京八景”^⑪，于中便有“蓟门烟树”。此景在《元一统志》又称“蓟门飞雨”，其始见年代应不晚于元，是否能及金则难以考定。其地实为元大都土城遗址中靠近西北门——肃清门的一段遗迹。盖自金、元及明，士人皆知北京城有一段前身为蓟城，但部分人对蓟城原本在何处已很茫然；部分人虽心知肚明，但对“蓟”这一古称使用起来又是无处不可，非常随便。于是，茫然者与虽心知却随便者，便将本不是蓟城的元大都土城肃清门附近遗迹皆指称作了“蓟门”；接着又自“蓟门”之“蓟”进而望文生义，再误认其为“蓟丘”。于是，就有了民国时期《大辞典》那样的误指。按酈道元《水经注》的指引，真正的“蓟丘”应在北魏以来的古蓟“城内西北隅”。元大都不是北魏以来的古蓟城，古蓟城在元大都以外另有其处。所以，元大都肃清门附近的“土城关”绝非“蓟门”，当然更不会是什么“蓟丘”。

3. 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才是蓟丘

关于自辽至北魏及其以前的古蓟城究在何处？其“城内西北隅”的古蓟丘又在何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许多人心目中都很茫然。近现代由于历史地理学的昌明，到20世纪50年代，答案才逐渐明朗起来。其标志，便是1959年侯仁之先生《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发表。^⑩此文指出：“细读《水经注》并参考有关文献纪录，可以肯定酈道元所记的蓟城，约当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根据这一线索，可以推想：现在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解放之初，在高丘周围的土壤里，曾拣起一些战国时代的陶片，可以说明这一高丘的历史是很久的。”侯先生此文言及蓟城所在的“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即明嘉靖年间兴建于原北京城（内城）以南新城的西北部，也就是在合并前的原宣武区大部 and 原西城区最南部。

在1963年发表的《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一文中，其执笔者苏天钧先生也说道：“白云观以西，以前为一个很大的土丘，土丘已被破坏，附近地面上散布很多战国的陶片，因此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古代的蓟丘。白云观迤西的高地一向被人认为是蓟丘，蓟丘东南之地则被人认为是蓟城。”^⑪此文还披露了1956年永定河引水工程中在白云观遗址战国秦汉古瓦井群的发现。笔者近年论定的足以证实战国古蓟城位置所在的古陶文“蓟”，就出土于该遗址某瓦井中一只战国陶罐的肩部。^⑫

4. 对白云观以西古蓟丘的“否定”

正当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是古蓟丘的推断在学术界日益深入人心、渐成定见的重要时刻，1974年一次非同小可的考古发掘，却几乎颠覆了这一见解，并招来了学术界一股颇为强劲对它的否定之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74年春天，为配合建设工程，北京市的考古专家赵其昌先生率队，对已被侯仁之等权威专家认定为古蓟丘的白云观以西高丘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的结果：是在这座土丘的上部，

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西北拐角残迹；在这段古城墙的下面，又发现了三座砖室小墓。依据小墓中出土的铜镜等遗物的形制、纹饰，它们的年代被定为东汉。小墓上的古城墙，依据考古学的层位学“上晚下早”的原理，年代首先要晚于其下墓葬的年代东汉。再依据八宝山发掘的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出土墓志中“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之铭文^⑬和城砖的形制，将这段残城墙断为了西晋时期的蓟城的西北拐角城垣遗迹。这么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迄今未见有正式的报告发表；只是赵其昌先生在1986年刊载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有语焉不详的披露。^⑭

由于传闻的恍惚，加之赵先生论文的语焉不详，许多关键的考古现象，如“蓟丘”的土质生熟如何，它与残城墙、砖室墓二者有无打破关系等？均缺乏必要的交代。这就给正确解读这次考古发掘凭添了不小的障碍，也给误读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在听到相关传闻和读罢赵其昌先生论文之后，北京历史、考古学界有不少同仁便得出了这样一种推论：既然在土丘下面先发现了一段西晋蓟城城墙，又在这段城墙下发现了三座东汉砖室小墓，那么这座土丘的年代既要晚于它下面第二层的三座砖室小墓的年代东汉，也要晚于它下面第一层残城墙的年代西晋，所以它不可能是从商末就依之建立蓟城的“古蓟丘”，“古蓟丘”还是要到别处去另找。总之，白云观以西高丘是“古蓟丘”的看法应当否定，至少是“值得商榷”。笔者在1995年琉璃河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中，就曾持有过这样的看法。2010年，在西城文史学会于西城区图书馆召开的年会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处的考古专家陈光同志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其他有类似看法的专家学者一定还有不少。

5. 对白云观以西“蓟丘”的“否定之否定”

辨正唯物主义有所谓“三大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否定之否定”。今天，

我也应用一下这个规律，对否定白云观以西高丘是蓊丘的意见来个“否定之否定”。作为我个人，认识上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思索的过程。1997年，因要写作《燕亳与蓊城的再探讨》一文^④，促使我再次比较认真地思考与蓊丘相关的一些问题，再次反复拜读了赵其昌先生《蓊城的探索》一文。这次，我终于发现了蓊丘“否定”说的一大疑点：即赵先生《探索》文中并未交代他所发掘古城墙、砖室墓四周“蓊丘”地层的生熟状态。而这一点，对判断所谓“蓊丘”与古城墙、砖室墓两者之间的地层关系、年代先后，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弄清这一点，就无法对“蓊丘”置可否之辞。前些年，我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马保春先生之邀，为他的学生们作有关蓊城与蓊丘的历史文化讲座。^⑤新的任务促使我对“蓊丘”问题再作新的思考，对赵先生《探索》遗文再作新的研读。通过再次的研读与反思，我终于又发现了一个被“否定”说论者所长期忽略的关键问题，也是“否定”说的第二个疑点：即赵先生《探索》文实际上已交代了古城墙、砖室墓在“蓊丘”上的具体位置——“丘地的西北部边缘”^⑥，而它可以直接影响并改变我们对“蓊丘”真伪的判定。如此重要的证据，过去确实被长期忽略了。于是在这篇讲稿中，我对“蓊丘否定说”便作出了“否定之否定”的新结论。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五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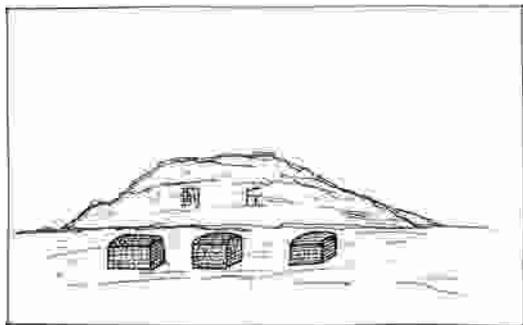
(1) “否定蓊丘说”实际有一个必需的“大前提”，即蓊丘是、而且只能是由三座东汉砖室小墓正上方封土堆积而成的小土丘（图六）。然而，实际所显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2) 从蓊丘得名的原因看，它绝非三座东汉砖室小墓上人为堆积的封土，而是因其上长满野生蓊草而得名的天然土丘。由古及今，北京平原一带都是野生蓊草的繁衍之地，这里出现一个以蓊为名的土丘毫不足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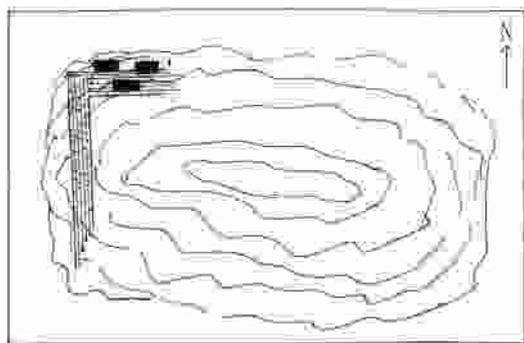
(3) 苏天钧先生在《北京西郊白云观

遗址》一文中曾特别强调：“（蓊丘）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土丘”^⑦。既然“是一个很大的土丘”，它就不可能是三座聚在一处的东汉砖室小墓正上方的封土堆那样的“小土丘”。当年赵其昌先生蓊丘发掘的目击者之一，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主任朱志刚同志也证实：发掘前的“蓊丘”，东西残存长度仍有60余米，南北宽度也有40余米。况且，这还是已遭历代浸蚀、取土破坏的劫后余生，它早先的体量应当比这还要大很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土丘”。如此“大”的一个土丘，怎么可能是聚在一处的三座东汉砖室小墓上的一小堆封土呢！

(4)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年发掘的主持人赵其昌先生，对他所发掘的为“蓊丘”深信不疑。在《探索》一文中，赵先生在介绍完发掘成果后总结道：“文献与发掘现场相互印证，可以认为，这一带高地土丘即‘蓊丘’。”赵先生作为发掘主持者，对发掘的详情应当最为熟悉。《探索》文中讲到的与未讲到的考古现象，可以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为什么没有像一些“否定论者”那样，把“蓊丘”一句话就封杀了事呢？甚至连半点怀疑的口吻都不见流露呢？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反躬自问的。在赵先生心中，必有过硬的“否定”那些“否定论者”的理由，只是他没有说，或不屑得说罢了。而这，正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们要穷追不舍、“上下求索”的。



图六 否定蓊丘者想象中的蓊丘



图七 赵其昌先生文中所描述的蓟丘平面图

(5) “蓟丘”如是三座聚在一处的东汉砖室小墓上的封土，土丘的中心与主体的位置就应当恰在墓室的正上方。然而赵先生《探索》文却称：发现的西晋时期残城墙与墙下三座东汉小型砖室墓，只处于“土丘（即蓟丘）的西北边缘”^⑧。据此，笔者特绘相关示意平、剖面图各一幅（图七、图八）。图中左下角①所示，为三座东汉砖室小墓及西晋残城墙正上方的封土。蓟丘上只有它，才是晚于东汉墓与西晋城墙的堆积，其土质也显然应为经人为扰动的“熟土”。图中②所示，则为除①及其下城墙、古墓以外的丘体，它们应当都是未经人为扰动的自然的“生土”地层。其生成年代为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年以前的“洪荒时代”，它与西晋残城墙、东汉砖墓之间，不是逐层叠压、“蓟丘”最居其上的关系，而是东汉砖墓先在丘的“西北边缘”挖坑的“打破”关系。墓上建城，则是更后的西晋时期所为。因此，“古蓟丘”作为“古蓟城”起点的历史地位，不应因这次发掘而受到怀疑和动摇。“古蓟丘”按郦道元《水经注》的说法应在北魏时“（蓟）城内西北隅”，而这次的发掘地正在白云观以西的西晋至北魏以来的蓟城内西北隅，其地又恰有一座高丘，舍此以外别无“蓟丘”可求。此丘为蓟城之起点的“蓟丘”，应当了无疑义；“否定论”之遭遇“否定”，也应当是历史的必然。

(6) “蓟丘”到底在哪里？

赵先生《探索》文还有关键一点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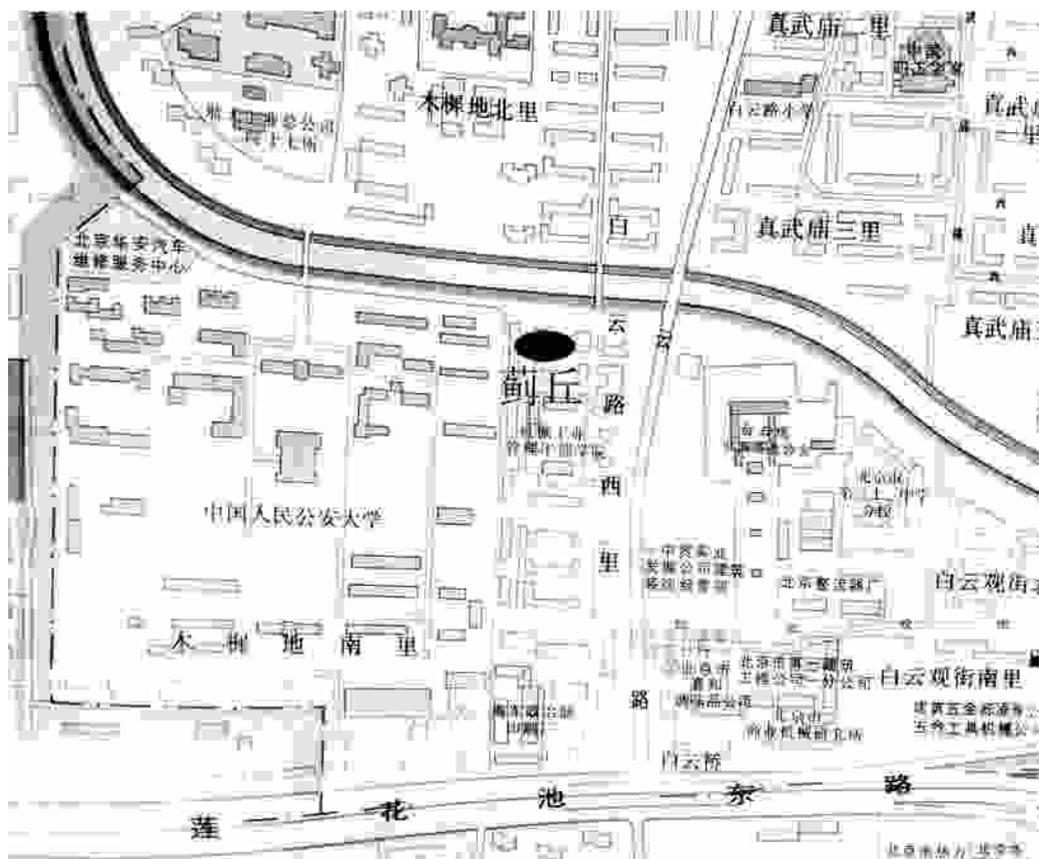
图八 赵其昌先生所说蓟丘纵剖面图

交代，即他所发掘的“蓟丘”到底在哪里？就此，笔者专门咨询过当年曾目睹这次发掘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主任朱志刚同志。据朱志刚回忆，赵先生当年发掘的“蓟丘”，位于机械工业部某机构的大院中。依据这条重要线索，大致可以判定：“蓟丘”的具体位置，应当就在今白云西里北部的机械工业干部管理学院的大院中（图九）。这里在合区以前，属原西城区管辖。作为北京与蓟城起点的“蓟丘”，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理当永久保留，昭示后人。可惜当时历史文化保护的意识从上到下普遍比较薄弱，因此它已在1974年被夷为了平地（图十）。

(三) “两道”，两条交叉贯穿蓟丘的南北大通道

古今中外都市发展的历史业已证明：都市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两大要素。其一是为都市人口提供生命之水的河流，其二则是为都市提供进出人流的陆上交通大道。古蓟城得以生成，也凭借于此。如果说永定河是蓟城之母，两条交叉贯穿蓟丘的南北大通道则为蓟城之父。蓟城正是在这二者的交互作用下孕育而生的。

两条南北大通道，第一条从今河南东北的安阳（商代殷墟）出发，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经今河北的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涿县，再经今北京房山琉璃河，到达今北京城区西南隅的古蓟丘。这条南北交通大道，是首先由侯仁之先生在1959年



图九 古蓟丘今日所在具体位置图

发表的著名论文《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揭示出来的。^③但此大道到达蓟丘并未终止，而是贯穿蓟丘而出，向东北至燕山南麓，出古卢龙塞，至营州（辽西

建平）（图十一）。从辽西喀左 20 世纪 50 年代出土的大批商末周初青铜器窖藏等考古发现分析，这条大通道自蓟丘向东北延伸出来的后半截，是确实存在的。



图十 1974 年推土机铲平古蓟丘图

第二条从今山东西南的曲阜出发，向西北行，经今泰安、济南、德州，再经河北的任丘、霸州，到达古蓟丘。然后也穿蓟丘而出，继续溯永定河向西北而上，到达河北西北的怀来、涿鹿（图十一）。这第二条南北大通道，是由笔者于 2009 年在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所作专题讲座中新提出来的。^④从源出于山东曲阜的蚩尤氏曾与黄帝、炎帝会战于古涿鹿看，从六千年前的安阳后岗一期文化能远播到今冀西北的怀来、涿鹿盆地看，这条大通道也是确实存在的。而古蓟城，正是在这两条交叉贯穿蓟丘的南北大



图十一 上古两条交叉贯穿穿丘的南北大通道

通道所带来的滚滚人流的培植灌输下，由一个原始聚落——“蓟丘”，扩充升格而成的。

①⑥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②②②陈平：《释“釗”——从陶文“釗”论定燕上都蓟城的位置》，《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

③⑩陈平：《再论克壘、克盃铭文及其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④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19页。

⑤侯仁之：《关于京东考古和北京建城的年代问题——致北京市领导的一封信》，《北京史研究通讯》1987年9月8日第2期。

⑦赵光贤：《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

⑧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1月版。

⑨王采枚：《论周初封燕及其相关问题》，《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⑩朱祖希：《永定河的变迁》，《北京水利志通讯》1984年第2期；朱祖希：《北京的母亲河》，

《北京晚报》1996年4月14—18日《百家言》连载；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⑫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地形、水道与聚落》，《地理学报》1951年第6期。

⑬⑰⑲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9期。

⑭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⑮孙秀萍等：《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

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史苑》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⑯陈平：《“三海”涵碧润京城，一湾绿水惹事端——浅议“三海”在北京城和什刹海诸文化孕育与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北京的文化名片——什刹海》（上）第1—58页，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中华书局2010年7月版。

⑰臧励龢等编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初版，第1295页。

⑱（明）胡广：《胡文穆集·北京八景图诗序》，另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日下旧闻考》第1册第120页。

⑳㉑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

㉒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㉓㉔㉕赵其昌：《蓟城的探索》，《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

㉖陈平：《燕亳与蓟城的再探讨》，《北京文博》1997年第2期。

㉗㉘陈平：《再谈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一）——关于古永定河与蓟城、蓟丘》，2009年夏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史地专题讲座电子稿。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万寿寺建筑文化遗产研究》

课题构思综述

孔祥利

绪论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明清古建筑群万寿寺，以其宏丽壮观的气势、多种建筑风格并存的特点而闻名于世。万寿寺建筑群不仅在建筑风格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而且渗透在建筑环境、布局中的多种文化现象更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有着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万寿寺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课题是本人近年来的研究项目，是《万寿寺文化遗产研究》课题项目之一。在这里谈一下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课题的方向，以及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大家共飨。

万寿寺建筑文化所蕴涵的文化遗产受到包括建筑风水文化、佛教文化、祈寿文化、园林文化、皇家巡幸文化等诸文化的影响。本文根据课题的章节划分，针对建筑选址、

建筑格局、建筑变迁、建筑理念、建筑艺术几个方面中的文化遗产进行逐项分析。

一、研究定位与方法

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研究方式的定位。万寿寺古建筑群是不可移动的文物，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所在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北京艺术博物馆对外展陈的藏品之一，对万寿寺古建筑群的研究可以参照对博物馆藏品进行研究的方式。

对这件藏品的研究可以涉及其产生的源流、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对其所具有的资料性信息进行考察记录，以保留历史的原貌，还原其历史风貌。

对藏品的深入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藏品本身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藏品本身所富有的文化内涵和文物艺术价值。这些研究

需要多视角、多方面的考察和探讨。因此，定位以藏品研究方式，是为了将万寿寺古建筑群的全部信息研究到位、无所遗漏。

其次，我们划定一下研究的范畴，确定哪些方面属于文化遗产。万寿寺古建筑群本身具有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其背后也含有无形的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课题的开展应涉及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这样我们对万寿寺古建筑群就有了一个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使我们能进一步挖掘万寿寺古建筑群兴建和发展的文化渊源，有助于开发和利用万寿寺的文化资源。凡是涉及万寿寺建筑群兴建和发展的历史文化都要进行研究，凡是涉及影响万寿寺建筑格局的历史文化都要研究，凡是影响万寿寺建筑群艺术风格的文化都要研究。

第三，关于研究的方法。万寿寺建筑群经历了修复和扩建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万寿寺建筑群产生了变化，影响到了建筑的风格和布局。因此，研究万寿寺建筑群也应当针对历史变化所产生的建筑风格变易进行研究，研究其变易的社会心理和艺术追求，研究其变易后的建筑风格布局转换。因此，研究方法采取动态探索原则，始求其源，后探其变。

二、建筑选址之文化遗产研究

古建筑区别于其它文物藏品的研究特征就在于建筑需要坐落于某地点，也就是建筑存在着选址的问题。建筑的选址又与建筑的兴建起因有着密切关系，通常有历史文化、社会文化心理、建筑选址美学的原因，等等。

万寿寺兴建的起因是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的决策，因此，万寿寺的选址也必然与这些历史原因及历史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探讨这些历史原因对万寿寺为何选址长河沿线能够有很好的说明，剖析其中的历史文化因素，有助于对万寿寺建筑兴起历史原因的了解。

在万寿寺的选址活动中，首要因素是历史人文因素，它决定了这个寺院选址的特殊性和典型性，特殊性决定了万寿寺选址在京西郊外，典型性决定万寿寺选址在具有优美环境的河道旁。这两个性质决定了万寿寺选址确定在长河沿线。

对于选址特殊性的研究，就是对历史人文因素的研究，对当时社会心理的研究。历史人物的特殊需求使选址活动趋向一种方向，造成了特殊人物对事件细节的决定性结果，这是一种偶然性结果。如万历母后崇佛的意境，及大太监冯保作为选址决策人的选择，二人的选址意图使寺院选择在长河岸边定址。在明代盛行着对风水的迷信，这个社会人文心理也决定了寺院选择在长河沿线的必然性。揭示这些历史人文因素对万寿寺选址产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影响是课题的任务。

对于选址典型性的研究，就是对风水文化的研究。建筑的选址、建筑的环境、建筑的坐向等方面，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风水文化因素，而且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人事的因素往往会让位于文化的因素。因此，研究工作面临建筑风水文化的深入探究。既要阐述风水文化的一般规律和内涵，揭示风水文化在万寿寺建筑群中的典型特征，也要剖析风水文化对万寿寺建筑群的特殊影响和特例情形。风水文化因素在万寿寺寺院选址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寺前河道环境水质、河道走势形势的要求。

对风水文化所影响的方面，一是与寺前河道有关联的文化信息，二是寺院基址和坐向的确定所依据的建筑理论因素。如寺前河道环境，寺院坐向都是可观察和分析的，将这些能够看到的信息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进行展示和剖析就是课题研究的需要。这方面需要的是运用古人的思维和社会心理来研究当时的文化现象，用传统美学思想、环境学思想阐述万寿寺古建筑群环境和选址的文化。这些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得到很好的阐

发。

寺院选择在长河岸边，其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这种因传统风水文化指导下的环境美学应当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故应当列入文化遗产研究的项目内。

寺院选择坐东北朝西南的方向，这种坐向使河道走向与寺院景观产生的协调正是风水文化所提倡的和谐美，也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故也应当列入文化遗产项目中。

三、建筑格局之文化遗产研究

万寿寺建筑格局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寺院建筑格局出现丰富多彩的局面。其中所蕴含的文化遗产，我根据研究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挖掘：风水文化、佛教文化、园林文化。

古建筑在选址建基的过程中，要经历认真地勘察地形地貌这些堪舆活动，风水文化及其理论技法对建筑的格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穴位理论是风水文化中关于建筑格局的重要指导理论。建筑群体中的阴阳结合部位就是穴位理念的表达方式。剖析这个理论在万寿寺建筑群中的体现是课题的重要任务。穴位理念所要表述的就是藏经阁这个代表寺院功能的建筑位置所在。藏经阁作为寺院功能标志性建筑，它应当在穴位上建造，这也是风水理论所指导的做法。那么，我们经过考察，寺院的藏经阁果然是建在穴位上，也就是明代寺院的居中位置。这个位置安置藏经阁是个特例。而这个特例却符合风水理论的指导。我们这里所研究的恰是风水这个文化遗产所带给寺院格局变化的影响。

其次，面水靠山是风水理论中关于建筑最佳环境的具体指导。这样在考察万寿寺建筑格局中假山的创建就有了理论依据。假山的创建正是风水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阐述好这个文化是课题研究的任务。寺院面水而建，也是风水文化理论的影响。面水靠山，水是通过选择地域所得，而山则是通过人工建造所成，这里迎合了风水理论所描述的环境。风水理论对此建筑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关于寺院建筑格局受到佛教文化影响所涉及的研究项目，其一：明代万寿寺为何为五进院，而清代为何会为七进院，所增加的佛教殿堂配置是何文化因素造成的。这些正是体现佛教文化对寺院建筑格局影响的方面。具体说就是指寺院从三佛同殿到增加的三佛分殿建筑格局变化，这种殿堂配置的变化其文化内涵就是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是佛教文化直接影响了寺院的最终建筑布局。

其二体现在佛教文化方面的影响，就是作为禅宗寺院所具备的各个殿堂配置，这些殿堂构成了寺院建筑的主体。象征佛法僧三宝的三大殿（大延寿殿、藏经阁、禅堂）为寺院的主体建筑，也是象征代表禅宗寺院的主要建筑群。

其三是佛教文化所决定的藏经阁位置及其体量。佛教文化决定了藏经阁是代表



万寿寺中路——渗金多宝塔殿和乾隆御制重修万寿寺碑亭

寺院功能的建筑，所以为了突出其重要性和显示它的地位，安置于寺院正殿之后，恰为寺院的中部位置，其体量仅次于正殿。

其四是假山上殿堂的设置和假山的寓意，也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假山本为风水建筑，三座假山赋予中国三大佛教名山的寓意，是故三大菩萨殿堂在其上设置，是佛教文化对风水建筑的典型影响，也是风水建筑与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关于园林文化影响万寿寺建筑格局的方面，在这个方面的研究项目有前殿后园、行宫园林设计思想等。

作为寺院建筑，主要以佛教殿堂建筑为主体，其肃穆庄重、尊卑有序是其建筑群格局的主要特点。寺院建筑中融入园林建筑风格，首先要做的是不能影响寺院本身的氛围。这样就出现了区域划分的设计理念。在万寿寺中路建筑群中这种区域划分是体现在寺院的前后之划分上面，即前殿后园的设计思想。明代建筑格局如此，清代也是如此。其不同处在于，明代园林建筑纯粹设置在寺后，与寺院为一体；清代则将园林建筑融入寺院后部格局中，居于寺后殿堂之前、寺前殿堂之后。

行宫建筑群融入了园林建筑，这其中的设计思想也是前殿后园，前为行殿建筑、后为园林式建筑。这种前殿后园是功用上的需要，即皇家在行宫处所有办公之地，也有休息之所。休息之所，当然以园林风格建筑为佳，故行殿后设计为园林式风格建筑群，有爬山游廊和书楼建筑等。

四、建筑变迁之文化遗产研究

万寿寺建筑格局经历了从明到清的改变，这种变迁不仅仅是建筑的扩建增改，而且经历了建筑设计思想和理念的变化，



万寿寺西路——从垂花门看倒座房

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遗产。

演变发展的中路布局：从五进到七进的变化——尊佛表达下的累进艺术。

万寿寺中路建筑群经历了从明代的五进院落到清代的七进院落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的产生是历史人为因素，是两代皇室营造万寿寺的不同见证。研究课题重点反映寺院中路变化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

明代万寿寺建五进院落，以山门殿至观音殿共六重殿宇，为五进院落。为什么要选择五进院落呢？这与当时寺院的功能和建寺理念、历史因素等有关。

万寿寺中路在清代演变成为七进院，增加两进院，是清皇室对佛教尊崇的反映，也是清皇室为了与前朝五进院有所区别的标志。从佛教文化上看，相当于增加了一座寺院的主供，因为增加的两进院落为三层主殿，分别供奉着三世佛，与寺院前大延寿殿所供奉的三世佛类同。这也反映了清皇室扩建寺院的用心。增加两进为七进，符合寺院进数为单的要求。而解决三世佛分供的问题，则采取最后一进主殿为阁楼式建筑。同时解决了寺院最后一进院为高大的屏障式建筑的需求。

演变发展的东路布局：建筑格局的迥异变迁——利用观念下的更替建设。

万寿寺东路经历了明清两代完全不同的建筑格局变化，这种变化与它的功用变

化相关，而这种功用的变化反映了皇家对寺院重视的焦点不同。研究课题集中反映皇家是如何利用寺院东路建筑体现他们的意志以及文化精神的。

明代万寿寺皇家重视的焦点是寺院为皇族服务，由此完善各种设施。而寺院东路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出现的。首先是永乐华严钟在万寿寺的悬击，开创了寺院东路建筑群之始。寺院东路遂成为皇家御用的佛事活动相关场所。故其钟楼之后建有药王殿主殿，并设有药房等为皇族服务的功能性建筑。

清乾隆年间对寺院的两次扩建重修，将寺院东路建筑做了完全的改造。这一次的改造是为了体现皇家对僧人的关照，僧人地位提升，并且使东路建筑群更加完整，功能更完备，成为僧人的专门生活活动区域。这种变化反映了清皇室利用万寿寺立足点与明代的不同。

演变发展的西路布局：从假山果园到行殿——巡幸理念下的功能完善。

行宫的出现与皇族的巡幸驻蹕有关。万寿寺在明代即出现皇族驻蹕活动的记载。万寿寺当时的假山及后花园所行使的功能之一就是为皇家驻蹕服务，其所构成的园林景观是供皇族巡幸时休憩的最佳理想场所。这种寺院内的园林式建筑景观，具有很好的实用观赏性，其目的无疑是为皇家巡幸游乐服务。

清代对中路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原来假山后的水池、果园等景观已经被掩埋。西路行殿的兴建是明代万寿寺作为皇家驻蹕地功能延续的表现。因为清皇室更注重行宫建设，较之明代，增置了行政办公功能。所以皇家驻蹕功能进一步体现在实体上面。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完善的行宫建筑群，具备了皇族休息、处理政务、礼佛、用膳等宫廷中所应有的四大功能。行宫的功用不仅从内容而且到形式都得到了最佳的体现。

五、建筑理念之文化遗产研究

建筑理念是建筑在规划当中所引用的观念和思想，它对建筑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理念下才能剖析它的存在。万寿寺作为皇家寺院，它在建筑布局和设计当中，运用了许多建筑理念，受到一些文化的影响，为的是要严格体现寺院的风格、地位、特征、功用、文化等方面。这方面所要研究剖析的项目有：阴阳五行理念、祈寿渲染格调、礼制尊卑规范等。

在万寿寺建筑群的格局中，隐含着易理、易数对建筑布局的影响，特别是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如阴阳对称的格局，五行生克制衡布局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统称为太极理念。所谓太极理念，就是指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生克制衡的理念。这个理念渗透到建筑布局当中，形成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风格。

研究课题的重点在于解析万寿寺建筑群中是如何体现阴阳五行观念的。如寺前寺后之阴阳、寺东寺西之阴阳等各种关系的体现。

作为以祝寿为主要功能的万寿寺，福寿文化融入到寺院建筑之中，它成为建筑功用理念的一种渲染。寺院建筑殿阁名称上均富有福寿的色彩，建筑图案上也充满着福寿吉庆的符号。这种渲染与万寿寺的主要功用相符。以寺名、殿名及图案所表达的祈寿之意使寺院充满着吉利的氛围和色彩。

万寿寺建筑上的各种祈寿文化符号是福寿文化遗产的体现。其首先表现在殿堂功用的名称上面。万寿寺的主殿在建寺之初定名为大延寿殿。这样的定名与万寿寺的寺名相吻合。护国万寿是寺院的名称，所以寺院在功能上要体现寿的祈福性质。寺院的主殿是寺院主要供奉佛祖的地方，是人们到寺院后所要朝拜的地方。因为万寿寺的名称，人们到这里来当然是要向佛祖祈求长寿。因此，正殿起名为“大延寿殿”，正是寺院建立目的的一种表达方式。

万寿寺建筑上有许多寓意福寿的符号，

这些直观的福寿符号令人感觉喜庆，它成为万寿寺建筑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它也象征着万寿寺寺院的功用和向香客们的祝福。建筑图绘与各种寿字图案的寓意表达，将福寿文化与寺院建筑融为一体。

整个建筑群的秩序体现也是建筑理念的重要内容。以尊卑观念为核心的秩序观在建筑群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万寿寺作为皇家建筑要体现出皇家建筑的尊卑，建筑群落中各个建筑之间的尊卑与建筑本身的功用紧密相连。建筑功用上的尊卑用建筑体量和形制进行区分。功用上的尊卑以所表现的文化内涵而定，佛教殿堂当然以所供奉的佛教法物所处的佛教地位尊卑来确定。这是尊卑理念在寺院建筑中的特殊体现。

万寿寺建筑群中的中轴线，中轴与左右配置的尊卑是严格按照礼制决定的。

首先寺院每路都具有中轴线的设计，主体建筑依据中轴线来定位。这样三路建筑就有了三个中轴线。建筑群纵向排列的尊卑体现了寺院各个建筑功用的尊卑地位不同。这里所体现的尊卑是佛界的尊卑，通过建筑体量、建筑屋顶形式的不同表达它们所供奉的偶像地位的不同。研究这些尊卑理念在建筑群中的体现和运用是课题的研究重点。

六、建筑艺术之文化遗产研究

古典建筑艺术是重要的文化遗产，研究万寿寺建筑群艺术是课题的重要内容。

研究的项目首先是古典建筑的组合艺术，有区域建筑体组合，有整体建筑群的组合，探讨研究这些从不同视角构成的建筑艺术特征。

不同的建筑组合构成了不同层面的建筑艺术，形成了多种风格的建筑艺术。在万寿寺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若干个区域，这些区域是以艺术风格来划分的，而不是建筑本身的划定。万寿寺建筑群内可划分为佛殿艺术区、园林艺术区、

行宫艺术区三大艺术风格区域。解析佛殿艺术区的庄严肃穆、园林艺术区的优美恬静、行宫艺术区的幽雅秀丽诸特征构成的元素，将这三大艺术风格区域的特点表述清楚是课题的重点。

古典建筑群的空间艺术也是文化遗产之一。在万寿寺建筑格局所构成的种种视觉空间中，形成了特殊的建筑纵向空间曲线和平面态势，这些曲线和态势形成了一种建筑视觉旋律，是建筑艺术美学的典型表达方式。

首先，在建筑空间格局视觉上，中轴线上的建筑高度变化形成了一种曲线，这个曲线像是一首旋律，其变化起伏有序，形同一种音乐语言，表达一种意境，它与建筑功用形成和谐的视觉构图。旋律的高潮部分对应着寺院的主建筑，其曲线高低变化，象征着尊卑位置的变化，建筑语言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寺院建设的意图。

其次，在建筑空间平面布局视觉上，中轴线建筑与配殿长廊、甬路空间以及院墙设置上采取了曲折变化、交错对应的构思，使建筑景观之间不单调呆板，充满了规律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寺院的景观富有魅力。

从第一进院的院墙产生的神秘感，第二、三进院高大建筑占据院内大部分空间产生的威严庄重，第四进院产生的过渡期，第五、第六进院的视觉开朗转折，到第七进院的院墙设计，院落封闭等等，都表达了平面视觉艺术中的阶段节奏感、转折变化感、深邃魅力感。

最后是建筑个体艺术研究项目。单体建筑所表达的艺术，主要通过建筑屋顶造型、檐饰、彩绘、柱架结构、开间来表现。万寿寺建筑群的最终建筑依据《清官式营造则例》严格实施建筑的各个规格及装饰。其东中西三路根据建筑功用及等级不同采取了不同规格等级的建筑屋顶形式和形制、色调、体量、彩绘、檐饰。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北京坛庙建筑拾零

李卫伟

坛庙建筑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制建筑，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目前留存有非常完备的坛庙体系，从祭祀天地诸神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先蚕坛到祭祀古代帝王先贤的太庙、历代帝王庙、孔庙、关岳庙、文天祥祠、袁崇焕祠，再到分布于广大城市和乡村的家族祠堂，其体系之完备，规模之宏大，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这些坛庙建筑所蕴含的内容极其丰富。笔者仅就几个存在争议或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探讨，由于这些问题零散不成体系且有的甚至未能解决，所以命名为拾零。另外，写作此文也有抛砖引玉之意。

一、北京先农坛太岁殿瓦面颜色问题

北京先农坛内的太岁殿建筑群使用的瓦为黑色琉璃瓦（图一）。为什么此处使

用这种比较少见的琉璃瓦色长久以来一直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象征手法说，即黑色代表了太岁神；一种说法是太岁殿的等级相对较低，所以覆盖黑色琉璃瓦。笔者通过比较法对整个坛庙体系研究后认为，太岁殿的黑色琉璃瓦应该主要使用了象征手法，与等级关系不大。原因如下：

首先，象征手法是已经被普遍认同的、北京坛庙建筑所采用的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而且这种手法主要应用在坛庙祭祀性建筑的色彩上。如天坛内的祈年殿和皇穹宇使用蓝色琉璃瓦以象征天。天坛内就连皇穹宇内的彩画色彩也以青绿为底色；地坛的皇祇室用黄色琉璃瓦，其坛台贴黄色琉璃面砖，坛台周围的墼墙也是用黄色琉璃瓦来代表大地；明代时日坛拜坛表面的红色琉璃砖、月坛拜台表面的白色琉璃砖；社稷坛的五色土和周围的四色墼墙，如此等等，都是象征手法的表现。以上的实例说明坛内用于祭祀性质的建筑在色彩这种



图一 太岁殿

给人以第一直观印象的元素方面，主要使用象征手法。

其次，坛庙中祭祀建筑表现等级主要表现在建筑形式、尺度和隐喻性的建筑数字上。古代坛庙中祭祀天地自然之神的建筑物，多“坛而不屋”（建造露天的台子，不建造殿堂），以象征其天然的属性。而这些台子中天坛使用最高等级的三层坛台，地坛使用两层坛台，而日坛、月坛、先农坛均为一层。坛台的尺度也因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等级越高建筑尺度越大。天坛坛台使用至阳之数九，直至九九。地坛则使用至阴之数八，直至八八。日坛使用七，月坛则使用六。值得提出的是，这种外形的象征法在西方古典建筑中也是使用的。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在其著作《建筑十书》中论述道：“就程式来说，为雷电神朱庇特、卡厄罗、索尔、鲁娜在天空之下建造露天式建筑物是与其相匹配的，因为我们在开阔而明亮的现实天空里看到诸神的色相和法力的缘故。为弥涅瓦、玛耳斯、赫耳库勒斯就应当建造陶立克式神庙，因为对这些神祇来说，由于他们的雄伟的性格建立无所装饰的神庙是适宜的。为维纳斯、费罗刺、普洛塞耳庇涅和泉神建成科林斯式神庙似乎具有适当的性格，因为对这些女神来说，由于他们的婉约性质，用草叶、涡纹精细华丽地装饰起来的建筑物，反而能够得到正确的适合性。为朱诺、狄安娜、利柏洛·帕忒里及其他类似的诸神，如果建造爱奥尼式神庙，就是采用中庸的道理，这是由于陶立克式的严整和科林斯式的优美而能配合两方面的性格的缘故。”^①维特鲁威这种适合的理论与中国坛庙建筑象征手法的理论异曲同工。

从这一系列北京坛庙中与太岁殿建筑群相同或相似类型的建筑，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得出北京祭坛体系中建筑使用象征手法的一条法则，那就是颜色，它更多意义上是象征了某一个祭坛所代表神祇的性质或是属性。另外，要说明的是太岁殿用的是黑琉璃瓦黄剪边屋面，其中的黄色很可

能是等级说的有力证据，笔者也不否认包含有等级的因素，因为日坛拜台的墼墙就是用了绿色琉璃瓦，很可能是要低于地坛墼墙黄色琉璃瓦的考虑。但我们说这是一个物体包含的两个方面，而瓦色所包含的祭坛属性占据主导地位。

二、北京五大坛内为何只有钟楼而没有鼓楼

在中国明清的古代建筑群中，钟楼和鼓楼一般都是配合建造的，早晨的时候敲钟，傍晚击鼓，即所谓“晨钟暮鼓”的原则。如城市中往往都建有钟、鼓二楼，大型的寺院、道观中也都建有钟鼓楼。而在北京现存的明清五大坛中，即天、地、日、月、先农坛，这种钟、鼓二楼配合出现的规律却被打破了，这些坛庙中均仅建造了钟楼，而没有鼓楼。众所周知，“天地君亲”是礼制体系的森严法统，是什么原因使得封建国家礼制体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天地日月先农神的祭坛中打破了这一规律呢？

这些祭坛均占地宽广，限于空间狭窄无隙地或于整个格局不适宜建造首先应当被排除。如果从钟楼用途的角度出发，钟楼有报时、奏乐功能，那么皇帝斋戒和祭祀仪式上显然都需要钟。如果从鼓楼所包含的性质考虑，在古代钟为生发之气，钟代表了权力、地位，故古人用“钟鸣鼎食”形容富贵。而鼓为肃杀之气，故太阳落山、战争冲杀等情况需击鼓。而天神是永生长存的，是否因此建造鼓楼不合适呢？这种想法也只限于推测。而翻开史籍，笔者也并未查阅到佐证，所以本文只能是提出问题了。

三、北京社稷坛坛台

社稷坛是坛庙体系中最重要祭坛之一，象征着国家和君权。历代帝王都视其为关乎江山天下的大事来进行祭祀，其建

筑有着严格的规定。而就是这座神圣的祭坛的拜台却一直有一个疑问未能解答。铺垫有五色土的社稷坛拜台在明清众多官修典籍中均记载为“二成”，也就是二层的意思。如《大明会典》：“太社稷坛……永乐中，建坛如南京，在午门右。同坛同壝。坛二成，上成方五丈，次成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随方筑之”。^②



图二 社稷坛拜台及五色土

清代从康熙朝到光绪五朝的会典也都记载为两成，如距今最近的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社稷坛在阙右，制方，北向，二成，高四尺，第一成方五丈，第二成方五丈三尺，四出陛，均四级，砌以白石。”^③清代虽然比之明代坛台的宽度不变，高度上矮了一尺，但仍记载为两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社稷坛却是一座三层坛台的外形，而且这座坛台除了上面铺垫的五色土外确实是清代遗存下来的坛台（图二）。难道是历史记载错误？但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会在如此神圣的坛台上出现吗？怎么可能出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典上？况且，从明代至清代持续了四百多年？难道是后代改造了？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翻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大明会典》中虽然绘制了社稷坛的形象，但是仅绘制了大体轮廓没有分层绘制。《大清会典》中也绘制了社稷坛的图纸，但是也不能分辨出几层坛台。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左右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中非常清楚的绘制了社稷坛拜台的样式，确实为“三层”（图三）。而且，在民国时期的《燕都丛考》一书里找到了两个数字：此书正文中的记载与清代完全一致，为两成；而在书的注释中解释中山公园时又记载：“……社稷坛……坛制正

方，石阶三成，陛各四级。上成用五色土，随方筑之。”^④但是，显然书中所说的“石阶三成”还是在承认两成的基础上，解释坛是三层台阶。这三层台阶与两成坛台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如果从社稷坛在北京坛庙体系中的等级的角度考虑，坛庙体系同样遵循“天地君亲”的原则，它属于君的规制，必定要低于地坛，而地坛使用的是二层的坛台，那么社稷坛最多使用二层坛台。而它为什么建成三层，甚至超过了地坛？

笔者对现存的坛台进行了实地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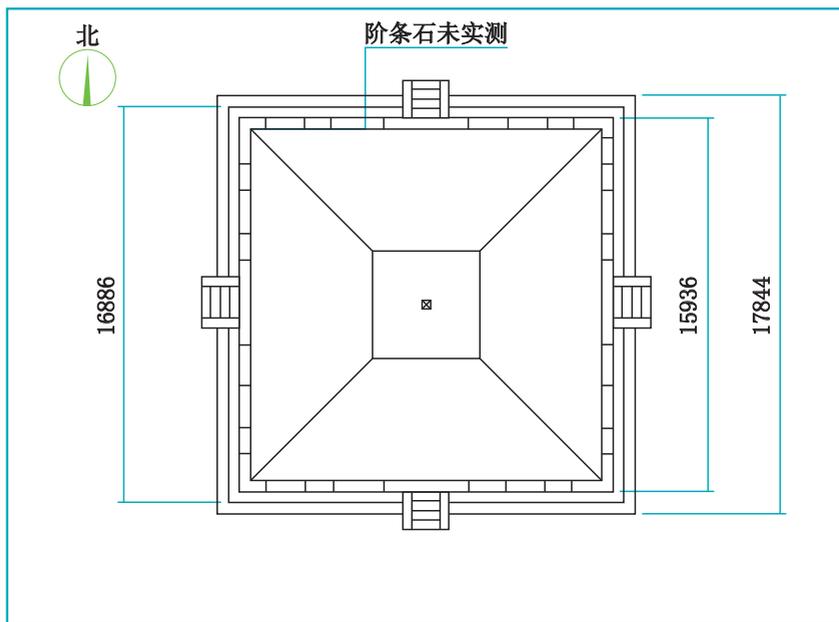


图三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社稷坛拜台

用量得的数据与史料记载对比（图四）。量得三层台阶最下一层边长在 17.85—17.86 米，第二层边长在 16.81—16.87 米，第三层边长 15.95 米。用上面的数据对比清代记载的数据，按照清代营造尺一尺折合 32 厘米计算，目前的第二层的边长与记载的第二成五丈三尺基本吻合，目前的第三层边长和记载的第一成五丈基本

吻合。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按照明代的营造尺一尺折合 31 厘米计算，社稷坛的边长更加接近明代的尺寸。而且我们注意到清代只是改变了高度，宽度则与明代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坛台很可能只降低了高度，宽度则没进行改造。也就是说这座坛台很可能是在明代原物的基础上，将明代坛台的石材减低一尺。最下一层坛台，也就是历代会典没有记载的这一层，用明尺计算得出宽五丈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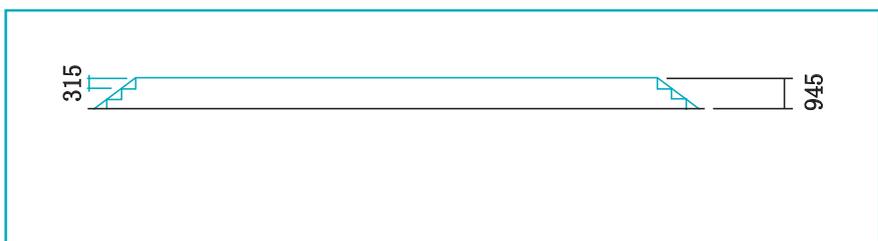
根据测绘的数据，现存坛台的三层台阶总高 0.93 米，每层坛台均高 0.31 米（图五）。对比记载的清代坛高四尺，如果按照清代的营造尺，坛台应该高 1.28 米，记载与实际相差 0.32 米。但是，如果按照天坛圜丘的建造理论，本处也在高度上使用了古尺，也就是周尺，一尺折合 23.1 厘米，那么四尺也就折合 0.924 米，与实际坛高基本吻合。而另一



图四 社稷坛坛台平面图

深层次的问题是，清代为何将明代的五尺改为四尺呢？如果同样援引天坛圜丘的建造理论，我们现在有这样一组数据：坛台第一层边长折合五丈七尺，二层五丈三尺，最上一层五丈，那么社稷坛也就有了一、三、五、七 4 个数字。高为周尺四尺。用高度和宽度相加，指向了阳数中最大的九。这样社稷坛在数字上与天坛一样也包含了单数中的所有阳数。而在测量砌筑坛台的条石时发现，条石从 1.12 米到 3.68 米之间不定，数据似乎没有一定规律，条石的排列上也没有发现一定的规律性，条石的尺度和排列组合又没有遵循天坛的做法。

我们又注意到了一个概念，史书记载每年顺天府都要在祭祀前为社稷坛上铺垫新的五色土，“每祭，坛上敷五色土”^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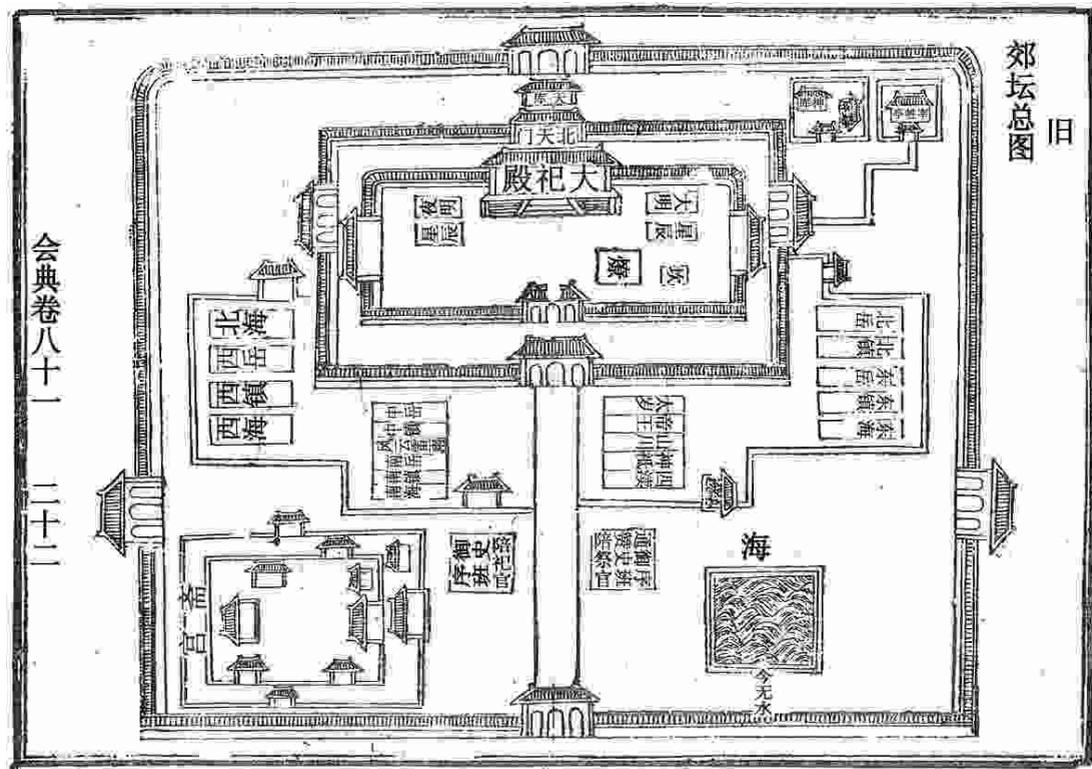
图五 社稷坛坛台剖面图

也就是说五色土与坛台不是一个概念，坛台高四尺，五色土还有本身的高度。五色土的厚度，《明实录》弘治五年（1492年）：“社稷坛春秋祭每用铺坛五色土二百六十石，顺天府民取而输之神宫监石加八斗本府言土以饬坛，义取别其方色，初不以多为贵，况小民取之山谷劳费不贲，请着为定例。庶民劳可纾而有司亦无延误之失命，工部尚书贾俊会神宫监太常寺核用土多寡之数，俊等至坛相度言，常年所输土用以铺坛，厚可二寸四分。若厚止一寸，则仅用百一十石而足。遂以为请。得旨，铺坛土止以厚一寸为度，令今后但如此数办纳”。这时我们可能就要从建筑技术的角度考虑该处坛台了，由于坛台上铺垫了五色土，为了保持五色土的规整，不至于向四周散换，那么周围必定需要一个建筑要素——拦土。如果当作拦土去考虑，那么我们目前看到的第三层就不具有祭祀意义，而仅具有实用意义，则不能计入坛台的层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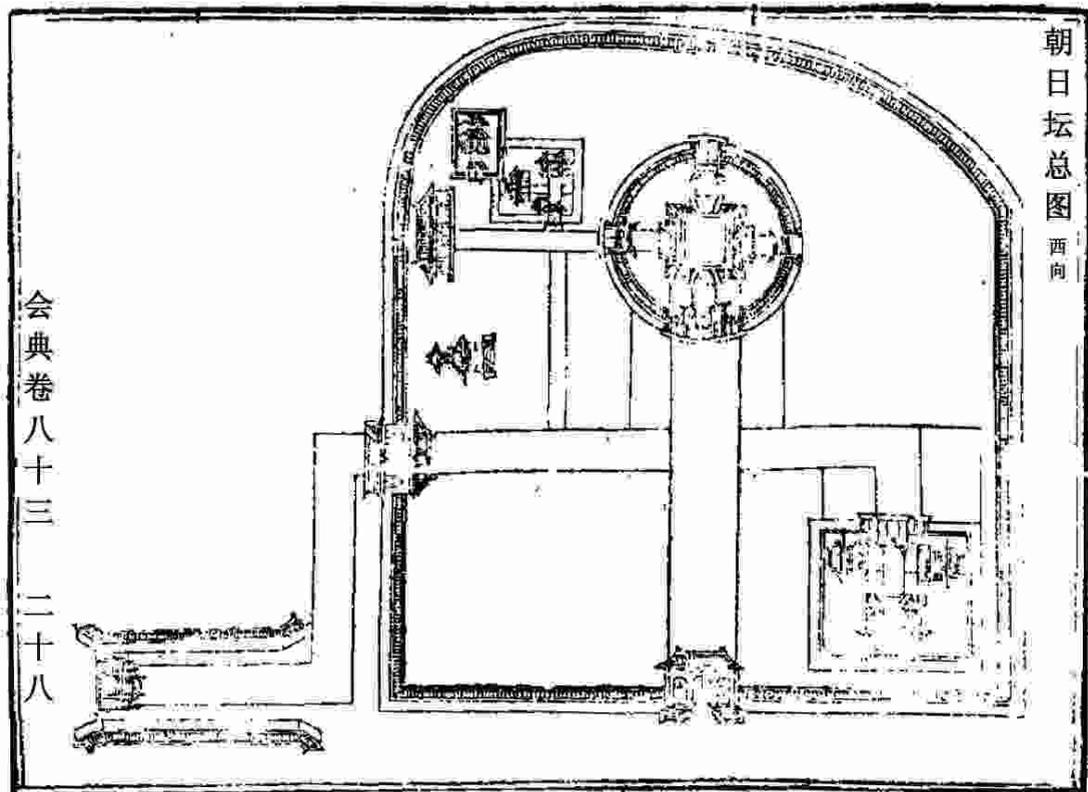
所以古籍记载为两成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既然它作为坛台的一个附属构件，为何最上一层石阶和其它两层高度和形式完全相同？坛台记载的高度也是到最上一层（即假设的拦土）的高度？由于这种种疑问，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四、天坛北圆南方的坛墙与日坛东圆西方的坛墙在理念上的冲突

天坛的坛墙为方圆结合形，寓意天圆地方。这种形状主要是由于明初此地是天地坛，在一个坛域内同时祭祀天和地，所以坛墙建造成方圆结合型，分别代表天和地。我们看到在《大明会典》中绘制的、明初的天地坛图中外坛墙北侧转角处确实是圆形（图六）。现存天坛的两重坛墙也都是北圆南方形。众所周知，天为阳，地为阴，所以天坛圜丘用圆形，地坛拜台用



图六 《明会典》天地坛图



图七 《明会典》日坛图

方形；南为阳，北为阴，所以天坛建造在城市南方，地坛位于城市北方。所以《钦定大清会典》中说：“凡郊天礼，兆阳位于南郊，圆以象天。”^①而为何天坛的坛墙却是北圆南方呢？为何嘉靖朝改为四郊分祀后，改建天坛时，不但不将天坛改为圆形围墙。反而将内坛墙也改为北圆南方形了？这种建造方法似乎打破了天南地北的规律。而更为奇怪的是，在同一时期建造的日坛坛墙同样为方圆结合形，其坛墙却为东圆西方形（图七），又符合了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的规律。这样天坛的坛墙和日坛的坛墙在建造理念上便产生了冲突。

虽然以上问题仍然有待解决，但是我们却也从中总结出来坛庙建筑象征手法的第二个规律，那就是形状。譬如，天坛的圜丘的圆形，日坛拜台的圆形坛墙，地坛的方形拜台、方形坛墙，日坛的方形拜台和方形坛墙等。但必须说明的是，形状同

时也包含着等级这一观念，比如日坛使用方形拜台，很可能是方形低于圆形的规制所致。

①（古罗马）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3月，第14页。

②（明）李东阳纂、（明）申时行重修：《大明会典》卷187《营造五·坛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8月，第2552页。

③《大清五朝会典·光绪会典图一》卷十《礼十》，线装书局，2007年5月，第93页。

④（民国）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43页。

⑤（清）缪荃孙、周家楣：《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五·坛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17页。

⑥《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36，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5月，第299页。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馆员）

清代 | 京师 | 城垣 | 军事 | 管理 | 述略

袁学军

城垣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封建帝都的京师城垣不仅是御敌防卫的军事设施，还是连接城市内外的交通要道及征收商税的关榷。清代京师城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功能的多元化，使得历朝统治者对其管理都十分重视，京师城垣的管理是清朝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京师城垣的管理问题，是个较大的研究题目，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笔者囿于学识，仅就所见的史籍和档案资料，辑而成篇。从城垣修缮、职司设置、门禁制度、信炮管理、军事防御设施五方面，对清代京师城垣的军事管理做初步考述，并求教于专家、同好。

一、城垣的维护与修缮

清代京师城垣的建设以明代为基础，虽有多次的改建、修缮，但方位和形制基本没有改变，依然是内外二城、“里九外七”十六门格局，只在修缮工艺和外城规制方面做了补充和完善，使其防御体制更加完备，工艺更为精湛。

京师城垣的坚固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历朝帝王对城垣的维护都十分重视。清初，内、外城城垣的巡视和修缮由工部负责。康熙十三年（1674年）步军统领提督九门事务后，则由步军统领衙门和工部联合巡查，城上营房由步军营官兵修理，其余部分仍由兵部修缮。水关由工部和顺天府监修。

为了使城墙更加坚固，清代统一了城

垣的厚度和城砖的大小。雍正八年（1730年）议定：“内外城墙，除土心之外，旧址阔五、六尺，顶阔三、四、五尺不等。今议以址阔六尺，顶阔四尺，着为定例。”^①乾隆二十年（1755年）“设立官窑烧造砖块”，规定“每块长一尺五寸、宽七寸五分、厚四寸。”^②

为防止墙体被雨水浸泡，造成墙体坍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议准：“京都城垣，最关紧要，所以保护城墙者，上凭海墁，下藉根脚。今议以海墁砌城砖一层，竖筑灰土三步，每步用灰五百斤。地脚灰土五步，每步用灰六百斤。护城根脚散水灰土三步，每步用灰三百五十斤。内城里外皮城身砖砌，址计九进，顶计五进。外城里外皮城身砌砖，址计八进，顶计四进。均用长一尺五寸、宽七寸五分、厚四寸、停泥城砖成砌。每块给砖价银三分六厘三毫。每年由部奏派大臣于二、八月周历查勘。遇有应修工段，估计钱粮，奏派修理。所需工料银两，在户部动拨。例限保固三十年。俟工完造册报部核销，按段勒石，以备稽考。”^③

清代，不仅规范了城墙的修筑工艺，还对外城部分城门进行了改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外城的永定、广宁（道光三年即1823年改称广安门）二门，门楼由单檐歇山式改建为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形制如内城。

另外，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增筑外城瓮城时是否建箭楼，未见文献记载。而且，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师全图》外城瓮城上也没有建筑，但

从清末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外城七门瓮城上均建有一座单檐歇山式、墙体辟有箭孔的建筑。虽然宫廷画家徐扬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所作的巨幅画卷《乾隆南巡图》中的广宁门有箭楼，但图中城楼和箭楼的规制却与内城一样，城楼为三重檐重楼式，这与文献记载矛盾。而且，箭楼为重檐歇山顶式建筑，这也与清末拍摄的历史照片不符。由此推断，外城瓮城上的箭楼应该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增建。

二、职司设置与官吏委任

封建社会京城的城垣历来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于城垣的管理都不敢忽视，在职司设置上，虽各有异同，但均由位高权重的部门监管，并委以亲信重臣，清代也如此。

清初，京师城垣的管理隶属于兵部职方司，门官称城门领、城门吏、指挥、千户，由汉族官员主管其事。其职责主要是晨昏启闭，稽查出入。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京师内城九门，每门设城门领、城门吏、指挥、千户各2人，马甲260名，炮甲18名。外城七门，每门设城门领、城门吏各1人，指挥、千户各2人，马甲、炮甲共70名。^④四年之后（1647年）“改各门指挥、千户百户等官俱为千总”^⑤，秩正六品。

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朝廷做出撤藩决定，吴三桂在云南起兵，为了增强京师的守备力量，十三年（1674年）“命步军统领提督九门事务”并定“内九门城门尉、城门校、千总每门二人；外七门城门尉、城门校、每门一人，千总每门二人，以统辖十六门门军”^⑥。内城城门尉、城门校改由满人担任，外城城门尉、城门校仍由汉官任职，千总均由绿旗官担任。^⑦乾隆十九年（1754年）改城门尉为城门领，秩从正四品改为从四品；城门校改称城门吏，仍为正七品。^⑧

步军统领始设于清初的步兵营，当时

只管京城满、蒙、汉八旗步兵，秩为正二品。康熙十三年（1674年）执掌京城九门事务后，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康熙三十年（1691年）驻守在外城和京郊的巡捕三营（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增为五营）也归其管辖。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步军统领衙门。^⑨乾隆八年（1743年）接管白塔山及九门信炮事务。嘉庆四年（1799年）升为从一品，并增设左、右翼总兵各一员，与其同堂办公。步军统领亦称“九门提督”。

九门提督掌管着驻京八旗步兵和巡捕营，担负着京城守卫，内外十六门管钥和发信号炮等要职，位高权重，因而，朝廷对其人选极为重视，历来由亲信的满族大臣担任，并大多由部院尚书兼任。在清代历次宫廷争权斗争中，九门提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熙朝皇子间储位之争不断，圣祖临终时，唯让时任理藩院尚书兼九门提督的隆科多传遗诏，由胤禛继位。为防止发生变故，隆科多命在胤禛登基和治丧期间关闭京师九门，直至胤禛正式即皇帝位，步军统领衙门才解除了京师戒严。

清末，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当时负责捕杀维新派的正是九门提督崇礼。政变使维新派进行的改革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封建势力重新掌握大权。

三、门禁与合符制度

城门是内外城之间往来的通道，为了保证城内的安全，历代统治者对京师城门的启闭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沿袭明制，又略有改善，日趋完备。

清代开启城门以天明为度，闭门以日落为准。“凡遇行幸驻蹕畅春园，城内各衙门，按日前往奏事，传知西直门、德胜门、西便门。驻蹕南苑，传知正阳、永定等门，均酌量早启迟闭。其平常行人，仍于黎明时放行”。“遇御门听政日，城外居住官员，应早入者，由兵部行文于晓钟后启正阳门”^⑩。

城门关闭后，兵丁在城上巡视，内城兵丁以击梆巡夜，外城则鸣锣巡夜。同治七年（1868年）为了严格夜间巡视特规定：“城上堆拨十五座，一律修整。官兵巡城分左右两翼设筹二枝。左翼二筹，一刻正蓝旗南筹字样，每夜由正阳门正蓝旗堆拨传至安定门西镶黄旗堆拨为一周。一刻镶黄旗北筹字样，由镶黄旗堆拨传至正蓝旗堆拨为一周。其右翼二筹。一刻镶蓝旗南筹字样。一刻正黄旗北筹字样，往来传递，一如左翼。责成各旗该班参领承管。于各堆拨设立名册，令传筹之兵。每夜传到时，在名下各自画押，不得代替。按十日一次，由各该旗送查城大臣存查。倘兵丁传筹迟误，由各该管参领禀明该旗惩办，如有徇庇，经查城大臣查出，即行严惩。”^①为防止守城官兵日久懈弛，嘉庆十七年（1812年）谕旨：“都统、副都统、参领等每月分次查城，并交步军统领按月查明会奏，以凭稽考”。对于查出旷班者或将城上官房借人居住者，从严惩办。对不按时报上城检查的官员也严加议处。^②

清代京城实行宵禁，城门关闭后，王以下官民不得任意进出，若差役夜间要出城，需持有官府的证明。

康熙朝规定：“凡部院差役夜间出城，须有各该衙门印文，都虞司等衙门差役，须有内务府印文，方准放

出。如系奉旨差及紧急军务，城门尉、城门校查问姓名，登记明白，开门放出，次日报部。”^③

到了雍正朝，九门门禁管理更加严格，采用了合符制，合符成为夜间出入城门的特殊凭证。合符由铸有凹、凸字的两扇组成，字凸出者称“阳文合符”，字凹入者为“阴文合符”。二者统属各不相同。夜间遇有阳文合符至门，城门领以阴文合符照对，验明后方可开门放行。合符质地一般为铜镀金，也有铁镀金或金质。形状以椭圆形居多，也有长方形、方形、圆形。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详细说明了合符的使用范围、比验方式及保管。“雍正四年（1726年）谕：交出阴文合符三件，一交步军统领收存，其二交正阳门西直门存贮。二门既有阴文合符，如遇阳文合符至门，照对即行开放，不必候步军统领。其余各门，皆着步军统领将阴文合符亲持赴门，与阳文合符照对开门。倘无阳文合符，虽称有旨，亦不得开门。”^④正阳、西直二门的阴文合符，用黄纸包封，木匣存贮，内封外匣加贴步军统领印花，由城门领保管。交接班时均要查验印封是否完整。每月步军统领还要查验一次。^⑤

同治年间，阜成门亦有合符，为木质方形。面从右至左竖刻两行“圣旨开阜城门”，此符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一）。



图一 故宫博物院藏同治年间“圣旨开阜城门”合符

合符制度并非始于清代，但以往的合符多是讲究外形的对合，外形合对后，再看铭文。而清代是以阴、阳两扇字迹完全吻合的勘验方式，这使合符的勘合更加科学、严密，并可防止诈伪。表明清代在门禁管理上更加严格。

四、预警机制——信炮与信牌

信炮是紧急突发事件或发现敌情的信号，设置信炮是加强京师防卫的重要措施。为了遇有紧急情况迅速集结部队，顺治十年（1653年），在宝塔山和内城九门各“设信炮五位，竖旗五杆，遇有警急，声炮为号，旗杆上昼则悬旗，夜则悬灯，白塔鸣炮，则九门皆应之，各旗闻炮声皆披甲。”^④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官员听到信炮声，需到八旗指定地点集合听令。外城七门闻信炮声，外火器营官兵向阜成门进发，健锐营则向西直门进发，以备调遣。

白塔和九门鸣信炮，需见到书有“奉旨鸣炮”字样的金牌，或鸣炮信牌，方可放炮。“故宫博物院现珍藏着一件发信炮的信牌，材质为象牙，信牌长24.5厘米，宽9.8厘米，厚1.5厘米，虽无金，但象牙板面镌刻一只升龙和周身围绕如意云纹，是为‘信牌’二字的半部，另一面镌刻书写：‘值班王值班内大臣值班文大臣值班武大臣值班前锋护军统领请发信炮金牌同治元年’等字样。”^⑤

信炮，清初由信炮官管辖，后归属九门提督。顺治十年（1653年）设置信炮官左右翼各二人。雍正二年（1724年）改设信炮总管一人。乾隆八年（1743年）白塔信炮归步军统领管辖，设总管一人，司信炮官八旗各一人。^⑥

信炮的设置完善了京城报警机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紫禁城和京城的安全。

五、军事设施与兵力配备

清代北京城垣的军事防御设施，沿循明制。在城垣顶上设铺舍，满语称为“堆拨”，供士兵休息或存放守城武器等。“内城九门城上堆拨房一百三十五所。收储旗、镫、信炮、火药一百六所。城外旧营房一万六千间。每旗满洲一千五百间，蒙古五百间。新营房三千六百八十间。除正阳门外，每门满洲蒙古汉军四百六十间。守门班房九十间，更房十五间。外城巡捕南营堆拨房二百九十六所。城上堆拨房四十三所。守门班房六十二间。城外巡捕北营堆拨房一百二十一所。左营堆拨房一百三十所，右营堆拨房一百十一所”^⑦。

守城武器主要是炮、弓箭、长枪、鸟枪等。“内城正阳门信跑五，大炮十，炮车十，火药一瓮，计三十斤。号杆、龙旗、号镫各五。纛鞬二十，弓二十，矢四百，架二座。鸟枪、长枪各二十，架二座。余八门如之。云牌各一，崇文门、东直门钟各一，无云牌。正阳门锁钥四，红杖四十，余八门半之。正阳、崇文、宣武、朝阳四门激箭各一。正阳、朝阳、阜成、西直、安定五门各储垫板十六块。崇文等八门共分储旧炮一千八百二十七。外城永定门，锁钥二，云牌一，纛鞬十，弓十，矢二百，长枪十，铜炮五，炮车五，火药二千斤。余六门均如之。永定门烘药二十九斤，右安门十四斤，余五门各储二十八斤有奇。西便门红杖二十，广宁门红杖十，余各四十。”^⑧

通常情况下，内城九门由满洲八旗防守，外城七门由汉军八旗看守。内外城十六门，除正阳门由八旗轮值，派驻甲兵20名，绿旗门军40名。崇文等内城其它八门均按八旗驻营位置，每门分别设甲兵30名，绿旗门军40名。外城七门每门派驻八旗汉军甲兵10名，绿旗门军40名，^⑨总计守兵970名。

遇有内忧外患，城门的防御力量定会大大增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记载了1900年“庚子事变”前后，京城各门的兵力部署情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内城八门防御配置^②

城 门	守军人数	火力配置
安定门	镶黄旗满、蒙、汉共1512人，其中官兵736人、内抬枪兵和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2人、炮兵44人	抬枪15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铅丸500粒，铜帽10000粒，火药1000觔
东直门	正白旗满、蒙、汉共1531人，其中官兵755人、内抬枪兵和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2人、炮兵44人	抬枪15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铅丸15000粒，火药1250觔
朝阳门	镶白旗满、蒙、汉共1481人，其中官兵705人、内抬枪兵和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2人、炮兵44人	抬枪13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铅丸5000粒，铜帽10000粒、炮子160，火药100觔、烘药20觔
崇文门	正蓝旗满、蒙、汉共1515人，其中官兵740人、内抬枪兵和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1人、炮兵44人	抬枪15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大小铅丸2150粒，铜帽22000粒，火药220觔
德胜门	正黄旗满、蒙、汉共1525人，其中官兵749人、内抬枪兵、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2人、炮兵44人	抬枪15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铅丸3000粒，铜帽30粒，火药500觔
西直门	正红旗满、蒙、汉共1467人，其中官兵691名、内抬枪兵、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2人、炮兵44人	抬枪15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铅丸4200粒，铜帽13000粒，火药3000觔，炮铅子40粒、烘药20觔
阜成门	镶红旗满、蒙、汉共1514人，其中官兵739人、内抬枪兵、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1人、炮兵44人	抬枪15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铅丸7000粒，火药200觔
宣武门	镶蓝旗满、蒙、汉共1537人，其中官兵762人、内抬枪兵、洋枪兵各300人、藤牌兵30人、杂差兵101名、炮兵44人	抬枪150杆，洋枪300杆，后膛洋枪100杆。神威炮4尊，铅丸7150粒，铜帽10000粒，火药300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十六门防御配置^③

城 门	守军人数	火力配置
东便门	镶黄旗汉军官2员、士兵100人	铜炮9门、神机神枢炮108门
广渠门	正白旗汉军官2员、士兵50人	局炮4门、大小城炮113门、台湾炮3门（不能用）
左安门	镶白旗汉军官4员、士兵100人	神威炮4门、台湾炮5门、神机神枢炮107门、存火药400斤
永定门	正蓝旗汉军官4员、士兵60人	神威炮4门、台湾炮5门、神机神枢炮108门
右安门	镶红旗汉军官3员、士兵40人	台湾炮5门、神机神枢炮108门、存火药70斤
广安门	正红旗汉军官2员、士兵48人	铜铁炮170门、存城火药220斤
西便门	正黄旗汉军官2员、士兵130人	台湾炮5门、神威炮4门、神机神枢炮108门
崇文门	正蓝旗汉军官10员、士兵200人	神威炮14门、制胜炮5门、神功炮2门、台湾炮1门、德胜炮1门、神机神枢炮106门、火药100斤
朝阳门	镶白旗汉军官8员、士兵300人	神威炮14门、铁心铜炮4门、神功炮1门、台湾炮2门、制胜炮6门、红衣炮3门、木厢炮2门、德胜炮1门、神机神枢炮106门
东直门	正白旗汉军官12员、士兵180人	大炮29门、神机神枢炮111门、存火药44斤10两
安定门	镶黄旗汉军官4员、士兵250人	神功炮3门、台湾炮2门、制胜炮6门、神威炮14门、神机神枢炮106门、木厢炮1门

德胜门	正黄旗汉军官4员、士兵140人	木厢炮1门、台湾炮2门、制胜炮6门、神威炮14门、神机神枢炮106门、火药1000斤
正阳门	镶蓝旗汉军官2员、士兵45人	大城炮8门、制胜炮3门、神威炮9门、铁心铜炮4门、神机神枢炮109门
宣武门	镶蓝旗汉军官2员、士兵42人	大城炮14门、神威炮9门、铁心铜炮2门、制胜炮3门、神机神枢炮106门
阜成门	镶红旗汉军官2员、士兵125人	台湾炮6门、神威炮18门、浑铜炮2门、木厢炮2门、铁心铜炮6门、制胜炮6门、神机神枢炮106门
西直门	正红旗汉军官1员、士兵32人	神威炮14门、大台湾炮3门、制胜炮6门、木厢炮3门、铁心铜炮6门、大铜心炮2门、神机神枢炮106门
除此之外，城墙的部分垛口，也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牛腿炮、小墩炮、洋炮、炮车、排枪筒等火器。大炮的规格一般“长九尺、口面一尺一寸”，牛腿炮一般“长三尺、口面五寸”，小墩炮“长二尺二寸、口面三寸。”		

由这两张表可以看出，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城垣防守的兵力虽比战时大大减少，但是仍然比康乾盛世时有所增加。城垣作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其武器配置和兵力部署，必然与当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清朝京师城垣的军事管理举措虽因循旧制，但较前朝有所改进，日趋完备。

首先，京师城垣的方位和形制虽未改变，但规范了海漫及城墙根基的修筑方法，这有效地防止了雨水对墙体的浸泡，使城垣更为坚固。

第二，城门管钥掌握在驻京武官、一品大员九门提督手中，随着其职权的进一步扩大，九门提督在历次宫廷争权斗争中的作用愈发重要，甚至影响政局。

第三，宵禁时采取的合符制，以阴阳两扇字迹完全吻合的勘验方式，有效地防止了诈伪，使门禁管理更加科学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京城的安全。

第四，内城九门信炮的设置，完善了京城的预警机制，使京师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迅速集结军事力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紫禁城和京城的安全。

清代虽然加强了京师城垣的军事管理，但作为封建王朝的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固若金汤的京师城门城墙，终究未能抵挡住八国联军的炮火，并伴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而失去了军事防御作用。

①③（清）昆冈、李鸿章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867《工部》，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石印本。

②《工料给事中禄谦等奏为办理工程所需城砖价银销算事奏折》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142《八旗都统》。

⑤《清实录·世祖实录》卷 34，中华书局，1985 年。

⑥⑩《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43《兵部》。

⑦⑬⑰（清）伊桑阿奉敕撰：《康熙会典》卷 81，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刻本。

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42、卷 543《兵部》。

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156《步军统领》。

⑩《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158《步军统领》。

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142《八旗都统》。

⑫《清实录·仁宗实录》卷 251，中华书局，1985 年。

⑬《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79《兵部》。

⑭《清实录·仁宗实录》卷 246。

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163《步军统领》。

⑯毛宪民：《清代京城信炮信牌管理述考》，《满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9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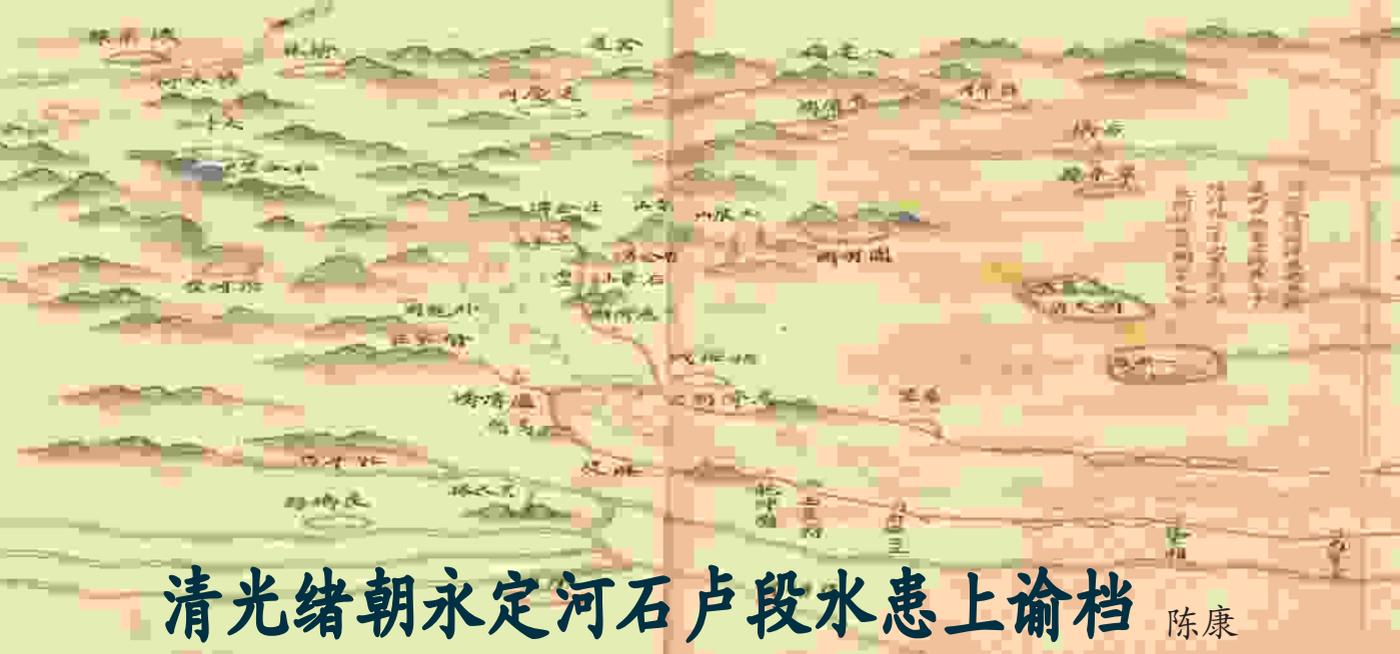
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872《工部》。

⑱《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876《工部》。

⑲《呈驻守城上八旗骁骑营左右两翼炮队官兵及各项枪炮子火药数目清单》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⑳《步军统领衙门档案》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六月，卷宗 44 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作者为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馆员）



清光绪朝永定河石卢段水患上谕档 陈康

我们将永定河称为北京的母亲河，是因为它孕育了北京，千万年来它用滔滔的河水滋养着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河之上游地分南北两支——洋河、桑干。桑干主流西出山西省宁武之管涔山，一路东行，汇集着无数条支流，浩浩荡荡穿越北京西、南部，最终融入到海河，遂成为海河水系中一条主要的大河，它自河北怀来县的幽州村流入北京，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至大兴出境，在北京境内全长170公里，流域面积3168平方公里。

一、清代的永定河

永定河古称瀑水，又名桑干河、浑河、卢沟河、无定河……在历史上曾造成过很多大的水患，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河道总督于成龙大规模修浚浑河，上赐名曰：永定河，以期“永庆安澜”。雍正八年（1730年）在庞村建庙北惠济，奉安永定河神，惠济黎民，永无水患。然河名永定，庙建惠济，乃铸镇河神牛于河畔，亦未能使其真正永定。

雍正以降，水患依然频仍，仅以光绪朝而言：光绪帝在位34年，永定河年年水患，岁岁警报，已到了疲于奔命的程度。其有关资料在《清实录·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间有关永定河水患的上谕档中都有详尽的记载，

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上谕和阁臣奏折光绪朱批的有三十余件，涉及石景山段的为7件。光绪在位的34年中，永定河伏秋大汛达到了汪洋渍涨势，泛滥成灾的有6年，平均五年一次大灾，占到整个光绪朝1/6强的比例，不可谓不多。

永定河全长680公里，流域面积达4.7万平方公里，尽管石景山段在永定河全长中仅占23里，而永定河之险却在石景山段，故历来有“石景山堤工当永定河之上游，作京师之保障最为重要”之说。永定河泛滥久已有之，但在金以前的资料缺失，鲜有记录，金元之后文献记载逐渐增多，到明清以降，水文资料日趋完整，能够证明明清两朝都以治理（永定）河工为重，遂成要务，得到了各朝的充分重视，开始对此有了认真的部署。

究其原因，永定河水自西北黄土高原而来，挟裹着大量泥沙穿官厅百里长峡而过，从三家店出山，河床的坡度放缓，流速变慢，导致挟裹的泥沙淤积，从而抬高河床，汛期时流域范围内往往是“连旬大雨”便可引起河水暴涨，故而泛滥成灾，因此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说：“永定河浑流湍激，迁徙靡常，挟泥拥沙，易淤善溃……”，^①此言甚对。故在清代各朝都会将永定河的河防当作重中之重的第一要务，多次派员实地考察。李鸿章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十二日奏折中认为：“臣查永定河身久

经淤高，前人譬之水行夹墙，以上两堤全系沙土，汛涨即虞溃漫，若论治法，必须改河筑堤，方可安流顺轨。”^②翰林院侍读黄思永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初九日也曾对永定河进行过详尽的调查和勘察，他在奏折中称：“由张家口至大同府桑干山下，即永定河源。沿途车入山沟，随处查看，始知车路即河，一经大雨，千岩万壑之水汇注直下，至石景山出峡，沛然莫之能御。近年下回愈淤愈高，倒漾横决，殃及于大清河、北运河、凤河及沿河洼地，常为泽国。”因此他认为：“永定河不治，诸河皆不可治，畿辅水患遂天已时也。”^③其年六月十七日直隶总督裕禄奏：“该道（永定河道）卫杰秉称：‘（他认为永定河成灾有四大关键）：其一，宣化至黑龙湾，河形顿形收束，两山壁立……约长三十余里；其二，出黑龙湾，河面顿开，保安州入怀来……和合口，山势又复收束，两山屹峙，一线中通……水势自高而下，迂回盘折；其三，和合口至宛平沿河口……山形较杀，曲折益多；其四，怀来和合口至三家店二百六七十里间，至宽处不过百丈，而湾环往复约七十余处，乃桑干东南一大收束，南十余里至石景山……’”，为此裕禄认为：“奴才伏查，永定河之患是由于下口不畅，淤垫日高，水势稍涨，动致横溢，险要工段均在石景山（以下）”。^④

二、清代永定河河务管理机构

清初永定河的事务是由山东、河南河道总督及工部共同管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直隶巡抚开始分管河道，雍正六年（1728年）朝廷鉴于直隶在京畿地区的特殊地位，又兼有盐、漕、河三政及海防的重任，遂设立了直隶总督，其重要的一部分职责就是负有永定河河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决策权，且多数的治河方略、规划及工程等都是由直隶总督提出并督促实施、执行的，因此清代永定河最高的管理权是在直隶总督。《永定河志·职官》云：“直

隶总督兼管河道。”^⑤实际上“直隶”一词并非行政区划，而其意是以直隶总督作为全国各省总督之首，同时还兼有省区巡抚事，在属于京畿地区的顺天府府尹之上，为有督无抚的地区，其位高权重，无可匹敌。在光绪朝任过直隶总督的有：李鸿章、王文韶、裕禄、袁世凯、杨士骧，杨士骧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山东巡抚升任直隶总督，未几卒于直隶总督任上。

在直隶总督之下，清代在行政机关中还设有具体掌管河川堤防的道员，称为“河道”，也叫“河工道”，因之在凡是与河务有关之地均设有“河道”，顺治初始设“河道总督”一职，直隶永定河道驻今河北省固安，专司永定河堤防疏浚事务，后又新置南河、北河和东河，以直隶河道总督，称为北河，乾隆中裁撤北河，其所掌之河道事务归由直隶总督兼管，咸丰、光绪朝又相继裁撤了南河与东河。

直隶的河工设有总河，顺治元年（1644年）原设总河，辖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等处河务，驻济宁州（今山东济宁）。雍正八年工部提议：直隶河工关系重大，请设立河道水利总督一员（称为总河），副总督一员，驻天津府，专管直隶河务，管辖有：永定河道、清河道、霸昌道、天津道四道的河务。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裁撤了正总河，永定河的日常管理由直隶河务总督统交由永定河道主持，自此具体管理永定河的部门改为永定河道。永定河道下设南岸、北岸、北运河、三角淀和石景山五厅，有文职和武职两大系统，文职系统有厅员：石景山同知、北、南岸同知，南岸同知管南岸八汛，北岸同知管北岸八汛，在石景山段设有石景山厅，设置石景山同知一员，“今其管理石景山一带工程，专司防护抢修之事”，其衙署称石景山厅，所辖范围乃从石景山——卢沟桥河段，长23里，专管南北岸头工、卢沟桥以上堤防。武职系统有：都司，为永定河河兵的总领，正四品武官，管辖弁兵，归河道节制，所辖：南岸设守备，正五品武官，北岸设协

备，略低于守备衔，下辖千总、把总各一员，为正六品和正七品，其下还有外委把总，职比把总低一级，不定数，各有分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原设有把总四员，后多有变化。雍正八年（1730年）将原留把总二员加千总衔，另补把总二员，一为北岸把总，管石景山工程，一为南岸把总，南岸下七工汛。石景山水关外委：雍正十一年（1733年）原设水关外委，专职报汛，属石景山同知管。乾隆三年（1738年）添设千总，乾隆十九年（1754年）调水关外委管理凤河东堤，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裁千总，仍设水关外委。光绪二十年（1894年）设河防局，“钦派东河督臣许振祜驻工督修（永定河）”。^⑥

河兵是清代专门从事堤防修守的专业化军队编制，永定河河道统领的河兵最多时达2000人，后各朝均有增减。这是一支常年奋战在河防上的部队，尤其在伏汛期更是要冒着生命危险英勇在第一线上抗洪抢险，为保卫北京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清代永定河石景山段河工

史称“石卢段”的永定河左岸堤防是指自三家店以下至卢沟桥北的左岸堤坝，这段堤坝是永定河河防之要害，也是历朝历代投入大量力量修筑的地段，自元代起为“漕西山木石”就在“自石径山金口，下至武清县旧堤，长计三百四十八里……兴工以修其要处，明弘治二年（1489年）决杨木场堤，命新宁伯谭祐督官军20000人筑之。”《宛署杂记》中记载：“经始于嘉靖壬戌（1562年）秋九月，报成于癸亥（1563年）夏四月，凡为堤延袤一千二百丈，高一丈有奇，广倍之。崇基密建，累石重甃，鳞鳞比比，翼如屹如，较昔所修筑坚固什百矣。”^⑦而到了清代，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人力、物力，顺治九年（1652年）“修石景山以南至芦沟桥决口堤岸。”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帝亲临巡视，“亲授疏导之方。”以花岗岩豆

渣石加工成条石砌筑，并以腰铁相连。饬令“登堤采柳者，割头号令。”

清初石景山段的河防是由工部管理，也是永定河所有各段河道中最为坚固的，在卢沟桥以上十几公里的山景山段，嘉庆二十年（1815年）永定河南岸同知李逢亨编纂了一部《永定河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永定河的专志，书中记载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历年来对永定河堤防的修筑，甚为详尽。按《永定河志》记载：石卢段的堤坝包括了大石堤、片石堤、石子堤、护石土堤、土堤5类，其中有一半以上为结构坚固、抗冲刷的石堤。永定河堤除石卢段全部为结构坚固、抗冲刷的石堤，其他各段均为土堤和沙堤，《畿辅通志·河渠略四》云：“永定河自金元迄明，皆于上游设备。自石景山麓，至芦沟桥南，相继建直土石堤工，所以虑其或侵犂躄也。至于下游，则向无修防，任其散漫。”称之为石卢段。

以永定河的东西两岸通编的工号为天字第1—39号，雍正八年（1730年）奏归永定河衙署管辖，并设立了石景山同知。这年正月怡贤亲王允祥奏请：“查石景山堤工，当永定河上游京师保障，最关重要……请添设同知一员，专司石景山工程、防护、检修之事，仍归永定河道统辖。”^⑧石景山同知为文职系统。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东西两岸分别设官管理，东岸长23里5分，有24个编号，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河道陈琮奏请堤工号数重新编次，以180丈为一里，设一个工号，南北金沟共有石工两段，旧编为天字第1号，新号因之，南金沟编为2—24号。

前面说过永定河之险在石景山段，历史上永定河经常决口之处，在卢沟桥上左岸有三处：故金口（麻峪村南石景山电厂护堤头）、庞村和衙门口，以上三点分别距北京城之西便门21.5公里、18.7公里、12公里，其海拔高程为90、80、70米，相对于西便门，河岸的标高为48.5米，最低的高差也有21.5米，换言之，永定河左

岸的这三处主要决口就如同是三桶高高在头顶之上的水，随时可以倾盆而下，直接威胁到北京城之安危。

查清档，永定河在清晚期年年有灾，因此河工之重在防、在堵、在疏，担负防、堵重任的是河防第一线上的河兵。他们身系重任，也是最为危险的，常有可歌可泣的事例，只是很少有人为之记录，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十二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说：“七月初六日丑刻，该河水陡然异涨，至巳刻竟长二丈三尺五寸，势若排山奔腾而下……其时北风狂起，大雨倾盆，各员弁不避危险，一面启放金门闸，分投抢险。虽淹毙兵夫二人，冲去六人，仍抵死不退。”他们也是最为辛劳的，为此光绪十九年（1893年）四月十五日，李鸿章奏：“天下之至劳累者莫如兵，而河兵尤甚。兵可百年不用，河兵则终年勤苦，修治殆无虚日。”^⑥故奏请朝廷为河兵加饷银一成。

四、光绪间有关永定河水患档

清代典籍中对光绪间永定河水患有详细的记载，从光绪九年到十九年（1883年—1893年）这十年中有过五次大洪涝，分别是：光绪九年（1883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每次洪水都是先旱后涝或春旱、秋涝，在永定河水的丰枯期交替出现。由于地势的原因和季节性洪水的共同作用，永定河一发洪水往往是直接威胁到位于永定河险工河段东南方向的北京城西、南各门。明清以来永定河水灾，能够导致京西近郊村乡一片泽国，造成“田稼淹没，籽粒不收，四境无完室。”直接撞袭北京城西、南各门的洪水谓之大洪水，有水文记录以来有：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天启六年（1626年）、清康熙七年（1668年）、嘉庆六年（1801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六次，其中以光绪十六年和十九年的二次大洪水最大。几次直袭北京

城的大洪水所发生的原因都有共同之处：

1. 永定河河水与拒马河、大清河的洪水遭遇形成顶托，引起了卢沟桥以上洪水宣泄不畅，致石景山以下埽工决口漫溢，导致溢水被迫东趋，直簿京城；2. 卢沟桥以上左堤决口，洪水东趋又与西山洪水合流，进袭京城。

发生在光绪十六年的大洪水是海河流域性洪水，为历年来最大的一次，因为当年北京在7月连降暴雨，达871毫米，永定、大清、潮白诸河同时暴涨，永定河的左岸决口，加之西山洪水自旱河南侵，致使洪水陡涨，直逼阜成门和西便门，导致外城的永定、右安、左安诸门不能启闭，京城外西南东三面均成泽国，城内也是“沟渠壅塞，水无出路，致家家被水，房屋倒塌。大清门左右部、院、寺各衙门，亦皆浸泡水中，墙垣间有坍塌。”光绪十六年雨季，由石景山同知窦延馨董理坝务^⑦，但因险情主要出卢沟桥以下，大决口自畿南，石景山段未有大的决口。

光绪十九年的大洪水更甚于光绪十六年的洪水，此次大洪水对北京城造成了极大的灾害和损失：“水虽渐已消退，而屋宇荡然，田禾尽没，人皆露宿，家无寸椽，至有为墙倒，所伤而呻吟于田畔，村落如洗，而群聚于庙中”的悲惨场面。当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初二日永定河水已经大涨，河水拍岸，两岸的险情迭出，不料在初八日后，一周之内通宵达旦的大雨如注，到了十三日寅时，雨势达到了倾盆，加上风力骤起，山洪暴发，洪水像排山倒海般袭来，水浪高过卢沟桥顶丈余，石景山水志为二丈四尺，此次河水竟然高过水志数尺有余。直冲永定、右安二门。

在这里有必要对水志有所介绍：在古代称作水志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水尺，这是用于观测河流水位涨落的标尺，清代在石景山厅设有水志，以石景山水志为标尺，来判断永定河水位涨落，作为向下游传递水情的主要依据，石景山水志在卢沟桥上游左堤1580米处，也就是今天的庞

村十八蹬，其水志紧靠石堤，呈三角形，1973年在永定河左堤加固修建前戽时出土，为石碑状，碑阳上刻“石景山厅”。

这些重大的水患在《清实录·德宗实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上谕档中都有记载，有关石景山段的水患有：

1. 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初三日李鸿章签报长水至二丈三尺五寸。奏：“本年四五月间雨水稀少，六月即大雨时行，连绵不绝，永定河屡次盛涨……二十三日，石景山签报长水至二丈三尺五寸。”

2. 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初四日，李鸿章奏：“自六月初十日后，各处大雨时行，（永定河）河水接续盛涨，伏、秋汛内皆涨至十余次……两岸险工叠出，石景山东岸四号片石堤冲动二十余丈。”

3.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初三日李鸿章称：“直境节次大雨，又值边外山水暴发，奔腾汇注，各河同时盛涨。”

4.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十二日，李鸿章奏：“窃直境自六月初旬连次得雨，各河接续长水……势若排山，奔腾而下……据报此次石景山上游无工处山居村庄，冲去庙宇、民房人畜不少。”实由积雨连宵，边外山水暴发……灾后，各员多有惩戒，石景山同知窦延馨被摘去顶戴。

5. 光绪十八年（1892年）闰六月初二日，李鸿章奏曰：（永定河）身久经淤高，两堤全系浮沙，汛涨本易溃漫。本届伏秋未交，即值连旬大雨，石景山水志二丈四尺，历届从未漫过，此次长水竟高出水志三尺，而自十八至二十四日有长无落，是水势之历时之久，实为向未所无。灾后，各级官员如石景山同知窦延馨等均摘去顶戴，以示惩戒，永定河道万培因统辖全河，疏于防范，（也）应请革职留任。

6. 光绪十九年（1893年）六月十九日，李鸿章奏：“五月二十八日起至六月初二日，河水陆续增长，拍岸盈堤，两岸险工迭出……初八日以后，连宵达旦，大雨如注，堤外沥水数尺。至十二日，河水长至二丈三尺已有全河莫容之势。十三日寅刻，雨

势益疾，风力亦狂，山水忽又暴发，排山倒海而来，高过卢沟桥顶者丈余……”又“本年六月十三日，永定河水势狂涨，高守堤巅，南上、北上、北中、北下各汛，同时漫溢……至石景山东岸石堤五号坍塌二段，十四号十七号各坍塌一段，共凑长十八丈余……其最为险要者，七号石堤刷坍三段，长五丈余。”

7. 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永定河浑流湍激，迁徙靡常，挟泥拥沙，易淤善溃……入伏后，大雨时行，连宵达旦……北岸如北上（汛）之三、五、七号、十一号……皆迎溜顶冲……甚至冲刷坝，溃动坝身。”

8.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王文韶奏：“窃查光绪二十年永定河设立河防局……又，另案修砌石景山戽堤，由筹赈局拨用银二万四千九百三十余两。本年六月后，大雨时行，河流涨发……积至二十三日戌刻，据石景山外委签报，水深二丈八尺（该处水志向止二丈四尺），嗣终加高二尺，此次水势尚高过水志二尺。”“（事后）因该管各员疏于防范，实属咎无可辞，石景山同知张恩霖革职留任。”

又，十月十三日上谕：“本年六月后，永定河北中汛漫口夺溜，北六工相继漫溢，渐成旱口，经王文韶派委调道员吴廷斌等，督同员弁，挑挖引河，筑坝进占，昼夜枪办，于本月初九日合龙，全河顺办尚委速，在事出力各员自应量予奖叙。”

“降调直隶大顺广道吴廷斌着开复降三级，调用处分，并原枝，仍以道员留于直隶补用，免缴捐复银两……二品衔候补道安振恪、候补道王仁宝著赏加二品衔，永定河道陈庆滋、河防局道员窦延馨、石景山同知张恩霖均着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9.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永定河……秋汛内上游山水汇注，计共长水十六次，连底水涨至一丈七尺三寸。”

10.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初五

日天津袁宫保（世凯）来电：“敝省入伏后，弥月霖雨，山水暴发……北岸又相继冲决。”

11.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十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该河道毛庆蕃禀称：‘伏秋汛内连次大雨，上游山水汇注，计共长水二十八次……’其七月初四日，河水于三时中陡长一丈有余，尤为近年所罕见，大溜奔腾，势甚涵涌……”。

12.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窃本年度入伏后，大雨时行，河流涨发。据永定河道瑞峻禀称：“自六月十一日起，大雨如注，连宵达旦……汪洋浩瀚，拍岸盈堤。十九日戌刻石景山外委签报水深二丈四尺。”

五、光绪朝永定河水患治理的思考

清代自咸丰后，对内国内矛盾加剧，对外国门顿失，国家已走向颓势，在光绪帝即位时，已经到了清末。国力尽管十分羸弱，内外交困，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上谕档看，光绪朝对于永定河水患始终没有懈怠，一直是全力以赴，臣工奏折往往当日就朱批允准，绝不推托，如在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十九年八月十六日的上谕都对李鸿章奏折明确指示，以“请拨经费银三十万两、三十五万两”给予大力支持。

清代致力于永定河治理并卓有成效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在光绪朝如：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时间长达25年，也是对治理永定河付出精力、时间最多的直隶总督，在治理永定河水患问题上的确做到了恪尽职守。窦延馨作为永定河河防第一线的一个官员，做过石景山同知、河防局道员，光绪十五年（1889年）因其治河有功“论功叙赏”升为三品。又因洪水成灾多次被惩戒，摘去顶戴，革职留任，但其无怨无悔，补空堵缺，数十年一直坚守在永定河河防的第一线上，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成为了一个永定河治理的专家，为保卫北京

城，使永定河成为真正永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河东河道总督许振祜对其评价很高：“承办石堤之候补道张莲葵、襄办减坝之候补道窦延馨俱能谙练河事，切实办公，可以常年驻局，兼可分办下游。”

清代永定河堤防不仅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一直将堤防视为与边防同等重要，就连在非汛期内也不得松懈、偏废，到了三汛（即凌汛、麦汛、伏秋大汛）更是尽职尽责，毫不懈怠。采取的是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和二守（即官守、民守相结合），还有较为严刻的奖惩制度，按不同的职责，采取不同的方式，奖赏是加衔加赏，通常的处罚有四类：1. 降级；2. 革职留任；3. 摘去顶戴；4. 作为永定河河务的最高领导，即直隶总督，通常会提出对自己的处罚“臣督率无方，并请旨交部议处。”尽管如此，光绪朝永定河的水患依然不断，个中原因值得思考，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永定河才真正得到了根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永定河。

①②光绪十四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永定河水势犯涨漫溢分别参办各员事奏折》。

③光绪二十五年《翰林院侍读黄思永为敬陈预防永定河水患等事奏折》。

④光绪二十五年《直隶总督裕禄为勘明永定河上游筑坝无裨下游治河事奏折》。

⑤（清）李逢亨：《永定河志·职官》。

⑥光绪二十年《河东河道总督许振祜为亲勘上游不能建坝及设立河防局等事奏折》。

⑦（明）沈榜：《宛署杂记》卷二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永定河志·奏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⑨光绪十四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永定河陡然异涨漫溢成口分别参办各员奏折》。

⑩丰台大王庙《北上二号漫口合龙将军显著灵异碑》。

（作者为原石景山区文委干部）

北京市文物局 2012 年三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7月5日 市文物局召开机关干部竞争上岗大会，共6名同志积极报名参加。6名同志分别围绕对新岗位的认识及如何履职进行演讲，参会人员根据演讲内容、工作思路以及平时工作情况进行民主测评推荐。竞争上岗成为我局选拔优秀处级干部的一个重要渠道。

市文物局召开机关处级以上干部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局党组书记孔繁峙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刘淇书记在市十一次党代会上工作报告，孔局长代表局党组对文博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全局党员领导干部将学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统一思想，推动工作，更好迎接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7月6日 启动第九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本次划定工作范围为市政府新公布的第八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此项工作由北京市规划和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承担，计划年底完成。

召开局系统优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局党组书记孔繁峙、副书记崔国民参加座谈，听取了局属单位13名中青年干部就各自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与工作情况的汇报。中青年

干部思路开阔，提出了许多工作新设想、新见解，特别是对本单位人才引进与培养、实施标准化管理、拓宽办展思路以及整合博物馆资源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合理化建议。

7月12日 举办“市文物局职工素质教育大讲堂——信息写作知识专题培训”，邀请市委办公厅信息处副处长庞学栋、市委宣传部基层处处长张爱军授课。

7月23日 向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和各国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印发了《关于印发文物系统党的十八大期间火灾防控和社会面维稳工作方案》，同时转发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2号行动的通知》，强调了文物系统各单位的工作任务和防范要求。

7月24日 委托清华大学邀请世界遗产专家尤嘎先生来京考察、指导中轴线保护申遗工作，并与有关部门进行座谈。尤嘎先生指出，与其它城市的轴线不同，北京中轴线更为具象，应及早开展保护申遗工作。

7月25日 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机关公务员及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法制培训，邀请常年担任我局法律顾问的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7 月份 完成 2012 年第二批市级科技计划绿色通道项目申报工作，首都博物馆《博物馆智能终端支撑系统开发与示范》获得批准立项。

“7·21”特大暴雨后，文物系统全体人员全力投入到抢险救灾和主汛期文物安全工作中去，全市各区县文物部门及管理使用单位坚持巡视检查，对云居寺、上方山、宛平城、大觉寺等 135 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排险工作，有效控制了险情进一步扩大。同时开展了抢修工程的设计工作，为尽快启动排险工程创造了条件。市文物监察执法队向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属地监管，增加巡查密度，及时排除险情。

开展文物流通领域数据监测，完成了 2012 年二季度北京文物拍卖市场报告。文物拍卖数据库建设基本完成，逐步开展 2011 及 2012 年度文物拍卖数据的录入工作。

8 月 1 日 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班德林一行，考察中轴线保护工作。班德林一行先后参观了北京规划展览馆、景山、钟鼓楼、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表示北京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轴线留下了深刻印象。

8 月 2 日—3 日 召开市文物局 2013 年度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会议，青年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对 4 本申报书稿审议、表决，《钟铃文物探微》等 2 个项目获得出版资助。

8 月 3 日 宣传系统基层党组织整改提高、晋位升级工作座谈会召开。市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崔国民、市委宣传部基层处处长张爱军、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刘敏华到会并讲话。会上，市文物局汇报了文博系统基层党组织整改提高、晋位升级工作情况，首都博物馆等六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8 月 6 日 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 2012 年度中青年干部能力提高班，局系统近 70 名中青年干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为期一周，重点围绕学习贯彻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当前应对“7·21”特大自然灾害文物抢险

善后和文博事业发展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8 月 10 日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第 47 次青年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孙芮英作了题为《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如何提高服务社会公众能力》的报告。

8 月 15 日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北京市 2012 年度古建技师研修班”。此次古建技师研修班是北京乃至全国首次举办，旨在带动北京市古建修缮施工人员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古建修缮施工人员的专业水平，为保证北京市古建修缮施工的质量做出贡献。

8 月 16 日 巴爱民巡视员陪同国家文物局执法督察司叶春司长一行，到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抗战馆、石景山区法海寺等文物保护单位考察“7·21”灾后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对北京市文物系统采取的积极措施表示了肯定。

8 月 17 日 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老舍纪念馆承办，首都博物馆、北京鼎合嘉亿文化有限公司协办的“老舍胡絮青伉俪暨馆藏名人书画展”巡展首站在首都博物馆开幕。

8 月 22 日 对国立蒙藏学校旧址、拈花寺等全市文物安全隐患严重的单位开展重点跟踪督查。市文物局文物监察执法队对未按要求整改的单位提出了下一步整改要求，并将督查情况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

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新任职干部培训班，对新任副处级干部、馆（所）长助理以及拟任馆长助理共计 40 余人进行为期七天的培训。培训班重点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领导者素质与能力、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培训。

8 月 23 日—24 日 召开 2012 年度北京市文物局学术委员会会议，通报 2011—2012 年度局科研工作相关情况、2013 年度局科研成果出版项目、局青年科研成果出版项目申报及评审情况。《大觉寺藏清代契约文书整理及研究》等 2 个项目获得出版资助。

8 月 24 日 市委宣传部联合考察组一行 6 人在首都博物馆召开座谈会，对市文物局

系统 29 名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集中考察。市文物局介绍了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的有关举措, 29 名入党积极分子所在单位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情况和此次考察的 29 名同志的日常表现情况。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考察组组长张卫军同志对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提出了要求。

由首都博物馆、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共同主办, 韩国国家品牌委员会、韩国驻华大使馆、韩国文化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协办的“朝鲜王朝时代的生活”展览开幕仪式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8 月份 开展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聘用试点工作, 完成全市各公司专业人员情况的摸底调查及专业人员的替换工作。

完成北京市 2010—2011 年度《文物拍卖许可证》年审的初审工作, 全市共有 84 家文物拍卖企业初审获得通过。

为进一步做好北京市文化与科技融合政策的制定工作, 撰写完成了文博领域“文化与科技创新工程实施意见”相关材料, 全面梳理了文博领域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以及重要项目, 上报市委宣传部。

9 月 6 日 根据大运河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的统一部署, 公布经国家文物局和市政府批准的大运河北京段保护规划。该规划按照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的有关要求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 对大运河北京段进行了详细调查, 划定了大运河遗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北京地区大运河遗产保护和推动申遗工作奠定了基础。

9 月 9 日 “第三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正式开幕。

9 月 14 日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与北京文博交流馆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智化寺音乐节”在北京智化寺隆重开幕。

9 月 19 日 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商务委员

会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建立拍卖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京工商发[2012]102号), 并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举行启动仪式。

9 月 19 日—22 日 市文物局专项小组赴河南、河北两省进行地下文物保护调研, 考察了殷墟、曹操墓、邺城博物馆等文物保护单位, 学习了地下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利用及博物馆展陈方面的经验。

9 月 26 日 大运河沿线各城市在扬州签署《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关于保护大运河遗产的联合协定》, 市委副秘书长傅华代表北京市出席签字仪式, 并签署该联合协定, 市文物局派人陪同参会。按照国务院大运河保护申遗省部际联席会议要求, 为进一步推进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完善大运河遗产保护法规, 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关于保护大运河遗产的联合协定》。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召开中秋国庆期间局系统安全工作会, 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和保卫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两节期间的安全工作进行了部署, 提出了明确要求。

9 月份 完成《北京市文物局关于首都创新精神培育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

开展对 2011 年已实施的地方标准《文物建筑雷电防护技术规范》、《文物建筑消防设施设置规范》实施效果测评的调研和材料搜集工作, 起草完成上述标准实施情况的报告初稿; 完成《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操作规程第 2 部分: 木作》征求意见稿。

完成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电路改造、老山汉墓消防水池和监控系统建设、正阳门箭楼夜景照明系统改造、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临时展厅报警系统等八项安全消防工程的批复实施工作; 会同市消防局对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等重点单位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 全市 28 家博物馆共举办 40 余项临时展览, 有效地营造了中秋、国庆节日氛围。

开展 2012 北京文物市场调研工作, 撰写完成调研报告初稿。

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 2011 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工作的通知》及《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规则》和《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完成北京地区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工作。

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的通知》及《全国博物馆评估定级办法》和《博物馆评估标准》要求，开展第二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经过北京市博物馆评估委员会的评估，推荐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申报国家一级博物馆。

三季度 《军都山墓地 { 葫芦沟与西梁堽（一、二）；玉皇庙（一、二、三、四）}》荣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文物建筑大系（共 10 册）》和《北京文物地图集（上、下）》荣获二等奖。

共完成全市 42 场拍卖会 25877 件（套）文物标的依法审核工作，确定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2 件，撤拍禁止拍卖类文物 42 件，第三季度拍卖总成交额 18.4903 亿元。

完成“文物及博物馆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展馆”主展场招商招展工作；启动“2012 北京·中国文物艺术品博览会”招商招展工作。

举办上半年行政许可案卷评查讲评会，向机关各有关处室通报行政许可案卷评查结果，对需要整改的问题进行专项培训。

召开地下文物保护立法调研课题会，会议讨论确定了课题框架与调研工作计划，地下文物保护立法调研课题正式启动。此课题由国家文物局给予经费支持。

继续推进傅延年应诉工作。东城法院行政诉讼代理人驳回了原告傅延年等人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向全市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汛期文物抢险救灾和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提出文物抢险和隐患排查的具体要求。通知中强调了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2012 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全面排查整治文物、博物馆单位人力防范、实体

防范、技术防范和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有针对性排查整治文物建筑火灾隐患和文物被盗隐患。

对史家胡同 53 号管理使用单位北京好园宾馆和施工单位广东华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分别罚款 25 万元和 30 万元；对史家胡同 51 号施工单位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处罚 20 万元。上述三家被处罚单位在听证期内均未提出听证要求，目前已全部上交罚款。对史家胡同 51 号管理使用单位的处罚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再做决定。

经过调查取证和相关程序，对北京印刷集团京华印刷厂未经文物行政机关许可在西什库教堂建控地带内擅自进行翻改建工程制发了听证告知书，建设单位没有提出听证要求，市文物局文物监察执法队按照相关法规，给予京华印刷厂行政处罚 10 万元，责令三个月内拆除违法建筑，京华印刷厂已上交全部罚款。相关情况通过市文物局官方微博向社会通报。

根据群众举报，市文物局文物监察执法队对会贤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向管理使用单位天津好时制业公司制发了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并督促其整改，通过市文物局官方微博向社会通报有关情况。

根据市扫黄打非办《迎接党的十八大深化“扫黄打非”专项行动部署会议》、首都综治办《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全市集中求助工作方案》、市防火委《2012 年第三次消防工作联席会暨党的十八大社会面火灾防控推进会》等文件要求，向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区县文化委员会印发通知，部署相关工作，并会同市消防局对部分重点单位进行了抽查。

接到曾一智举报通州东城门遗址被施工破坏问题，向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印发书面督办函，要求了解情况依法处理；接到关于杨柳山祠、黄米胡同 9 号的群众举报，按照属地监管原则，分别转东城区、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督办。

2012年第三季度市文物局属博物馆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 称	入馆总人数	购票人数	免票人数	学 生	老 人
首都博物馆	455819	0	455819	48770	94489
大觉寺管理处	36747	28809	7938	256	1881
正阳门管理处	146875	142349	4526	703	1062
徐悲鸿纪念馆	0	0	0	0	0
北京文博交流馆	10457	5142	5315	35	1038
北京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	15949	0	15949	4754	4390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6366	0	6366	1644	954
北京艺术博物馆	86483	84367	2116	167	443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4088	0	4088	426	1150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0	0	0	0	0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96058	90754	5304	1173	1600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7375	4972	2403	705	394
白塔寺管理处	9704	4148	5556	608	1720
老舍纪念馆	2667	0	2667	1066	785
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	0	0	0	0	0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3694	1943	1751	190	877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270002	256977	13025	24721	11313

《北京文博文丛》2012 年总目录

● 文物工作

- 恢复古都标志性建筑与北京名城整体保护
.....孔繁峙(2012.1)
- 挖掘延庆传统文化资源 提升延庆文化软实力
.....范学新(2012.1)
- 试论文化遗产与历史名城的保护发展
.....刘保山(2012.1)
- 吴良镛学术思想对文物事业的贡献
.....单霁翔(2012.2)
- 古都中轴线历史文化核心价值的深入发掘与科学认定
.....孔繁峙(2012.2)
-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巡查和执法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姜明君(2012.2)
- 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古都文化特色
.....孔繁峙(2012.3)
- 利用 3S 技术强化文物监察执法工作
.....周佳 姜明君(2012.3)
- 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推进北京文博工作的创新发展
.....孔繁峙(2012.4)
- 北京市文物局修志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宋惕冰(2012.4)

●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建馆 20 周年专栏

- 浅谈博物馆在全球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以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古代建筑展”为例
.....张敏(2012.2)
- 传承千年文明 开拓创新发展
——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建馆 20 周年
.....潘奇燕(2012.2)

● 博物馆学

- 首都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的思考
.....齐密云(2012.1)
- 首都博物馆“胡博·华士画笔下的晚清权贵”展览评析
.....薄海昆(2012.1)

- 浅析行业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特点
.....赵梅(2012.1)
- 浅谈中小型博物馆志愿者工作可持续发展对策
——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志愿者工作为例
.....曹静(2012.3)
- 老舍——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张文生(2012.3)

- 大英博物馆展览解析系统简论
.....李梅(2012.4)
- 海淀区博物馆资源现状调查
.....李志 王承浩 姜英臻(2012.4)

● 考古简报

-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元、明、清代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2012.1)
-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唐代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昌平区文化委员会(2012.2)
- 北京市宣武区甘石桥唐墓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12.2)
- 房山长阳汉墓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12.3)
- 北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金元墓葬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12.3)
- 北京市延庆县西屯墓地西区(I区)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延庆县文物管理所(2012.4)
- 香山静宜园部分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12.4)

● 文物研究

- 浅谈玉器上的龙纹及鉴别
.....顾斌(2012.1)
- 秦汉时期燕蓟地区的手工业
.....章永俊(2012.1)
- 宋元明清玉雕带钩的发展
.....李继永(2012.1)

从明万历洒线绣龙纹补看龙补在帝后冠服上的运用……胡桂梅(2012.1)
“兰旗王”及其园寝考……夏连保(2012.1)
北京先农坛清代祭器复原记…董绍鹏(2012.1)

北京房山谷积庵东塔考察记
……邢鹏 昌硕 张全礼 倪翀
高叶环 唐磊 李响 王敏庆(2012.2)
“大明嘉靖丙午岁仲秋吉日造”铜钟与京西名刹摩诃庵……杨玉莲(2012.2)
觉生寺山门匾额书者新探……罗飞(2012.2)
洛可可艺术对清代乾隆瓷器的影响
……赵宏(2012.2)
恭王府研究中的几点存疑……张军(2012.2)
金韵梅捐赠遗产事宜考略……王芊芊(2012.2)

简析玉琮的发展轨迹……邱向军(2012.3)
唐刘钤墓志考释……鲁晓帆(2012.3)
宋人丘壑 元人笔墨——论王翊山水画艺术
……李晨(2012.3)
从《明宫冠服图》看明代初期冠服制度的形成与确立…李之檀 陈晓芬 孔繁云(2012.3)
金代明昌、承安年款圈带铭文铜镜及相关问题探讨……于力凡(2012.3)
王鉴晚年《仿倪瓚溪亭山色图》底本相关问题研究……丁霏(2012.3)
北京奥运所击之“缶”与中国古代的缶
……陈怀颖(2012.3)

北京古代的窖藏遗存……郭京宁(2012.4)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迁徙初探…韩建识(2012.4)
清代王爺园寝廋廒形态考……周莎(2012.4)
民国总统徐世昌手札初探……付幸(2012.4)
徐悲鸿与《风雨归舟图》……佟刚(2012.4)
北京故宫文物调拨抚顺市博物馆30周年
……张红(2012.4)

● 北京史地

房山区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李伟敏(2012.1)
从北京孔庙建筑浅析元、明二代尊孔
……常硕(2012.1)
明代黑山护国寺的创立与传承
……苗天娥(2012.1)
西交民巷地区成为近代银行街成因考
……王纪洁(2012.1)

从上宅鸟首祭器到延庆鸟首人
——鸟崇拜与燕山、燕部族、燕国及山戎
轨迹试探……王玲(2012.2)
燕王卢绾的政治选择及社会影响
……靳宝(2012.2)
房山区晋唐考古发现与研究…盛会莲(2012.2)
北京厂甸庙会当代的发展…闫芳(2012.2)

试论辽南京地区多民族结构的形成
……于璞(2012.3)
北京地区出土的金代玉器……虞海燕(2012.3)
琉璃厂地区城市功能的转变及其原因试探
……张媛媛(2012.3)
正阳门更名时间探考……李晴(2012.3)
中国的祠堂文化及其保护与发展
……孟建鹭(2012.3)

北京城的本根——古蓟城……陈平(2012.4)
《万寿寺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课题构思综述
……孔祥利(2012.4)
北京坛庙建筑拾零……李卫伟(2012.4)
清代京师城垣军事管理述略…袁学军(2012.4)
清光绪朝永定河石卢段水患上谕档
……陈康(2012.4)

● 文物保护

清代唐卡修复与技法探究……王岩菁(2012.1)

北京市石景山区出土清代千尸朝带荷包修复研究报告……陈超(2012.2)

●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2011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尹君(2012.1)

北京市文物局2012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尹君(2012.2)

北京市文物局2012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尹君(2012.3)

北京市文物局2012年三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尹君(2012.4)